資本主义文明的衰亡

錫德尼·韦伯
貝特丽絲·韦伯 合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資本主义文明的衰亡

錫德尼・韦伯
貝特丽絲・韦伯 合著
秋　水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THE DECAY OF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NEW YORK

本書根据紐約"赫考脫·布萊斯公司"1923年版本譯出

資本主义文明的衰亡

錫德尼·韦伯
貝特丽絲·韦伯 合著
秋　水　譯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兴路54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營业許可證出00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公厘 1/32　印張5 1/2　字數120,000
1958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

統一書号：3074·269
定　价：(十三)0.96元

封面設計：赵　晴

出版者的話

韦伯是英国改良主义者組織"費边社"的"理論家"，也是三十年代英国工党两次执政时的重要人物。本書作者企图从資本主义社会中工資劳动者的貧困、社会各阶层收入的不平等、个人自由的悬殊以及資本主义制度下道德与社会风气的敗坏和战爭的破坏等方面，分析批判資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罪恶，但是，作者在批判資本主义的罪恶时，仅在表面現象上做文章，而不敢触动这一丑恶制度的本质，因此反对用革命的方法来消灭資本主义制度，而主張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来和平改造資本主义，因而实质上是主張通过种种改良主义措施，来欺騙和麻痺无产阶級，削弱和瓦解劳动人民反对資本主义的斗爭意志，从而达到巩固資本主义制度的目的。在本書中，作者也攻击了无产阶級革命和无产阶級专政。翻譯本書出版的目的，是供研究和批判"費边社"改良主义思想的参考之用。

序

关于这本小書，我們可以預先排除一种显明的批評，說它不是"建設性"的。它的目的，本来就不是提供一个建設的規划。关于这种規划的詳細情形，讀者可參閱本書后面广告所列各書，特别是"大不列顛社会主义共和国宪章"和从另一个方面来立論的"穷困的防止"；或者，參閱以政治綱領的形式提出的英国工党小册子"工党和新社会秩序"（倫敦爱克萊斯吞广場 33 号出售，每本 3 辨士）。

本書承許多朋友惠予帮助，我們在这里謹志謝忱。他們的姓名都沒有提出，并希見諒。但我們不得不向我們的老朋友和老同志蕭伯納先生，表示最衷心的謝意，他曾在普选当中当我們忙于别的事情的时候，慈惠地担任了本書的校訂工作。

1923 年 1 月于威斯敏斯特，

葛罗斯芬諾路 41 号

目　录

序
导論…… 1
第一章　劳人的貧困…… 7
第二章　收入的不平等……15
第三章　个人自由的不平等……41
第四章　資本主义制度的初步成功……57
第五章　資本主义制度的最后失敗……77
第六章　資本主义制度是战爭的一个原因…… 137
中英名辞对照表…… 167

导　論

每一代的人們，都有这样一个幻覚，以为他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制度，在某些特殊意义上，都是"自然的"，不变的和固定的。可是，多少千年以来，社会制度一直是連續地兴起、发展、衰亡并逐漸地被更适合于当时需要的其他制度取而代之。这本書指明，我們这些自認为最文明先进的国家，也同我們的前人一样，必須經历这种无穷变化的过程。正象古代苏莫尔人的、埃及的、希腊的、罗馬的以及中世紀基督教的文明已經消逝一样，我們現在的資本主义文明（它和过去的文明一样是会死亡的），正在我們的眼前崩潰；这种崩潰，不只是在圣保罗大教堂的道督所解析的、战爭所带給我們并可以用眞正的和平来挽救的"腐蝕性的崩潰"中进行着；并且是在战爭虽可加速、我們或任何东西却不能阻擋的时代逐漸变迁中进行着。現在的問題不是我們現今的文明是否会变迁，而是它将发生怎样的变迁。它可以通过深思熟虑的适应过程，逐漸地、和平地过渡到一种新的形式。或者，假使是由忿怒的反抗来代替这种适应的話，它可以整个垮台，使人类从社会紊乱和騷动时期的更低的水平上，来痛苦地建立新的文明，而在这种社会紊乱和騷动中，不只是旧秩序的弊病，而且連同它的物質的、知識的和道德的成就，都将丧失殆尽。

不幸的是，那些承認变化是无可避免的这种一般命題的人們，

却不能了解什么是这种变化的規律所适用的社会制度。对他們来說，財产私有制是一切可能有的文明的基础，意思就是說，它与人类天性是那样密切地联系着，以致只要人还是人，它便与地球繞其軸心轉动一样，是不会腐朽或被别的东西所代替的。可是，他們把位置弄錯了。我們的資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并不是个人財产的获得承認或获得保障，而是社会賴以生存的生产資料的私人所有制。

我們現在不妨冒着卖弄学問的嫌疑，把我們的意思，作出一个定义。我們所謂資本主义或資本主义制度，或者我們所乐于称道的資本主义文明，意思是指工业制度和法律制度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广大的工人群众被彻底剝夺了生产工具的所有权，以致淪于工資劳动者的地位，他們的生存、安全和个人自由，好象都取决于在国内占相当小的比例的一部分人的意志；这种少数人就是那些以謀取他們自己个人的私利为目的，占有并通过合法占有来管理社会中土地、机器和劳动力的組織的人們。

土地和其他生产財富的工具，变成了人数相当少的一个阶級的私有財产，并且这种占有所带来的公共責任，并不比一只表或一根手杖的占有所带来的为多；这种私有制构成了社会中其他的人們賴以謀生的那种局面的基础；而且，这种私有制又带来了对于作为国家命脉的商品及服务的生产和分配的管理权和組織权——这就是資本主义的意义——这种惊人的局面，远不是人类的历史上万古长存和遍地皆有的，它之成为美国文明的特征，只是最近三、四个世代的事；而在欧洲，也只是最近几个世紀的事，在这个时期，由于乡村中土地租佃和农业方面的封建制度的逐漸沒落，以及城市里工商业行会組織的重要性相对地降低，以致遺留下来的基地，被商业的冒險漫无約束地窃据了。我們知道，欧洲在封建制度和手

工业行会兴起以前，它的文明，是建筑在奴隶制或农奴制、家长制或等級制度等不同形式上面的。这些制度，在那时，好象是在人类天性里生了根似的，也好象和現在的資本主义一样，是不变的。再者，它們都維持了好几个世紀之久，并且被設想出来和被納入国家和教会的組織中作为社会中的神圣制度，在这个制度中，从皇帝和教皇一直到农奴和奴隶，每个人在利用他的謀生机会的时候，都对上帝負責。在英国，商业的窃据，虽然在亨利七世时就开始了，但只是到乔治三世称帝的时候，才强大起来；一直沒有在政治上和宗教上当作象过去持久的制度那样加以承認和組織起来。想出它来的那些圣賢們，也象政治經济学家一样，宣称它是与教会无关的，并且立法者也可以不管它：它的活动是不受宗教信仰和法律所制約的。它在这些毫无隐諱的海盜式的措辞下，来保障人民的生計，但这种活动并不是它的目的，而只是它忠于迅速发財致富的原則的偶然結果。它要求人們容忍它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它在达到这个主要目的上获得了成功。

本書的論旨，認为这种商业的窃据，虽然从来沒有完全达到它的主要目的，并且在許多地方，由于各种粗暴的情况，还違反了这个目的，可是，确实有一个时期，大約是在十九世紀的中叶，那时可以說它在过去 100 年当中总結起来确为业已大大增加了的人口带来了物質文明的惊人进步。但是我們必須补充說，从那时起，直到現在，它就一直是一个敗仗接着一个敗仗地在后退，把它打击得越来越絕望的，就是它亲自建立起来的文明和培养起来的生产力所产生的社会問題。簡单地說，它未到成熟就已衰亡了，在历史的記录上，資本主义将不会被認为是一个划时代的紀元，而只是当作一个插曲，并且大体上，还是两个时代中間的一个悲慘的插曲，或黑暗

时代。由于沒有一位个别占有者承認自己是一个独裁者，我們根据即将說明的理由，必須补充說，这种独裁是阶級的独裁，在为私人利潤服务的占有制面前，个别資本家也象工資劳动者本身一样，是束手无策的。他对于竞爭的資本主义力量的控制，归根到底，并不比水手控制风力做得更好些。但是，由于这种制度使得每一个占有者都成为了特权阶級的一个成員，并且由于这个阶級一旦放弃了它的特权之后，更有利的局面就会起而代之，所以，要这个阶級的各个和每个成員对这些特权所产生的后果負責，并不是完全不公道的。

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主要地就是反对資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一种革命。

我們相信，現在最先进的民族，无論在知識上、品格上和智力上都已成熟，足以廢除这种社会关系，以工业的民主来代替工业的寡头統治，以替大众服务的动机来代替金錢私利的动机。我們認識到，我們曾經有过，而且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地区現在还有着其他的独裁，比起騎在工資劳动者的头上占有生产工具的独裁来，其动机还要恶毒，其后果带来还要大的灾害。这就是奴隶主对奴隶、征服者对被征服民族、专制帝王或寡头統治对全体人民的压迫；这些压迫是建立在一个人或人数有限的貴族阶級、或其他只占少数的民族、阶級或信仰对于政治权力的壟断上面。貫串在这些压迫制度之中时起时伏的，是家庭中男人对女人、父母对子女的专制。这些单独的、互不相同的人压迫人的形式，每一种都体現在特殊的經济、政治或社会的法律和慣例当中；在以男子为中心的每一个民族中，都激起过革命运动和改良运动，以糾正它的缺点。社会主义者，只要他們是忠实于社会主义所根据的民主主义的，都同情这些

运动，并亟愿赞助它們。他們了解到，在社会正常发展的过程中，廢除把人当作动产的奴隶制，政治民主的建立，以及妇女的解放，都必須在任何工业民主普遍实施之前实現。这一个或那一个比較显著的独裁的存在，掩盖了生产工具所有者对于那些依靠使用这些工具来謀生的人們的独裁，因而必然也轉移了对資本主义特有的罪恶的注意。但社会主义者的主要目标，是集中注意来面对着目前甚至在最先进的民主国家里都存在的一种特殊的专制，即比較小的富人阶級对广大穷人群众的专制。

社会主义者控訴工业資本主义制度以及以它作为基础的社会，共有四大理由：历史証明，国家的貧困，虽然可能有其他一些原因，但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大部分的人民一旦被剝夺了生产工具的所有权，那末，即使生产总量相当巨大，广大的人民群众仍然是生活在穷困之中，并且他們中間的大多数将是永远受着飢餓的威胁。第二，在与有产阶級的享受和奢靡以及那个阶級里一些人們无耻的游手好閑相对照，这种穷困和它带来的风险，就更令人感到憎恨和侮辱。但資本主义的最恶劣的情形，还不是工資劳动者的穷困，也不是財产所有者的奢靡，而是，第三，在无产者和"靠占有权过活"的人們中間，存在着个人自由方面的显然的不平等。每天或每周靠接近生产工具以維持全家生活的、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一点鐘又一点鐘，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逐漸发現他們竟在那些占有这种工具的、人数相当有限的阶級的命令之下工作。而这些命令的制裁，并不是法律上的处罰，乃是所謂自由抉擇的結局——餓死。这就是工資劳动者所申訴的"工資奴隶"的意义。第四，社会主义者深信，資本主义制度，作为組織商品与服务的生产和分配的一种方法来說，在科学上是站不住的，并且是和人

类的精神发展根本不相容的。

我們将在下面，把这显明的四害，即社会主义者所深信的資本主义社会組織先天具有而又可加以証明的四害，相繼地加以研究。其中三种将首先論及：穷人的貧困、收入的不平等和个人自由的悬殊，这三种禍害都經常地与人民群众被剝夺了生产工具所有权的事实，具有密切的联系。在这以后，我們将要指明，資本主义制度，在增加国家的財富方面，虽然有过初期的成功，但結局还是失敗，就是在提高商品与服务的生产量到最大的程度这一点上，也是这样；因此，它不只是違反了它自己所抱的目的，并且，由于它完全倚仗着占有者个人金錢掠取的动机，变成了国民道德和国际和平的敌人，并且事实上也成了文明本身的敌人。

第一章

穷人的貧困

資本主义的社会組織突出的和完全出于意料的結果是，在国内产生了普遍的貧困。整整一个世紀以来的經驗，在欧洲和美洲最先进的文明里，都同样地显露了这个事实，就是：普遍的貧困，这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被剝夺了生产工具所有权以及这种所有权到处集中在相当小的有产阶級手中的結果，或者至少是它們带来的一般副产品。这当然不是說，很低的生活水平和迫切的飢餓的灾难，是資本主义特有的現象。在生产工具公有的或生产工具較普遍地分配在那些賴以謀生的人們手里的、更原始的社会里，經常的貧困和周期性的飢荒，也是常有的事。不过，在这些落后的社会里，生活的艰困和风險，还可以归咎于人們控制自然界的能力的不足，如旱灾、水灾及疾病等；或归咎于天然物資的缺乏，如肥沃土地及矿产的缺乏，或气候的恶劣等；或者归咎于应用科学的未发达，以致人們不能有效地利用現有的資源。但資本主义的工业組織却把我們弄糊涂了。这种組織发展得最完备的国家，都享有丰富的天然物資，并大大地利用科学来使它們为人类服务。就这些国家整个来看，这样生产的綜合財富，是相当巨大的。可是，虽然有了这些有利条件，人民的物質状况，总的說来，却很少得到改善；有的

时候，在无所約束的資本主义之下，实际上还要更坏。我們有理由認为：自耕农和自己当家作主的手工业师傅的时代的英国，虽然存在着各种匱乏和有各种缺点，比起生产工具所有者和組織者的"自由企业"发展到最高峰的、十九世紀上半期的英国来，为实际的多数人民供給了更多的食物，更有用的衣服，更多的光，更清洁的空气，更愉快的环境，并且，事实上甚至供給了更大程度的个人自由。

工业革命的結果

这种越来越坏的情况的悲惨过程，在关于工业革命的一切記載中，都有所描述，在这个时候，資本家作为土地、机器和人的劳动力的无限制的剝削者，称王称霸，同时又給普通人民带来了比任何战爭所带来的还要惊人的长期痛苦。仅就英国来說，在現在的一代里，关于1760年到1850年間情况的叙述，已成了历史課本中索然乏味、令人生厌的教材，这不只是工人学习班的历史課本如此，甚至女子中学的历史課本，也是这样。但是，假使我們了解了当时的情况，那末，在写到它的时候，就很难不动感情了。幼年儿童在紗厂里輪班地遭受摧毀；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在矿井里和鉄厂里，被乱七八糟的劳役削弱着和摧殘着；多少家庭，由于很不适宜的住在拥挤不堪的貧民窟住宅里而淪于堕落；經常反复到来的就业不足和失业，以及随之而来的飢餓和死亡；食品掺杂，空气染毒，飲水沾污，日日夜夜見到的、听到的，都令人憎惡：这一切都是在十九世紀初期的工业英国司空見慣的事情，而一再发現这种情况的，不是多情善感的慈善家和黄色报紙的新聞記者，而是部会的視察員和議会的調查团。常被人們遺忘的是，类似这样的禍害，在

今天欧美各大城市貧民窟的工业人口中，基本上还繼續存在着，而其范圍則肯定地大大超过了1800年到1840年間在同样条件下所发生的。

再者，随着資本主义制度而来的肉体的痛苦、事故和疾病，还不是它的最大禍害。"穷人的毀灭就是他們的貧困"这句話并不只是指物质方面而言。对于冰地上的英雄豪杰，或沙漠里的圣徒，生活条件的缺乏以及极度的艰难困苦，还可以借精神方面的兴奋、个性方面的发展和个人主动性与进取心的不断发揮，来得到調剂。对于古代社会里的自耕农和自己当家作主的手工业师傅，洪水、旱灾、瘟疫、畜疫或虫害，虽然可以产生浩劫或飢荒，也还可以产生友爱和鼓舞生活精神。可是，現代的工业制度，却一代又一代地摧毀着那些在这个制度下的受害者的人們的灵魂。現在有一种道德方面的毒气，其能致人于死命不亚于物质上的毒气。就在我們的这个日子里，欧美大城市貧民窟里的居民，（他們的人数在一代一代地增加），不管他們愿意与否，都不得不葬身在那鄙街陋巷的丑恶、秽浊和紊乱之中。他們从嬰儿时代起，就呼吸着酗酒的和色情的、偷盜的和詐欺的空气——虽然，可能偶然有个别道德超群的人，忧伤而又不玷染毒素地生活着，可是一般的人，在思想和肉体方面，都是中了毒的。因此，社会主义者所抗議的貧乏，是品格的堕落，精神的敗坏，人类个性本身的毀灭。

这些禍害不是有意带来的

在本章开始的一句話里，我們提到資本主义的那些惊人的結果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实上，它們是太坏了，坏到在任何文明的阶段里都不可能由人們有意地把它們带来的；更不可能在富于人

道主义和自由主义情緒、富于智力发展的热望的时代，如象从伏尔泰和卢梭到雪萊和柯布登的事业所标志的那个时代，有意地把它們带来的。正如易卜生戏剧里的法官所說的，"这样的事情不是人干的。"可是，这样的事情，居然做出来了，并且还繼續在做着，这可由一个事实得到解釋：資本主义最初的效果，还能和某些自然的結果相符合，还带有一点正义与合理的气氛，还能适合于人类尚沒有受过教訓的道德感，并且伴之而来的是对于企业的約束（指封建制度对于企业的約束——譯者注）的崩溃——这种崩溃只有有經驗的政治家才能了解其合理性。假使有甲乙两人，在其他条件相等之下，甲变成了穷人，乙变成了富翁，我們的正义感就会吃惊，我們的怜憫心和义憤就会被激发出来。可是，假使在两人收入方面互相掉換了位置，甲和他的家庭却变得令人退避地肮脏、酒醉和愚鈍，而乙却变得衣裝整齐，并且邀請我們享受由他的衣服华丽的夫人和小姐們所主持的愉快招待；假使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明显地和直接地由于甲的生活超过收入过份揮霍，而乙則每年从事积蓄，那末，1,000 人之中，就有 999 个人認为：这种恶果和酬报，具有詩意的公正；甲的穷困是咎由自取的，这穷困是对于他的罪恶的应得的社会合理制裁；任何人都能够象乙一样地得到兴旺，假使他們决心效法他的話。此外，假使乙推翻了一种很明显的封建专制，并为所有象他这样的人們，爭取到了与他們的善良品質相称的优越的政治地位，那末，就会随之产生一种进步的和开明的有力印象。

除非不平等的現象，到了极不合理的时候，人們是不会怀疑甲的敗落乃是結果而不是原因；也不会怀疑乙的兴旺乃是原因而不是結果的。如果一条街上的一个嬰儿，在出生之前实际上就占有

100 万英鎊，而一个从 8 岁一直辛苦工作到 80 岁的妇女却被别人所抛弃，以致死在劳动救济院里，那末，十八世紀的乐观主义就会开始失掉信心了。

可是立刻被人寬恕了

可是，就在这种乐观主义已被动摇的时候，它也沒有投降。它移轉了它的陣地，并且开始辯护說：穷人的貧困，是人类状况的一般进步所无可避免的代价。幸运的人們，对于那些对别人遭受的苦痛作出解釋的各种托辞，只要这种痛苦是为維持他們本阶級或本民族的利益或地位所必需时，好象是无止境地乐于接受的，甚至具有高尚理想和偉大志向的人們，也是这样。在美国南部拥有黑奴的州議員中，还有一些品德特别高尚、学識特别优良的人們，他們直到李将軍在亚坡馬托克斯法院里投降的时候，还热情地深信奴隶制度和奴隶市場是社会秩序唯一可能的基础，在他們的眼光中，这种秩序好象是現代文明不可缺少的东西。1914 年到 1918 年时，在德国的大学和軍队里，确有一些道德高尚、学識优良的人們，眞誠地認为：对中立的比利时的侵犯，对占領地区的洗劫，对平民的强迫劳役，和对載客船只的轟击，都是德意志作为支配世界的强国，为完成其文明的使命所必須的但又是遺憾的附带事件。我們同样地看到：象布萊特和柯布登这样的爱国人士和追随他們的一些好心腸的資本家，正在寬宥和辯护那些与他們过去所斥責的奴隶制度不相上下的工人雇佣条件和居住条件，而这种情况，单就英国来說，在一年中所造成的本来可以避免的疾病和死亡，就比克里米亚战爭伤亡的总数还要多得多。而且，容忍这种大規模的痛苦和堕落并为之辯护的人，并不只是商人和貧民窟的房东。在十九

世紀上半期的英国，和在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一样，科学界的人士和宗教界的人士——“海盜船上的教师和牧师”——都替他們自己世界里講求实利的人們的行动作辯护。在知識分子中有李嘉图和納沙·西尼尔，在教士中有多馬士·馬尔薩斯和华德雷大主教，他們都把漫无約束的工厂、矿区和貧民窟里的恐怖——用“工資的自然率”的名詞把它抽象化起来——說成是政治經济学的最新发現，和基督教会教条所启示的神律的一部分。現代警察制度的創始人和“英帝国資源”的主要权威，对英国人說：“沒有很大比重的貧困，富裕就不可能有，因为富裕是劳动的产物，同时劳动只能从貧困状况中得来。貧困是社会的一种状态和条件，在这种状态和条件下，个别的人是沒有在貯备形态中的剩余劳动的，或者換句話說，他除了經常运用勤劳来取得酬报外，沒有任何財产或生存手段。因此，貧困是社会中最必要的和不可缺少的成分，沒有它，国家和社会就不能够在文明的状态下存在。它是人类注定的命运。它是財富的泉源，沒有它，就沒有劳动，富裕，教养，享受，以及拥有財富者的利益，因为沒有很大比重的穷困，就永不会使用剩余劳动力来生产，以获取生活上的舒适或豪华。”①

現代的辯护辭

我們决不能設想这些慈祥的、在别的方面都很优秀的公民，对于“平民”的痛苦所表示的那种冷酷无情，只是过去的偶然事件。現在任何人，只要留心观察一下他四周圍的人們的心理，即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或美国的“富有”的或舒适的阶級，无論是工业家也好，領股息的人們也好，政治家也好，教授也好，就很容易发現，他們是多么心安理得地和事所必然地認为：第一，有产者和无产者相

对的地位，与他們的功过或种族的本质，有一种无法解释的但却确实存在的关系；第二，无論这种說法是否属实，广大的无产阶級的存在，对于有产阶級自身的免于辛苦的体力劳动和个人能力发展的广闊机会——两者都被認为是文明和文化所不可缺少的东西——是一种必要的条件。因此，穷困，不断的匱乏，以及占很大比重的工資劳动者經常的眉急的貧困灾难，即使在最富裕的国家里，也都被默認为是广大人民注定的命运；这种默認，就是在这些禍害及其与資本主义的因果关系充分表現出来之后，仍然存在。我們还記得一位机敏的日本政治家曾經說过一句使我們吃惊的話，他曾偶然地观察到，"資本主义制度被介紹到日本的时候，曾带来了一个不断增长的貧穷阶級——在藩主时代的和自耕农时代的旧日本从所未聞的一个阶級。这种穷困"，他又带着哲学意味微笑地补充說，"是日本为了增加它的重要公民的个人財富和为了使它自己变

① 派屈克·柯尔可洪："英帝国的資源"（Patrick Colquhoun: "Resources of the British Empire"），1914，轉引自毕尔："英国社会主义史"（M. Beer: "A History of British Socialism"）第1卷，第145頁。

"这句名言，是一位英国經济学家、唐森牧师說的，他曾用'人类的祝福者'的笔名，著文反对'貧穷救济法'。在他的曾經再版的杰作'論貧穷救济法'（"A Dissertation on the Poor Laws"，倫敦，1817）第39—41頁中，（馬克思在"資本論"，英文版，第1卷，第602—603頁中曾加以引証）他对我們解釋說：穷人是不顧将来的，并且繁殖得很快，以便'經常有一些人来担任社会中最卑賤最肮脏和最屈辱的职位。因此，人类幸福的主要部分得以大大地增进，同时那些比較文弱的人，不只是可以免于苦役……并且还可以不受干扰地进行他們本性所适合的各种职务'。貧穷救济法'势将摧毀上帝和自然在世上建立的体系，使它的和諧与美丽，对称和秩序，都遭到毀灭'。"（弗拉基米尔·辛柯維基："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Vladimir G. Simkovitch: "Marxism V. Socialism"〕，1913，第107頁）。这位有教职的作者是"庇賽，威尔次的教区长，兼亚索尔女公爵琼恩的牧师。"他的"論貧穷救济法"是在1786年出版的，并在以后的30年中不止一次地再版。

成一个世界强国，必须付出的代价。”

穷人的貧困，是牟取利潤的資本家“自由企业”的最显明的恶果，这一点已不需要詳細說明了。現在，抱着各色各样見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承認这种貧困的存在，并且根据他們从过去二、三代的社会主义者那里所学到的心得，多少准备采取限制資本家自由經营的救济性措施，以图减少他們認为遺憾的現象。可是，这些减輕痛苦的措施，并沒有彻底解决問題。它只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初步成就，也就是，在英国、澳大利亚和在所有信奉罗柏特·欧文关于工厂立法的呼吁的地方，以法律来有意地維持整个社会文明生活的全国最低水平这个重要的社会主义政策，已經得到了承認，并在某种程度上已經見諸实施。这个政策，象現在大家普遍承認的那样，如果全部付諸实施，則国家（如果选擇这样做的話），是能够制止任何普遍貧困現象的再度发生。就整个阶級来說，它甚至能够消灭那些接近貧困边緣的生活上的风险①。只要政治家們担負起这个任务，就是只做这么多，也会得到很大的收获。不过，这种平衡生活水平的过程本身（即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把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水平平衡到一个規定的最低标准——譬如說，平衡到一个在正常就业情况下的熟練的工程师的或公立小学助理教师的水平），将不会减少，并且，正如我們将要指明的，在較长的时期中甚至还会增加資产阶級（即占有和支配生产工具的人数相当少的一个阶級）和广大人民群众（即专靠别人的許可才能使用这些工具以謀取生活的人們）之間在物質条件和个人自由方面的不平等現象。

① 关于这种政策的充分說明，以及它在实际情况下詳細的应用，見韦伯夫妇著：“貧困的防止”（“The Prevention of Destitution”），1920。

第 二 章

收入的不平等

我們相信，除了穷人的貧困以外，在目前資本主义工业組織更高的阶段里，一个人的收入与另一个人的收入之間存在的巨大差别，也是对于国家有害的。这种极端不平等的現象，是尽人皆知的。在每張报紙里，資本家的也好，工人的也好，我們都时常看到在某些个人收入中存在着巨大差别的动人报导——从男女工人每周几个先令或几块美元的收入，到英美的超級資本家每年成千上万英鎊或几百万美元的收入。但更重要的一个事实是，社会中一个阶級与另一个阶級間所分配到的国民收入的不平等①。就拿最

---

① 收入的"不平等"，当然可以从好几个方面来了解（关于这一点，見道尔頓："从某些方面看現代社会收入不平等的問題"〔Hugh Dalton: "Some Aspects of the Inequality of Income in Modern Community"〕，1920）。关于統計数字，見"費边社丛刊"第5号，"社会主义者参考資料"（"Fabian Tracts" No. 5, "Facts for Socialists"）；丘查—蒙涅爵士："富和穷"（Sir Leo Chiozza-Money: "Riches and Poverty"），1905；史坦卜："英国的收入和財产"（Joseph Stamp: "British Income and Property"），第2版，1921，和"財产及納稅能力"（"Wealth and Taxable Capacity"），1922；波雷："收入分配的变迁"（A.L. Bowley: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1880—1913）和"工业产品的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the Products of Industry"）。

富足时期的联合王国——即世界大战前的年代——作典型的例子吧。那时，这个国家的人民每年生产的商品和所提供的服务的总值，总計約 20 亿英鎊；此外，从国外的投資吸收来的，每年約 2 亿英鎊。全国人民賴以生活的商品和服务的总值的二分之一，是被社会中九分之一的人（当时有繳納所得税义务的人們，即每年收入在 160 英鎊以上的家庭）所取得了。在剩下的二分之一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約 3 亿英鎊）分配給所謂新的社会底层人物，即所謂靠薪水生活的无产阶級的渺小的書記人員、教师、小公务員以及最小的店主和商人——連同他們的家属。他們不属于体力劳动者，但每戶每年劳动所得又不到 160 英鎊，他們共占人口的九分之二。生产总值中其余的部分，即为占人口三分之二的体力劳动者和他們的家属所派用的，只有 8 亿英鎊左右，其中除去为疾病和其他失业事故用去者外，每个成年男工，賴以維持全家生活的收入，全年平均每周只有 25 先令左右。而且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这种耀眼的不平等現象，并不只是在联合王国或在那个特殊时期所发生的特殊情况。它是每一个資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关于法国的統計数字，就所能查考到的来說，也說明了那里的不平等現象，已走到了同样的极端。德意志帝国的情况，显明地也是一样。就是在拥有北美洲无限資源的美国，根据統計数字所揭示的，也在国民收入的分配方面，呈現出同一趋向的不平等現象。換一个方式来說，在美国，1890 年国民总收入的分配是：百分之四十作了占有者的报酬，百分之六十才是工作者的收入①。

① 麦凱伊："美国化的社会主义"（James Mackaye: "Americanized Socialism"），1918。

国家"选擇了不平等"的道路

所以,很明显,一个国家,在决定建立或繼續保持土地和資本的私有制作为它人民的工业組織的基础时,它已經有意地选擇了不平等的道路。我們現在必須張开眼睛来面对这个事实。在資本主义国家中,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間,一个阶級与另一个阶級之間,不計他們本身的貢献,并且往往与他們的勤劳和对社会的用处成反比例,存在着殘酷的不平等,这并不是由于資本主义运用上的缺点而产生的,而是在它的本质里就已存在的。它不是暫时的現象,而是永久性的特征。把实际上所有决定財富生产上的差别的因素——如在經济使用上,某些土地和資本比条件最差的土地和資本暫时較为有利的部分——放在差不多无約束的私有制之中,我們便造成了下列的結果:正如統計数字所指明的,至少占生产总額三分之一的"租金"或剩余价值,落到有产阶級中占据比較优越地位的人們手中,至于这些人对社会有沒有什么貢献,則可毫不計及。卡萊尔說:"寡妇正在为孩子們的晚餐收集蕁麻:一位在客房里优閑地向窗外了望的涂着香水的地主,却有一套炼金术,并将用它来向寡妇索取第三根蕁麻,而称之为租金和法律。"超过有关工人所能得到的生活費用同样的"剩余价值",已經在所有資本主义工业中,一年接着一年地生产着,并且在每个場合下都榨取到了頂点。这并不是說,"所有財富都是劳动創造的",这句話,是指体力劳动而言。采矿工程师、商船船长、鉄路客运管理員、銀行經理、文艺作家、科学作家或教师、发明家、設計师、組織員、以及在各种名义之下为創造和指导社会公用事业貢献毕生精力的人們、和无数的其他"脑力劳动"参加者都可以認为是产品制造的合作者,并且

都是为他們自己和家属合法地賺取維持生活的收入。至于他們各个人的收入，与各人所作的劳务的社会价值，究竟具有怎样的关系，仍是一个糾紛的問題，还未能找得滿意的答案。但是，除了这些收入之外，通常还有一种剩余，落到生产工具的法定所有者阶級的手里；作为所有权的結果，而不管他們是否生产方面的組織者或領导者或是否以任何方式对生产提供协助。事实上，在一切資本主义社会里，这些剩余，有很大一部分落到那些并未根据这种收入而生产任何东西的人們手中，并且其所占比重好象还在日益增加。很显明，决定財富生产上的差别的因素——在經济用途上生产性較高的土壤、地点、矿場、工厂和商店的因素，或者，在多数个别所有者由于协議或合并而形成壟断局面时，对消費者所榨取的利益的因素——为私人所有后，其所带来的这些現象，并不是由于工資的低下：即使用救济的办法，将社会中每个成員的收入提高到規定的全国最低水平，这种現象仍然不受影响。在某种情况下（即穷人貧困的减輕，会提高他們生产財富的效率，从而增加产量），这种"租金"的总数，甚至还会增加。假使那位寡妇有收集7根而不止3根蓽麻的能力，这位在客房里向窗外了望的地主，可能从她那里榨取比以前更多的蓽麻。

遺产法律

并且，把全国产品的大部分来支付对所有权的报酬这件事情所产生的影响，还是带有积累性的。小財主可能将他的全部股息用来維持他本人和家属的生活，可是租簿越大，或股息越多，則个人开支以后所剩下的余額，通常也就越大；这种余額，便通过高度組織的財政金融系統，自动地投資在生产工具的增长上面，以获取

更多的股息。所謂小康之家的主人，也許会把他的本金亏掉或亏折；但几乎所有的超級資本家都懂得怎样地去保障他們自己和后代，避免这种厄运。所以，在資本主义統治下，占有資产最多的人，事实上收入最大，但他們却不是工作最多的人；而占有資产最少的人，不管他工作怎样努力，事实上收入最少；这在現在已成为确定不移的定論。并且，两者之間的鴻沟，永远是在扩大着。就是由于这种个人財富的自动积累——旧經济学家无意識地諷刺为“节欲的报酬”——使資本主义文明产生了那种不断增加的怪物——百万富翁。再者，在所有資本主义国家所制定或发展的遺产法下，对所有权所作的支付，不只是扩大了同时代人中間收入的不平等，并且还造成了財产所有者世襲的阶級，使其中的成員，具有一代又一代无止境地从同时代的同胞身上索取他們血汗的合法权利。这一点是必須加以重視的。土地和資本的私人所有制，加上关于遺产的法定制度，无論是慈善事业怎样把它人道主义化，无論保障全国生活最低标准政策的系統实施怎样限制着其中最恶劣的过分情况，結果必然地会把社会划分为两个永久的、大致上是世襲的阶級——即一个富人国和一个穷人国。

个人收入之間和阶級收入之間太不平等的恶果，是多方面的。它們可以总結为4个主要項目：每年作为維持全国之用的商品和服务被无益地浪費；鼓励了寄生游惰生活；以及，由这两者带来的，优良风貌的普遍缺乏和对于种族的一种經常的退化影响。

財富的浪費

“就我所知道的来講，”美国第二任总統写給杰佛逊的信上說，“这个地球，可能是宇宙中的瘋人院①。”近百年来的事实，好象是

提示說,在灵魂往来的宇宙中,我們这个特别的行星,可能已被指定为太阳系的瘋人疗养院。至少,我們地球上大多数的文明社会,消費或使用千百万男女每天劳苦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方式,是合于这种假設的。我們且不必提及1914年到1918年世界大战4年中的瘋狂情况,在这个时期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資本主义政府,都用光了各該国內全部的劳动产品,蹂躪了許多肥沃的土地,燒毀了无数的建筑物,并且,有意地破坏了許多工厂及机器,目的是为了杀害和伤殘3千万左右的少壯男性青年。我們只要想一想在和平日子里每年产品的正常消費——即視为当然的消費,和富裕的人,以自我陶醉的心情,(这种心情和和藹的瘋人幻想自己是万能的上帝的自我陶醉心情一样)所承認的消費就行了。

宇宙視察員的报告

我們想象一个至善的政府派来的一个关于消費科学化的神仙专家的报告;他是派来調查这个瘋人疗养院的行星上的瘋人們的精神健全情况的。他写道:"我不能同意我的同僚——生产科学化視察員的話,他說地球上的居民已有进入健康的状态。我不必討論什么是健康这个問題。我們只要記住的是,根据我們所得的訓令,我們是不准研究地球人的最終目的或理想的,因为我們知道,甚至在至善的宮庭里,与'手段'分离的'目的',其正确性一直是一个爭論的問題。我認为,宇宙規律所許可的測驗个人或种族精神健全情况的标准,是为某种既定目的而选擇一种事后証明是适当

① 亚当斯写給杰佛逊的信,1814年7月16日;載"約翰·亚当斯全集"("The Works of John Adams"),1851—1856,第10卷,第101頁。

的手段的能力。'地球人'的目的或理想，是无爭論余地的。他們带着愚蠢的微笑，一直不知疲倦地相互标榜說：他們心目中的目的，是整个社会的健康和幸福。他們承認，在地球国家里，这就首先要依靠必要的商品和服务的有效的使用。我的同僚告訴我說：在大多数商品及某些服务的生产中，他們已有一些迹象显示着材料使用上和体力劳动及脑力工作組織上的日益增高的聰明。在財富的消費上，我覚得他們似乎是越来越坏。以前各时代的人，生产較少，可是我認为他們把所生产的东西好象消費得比較聰明。就拿地球生活中主要的3种必需品——衣、食、住——来說罢。我把視察衣的消費情况当作第一件任务。在'懶人区'里，有一些妇女，她們每个人引为驕傲的，是在制作她的服装上，消費了100到200个服装工人整年的劳役。我窺听到其中一个人在辯論可能的节約問題时說：一个工人全年的生产仅仅足够供給她'一頂帽子和一件睡衣'的需要。一个快要結婚的青年妇女，专为她个人的使用，要备办不少于79件睡衣，这还不包括需要几百个人一年以上的时間来制作的其他的服装。为了在一个女人的服装上，消費一、二百个工人的劳力，劳动力就得浪費在野蛮的装飾上，在采用不經穿的材料上，及在为每一种場合准备一套单独的行头上（我观察到一个妇人一天更換行头5次，还有一个工人紧紧地跟着伺候她）；而最发痴的是，每年总有一次或两次把整橱的衣服丢弃，以便更換时髦的新装。由于地球人的身价，显明地是根据不生产而消費的能力来估計的，这种濫用服装工人劳力的消費，也被那些收入有限的妇女們所模仿，因此，全体人民的服装，就反映了有錢人荒誕的和不健康的习慣。我从'懶人区'里轉到了服装工人自己的家里，在那里，我发現他們日日夜夜都是穿着同样的衣服过活的——不好看，不

合身，不够穿和不清洁。他們的孩子都穿着破烂的鞋子上学；并且不論天冷天热都穿着同样厚同样織物的破旧衣服。解釋是很簡单的。这些服装工人，每人每年只限于享用一个人一个、两个或三个星期所生产的衣服，而'懶人区'里的每一个妇女，則需要100或200人每人劳动52个星期来供应她。这个例子是典型的。所以，作为达到整个社会健康和幸福目的的手段来說，这地球上穿衣的消費，不能不認为是瘋癲的象征。

"然后，講到地球上某些地区由于气候而引起的住所問題。'懶人区'里的住宅，往往是这样大，并且包括这么多的空房間，以致需要5个到25个人的經常劳动专門来保持它們的清洁，以及供应那些有的有，有的沒有妻子儿女同居的居住者的日常需要。同时，甚至在最富裕的城市里，全市人口却有百分之二十屬住在一間或两間住房的出租住宅中。我确实发現过許多事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家庭，同在一間房子里工作着和居住着，其中因此发生的猥褻行为和疾病状况，簡直不堪公布。

"甚至在食的問題上——在地球上繼續生存所絕对必需的一件事——，消費方面的浪費也到了瘋狂的程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球人已經发現了关于食物消費的許多事实。他們在一个狹小的范圍，差不多可以完全准确地知道人类健康生活所需要的食物的数量和質量；他們知道少于这分量，就会餓死，多于这个分量，就意味着疾病。可是，假使我們拿生产食物所需的劳动力来作衡量的尺度，将广大群众所消費的营养价值，和'懶人区'的人所消費的营养价值来比較一下，我們就发現两者的比例差不多是1与20之比，結果是：劳动最辛苦的广大人民，經常营养不足，同时，平常絕不从事生产的极少数人，則不只是浪費食物，并且在消費食物之

中，变得木头木脑和畸形怪状。”

以上是神仙視察員关于“地球人”消費的假想报告。世間的經济学者不只是承認这种批評，甚至进一步加以闡明。現在收入上的不平等，不只是突出地导向消費方面的浪費，并且使不应当生产的东西也生产出来。世界上生产少数享有不平等收入的人們所喜爱的商品和服务的这种指导力量，竟把早期經济学家所作的一切假定——即生产大体上是自动地朝着滿足人类需要的方向，依照其迫切程度的次序进行的——一脚踢翻。这种力量为我們造成的情况是，极大数量的劳动力浪費在最无用的奢侈品上，同时成千上万的嬰儿則因缺乏牛奶而夭折；无数的儿童，在营养不足中成长着；几百万的男女，命定在飢餓忧患中生活着，并且，整个社会最迫切的需要——暫且不提关于后代幸福的主要东西——仍然沒有足够的供应。在生产工具当作私人財产的制度下，个人的“有效需求〔即个人方面沒有浪費的需求——譯者注〕”，并不能保証那无可异議的全国人民的最迫切的需要的滿足。

“有效需求”的敗坏

不幸的是，占国民总收入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二的劳动群众的支出、占国民总收入更大部分的上中产阶級支出，都同样存在这种情况。引用一位美国作家的話来說：“在現在情况下，富人的坏榜样，比他們自己的放縱貽害更大，因为它使浪費的风气非常广泛地傳播开来。模仿或赶上游手好閑的富人的努力，是有傳染性的，甚至穷人也会堕落。它不只在有經济能力的人中，并且在沒有經济能力的人中，滋生奢靡的习慣。很明显，这对整个社会的消費效率会起压低的影响①。”

消費上的浪費

实在令人惊异的是，我們在增加商品和服务产量的方法上，作了这么多的研究，而在怎样来消费或使用它們的方式上，就这样少加以注意。可是，任何商品的眞实效用，都决定于它轉入消費方面的方法上。很明显，某一种数量的商品和服务，如用某一种消費或使用方式，可能比用另一种方式获得更多的結果。就工业組織来說，这是每一个行政管理者都明白的。在企业里实行"科学管理"的"工业巨头"，都很灵敏地知道他的任务是：充分地誘导全体工作人員的动机和刺激，和把科学的成就充分地应用到他的生产过程中去，以便各种材料、各种成分、各种动力来源以及可以調动的劳动力，得以充分利用来从一定的供应中生产出最大数量的果实。但在白天工作以后，他便回到他"特别选定"的公館——"选定"的条件，主要地包括摒弃一切节省人力的設备，和使用大批的仆从——去吃一頓不卫生的晚餐，这种晚餐所化的劳动力要比他的工人为保持体力而吃下的食物所化的劳动力大 10 倍。他并且鼓励他的妻子去把房子装滿那些除浪費劳动力外别无价值的家俱和陈設。在高兴的时候，他便接受妻子和孩子們朝三暮四的請求，回答說："买吧，不过是化些錢而已。"他一方面在他的工厂里，对每种产品，提出要达到最大限度的产量的这种經济"号召"，他另一方面，在其个人收入的范圍內作为消費支票的开单人，对来到他面前的产品，作不加考虑的濫用——这种对照，只能說是非常出奇的現象。任何观察过工厂管理的人都明白，在全国的財富中，浪費 5 吨煤，并不

① 麦凱伊："美国化的社会主义"（James Mackaye: "Americanised Socialism"），1918。

是一个重大的項目，可是利用3吨煤来生产更多的产品，却是一件大事。这个眞理，在工厂用煤的事件上是如此，在工厂产品的个人消費上，也是一样。因此，对全国的財富来說，認为全国的財富完全依靠着全国的生产的說法，是不正确的。消費上的改善，和生产上的提高一样，也能够增加全国財富的总額。我們只要举出一个例子，"夏令时間"的采用，每年为联合王国带来了大約相当于2千万英鎊的收入，或者相当于它的一个煤田的全部产值。

"配給制"的影响

生产資料私有制无可避免的結果引起收入方面巨大的不平等，后者本身又引起产品总量消費上的万恶的浪費現象，这些現在已为現代經济学家所公認了。它除了毀灭"資产調度"——就是将資产作某种方式的調度，以便社会中最迫切的需要，比次要的需要，得到优先的供应——的一切可能性这一事实以外，单是为花錢而化錢的煊耀心，就可以导致人們只因价值高昂的緣故，購买和消耗許多物品。具有甚至更大的永久重要性的是：对于怎样最有利地去利用現有的产品这个問題，差不多竟沒有一点鼓励，可以誘导人們去作探討。因此，直到世界大战的紧張局势逼使我們的政治家不得不暫时加以考虑的时候，在英国也和在美国一样，关于消費效率問題既沒有研究，也沒有教育措施。在英国，对富人穷人一視同仁的临时配給制度，就某些主要物品来說，有它的一个重大的优点，就是，有空閑、有訓練、有机会的人們都致力于研究工作，不只是研究营养价值、烹制方法等显明有益的事实，而且研究家庭中节省劳力的方法和服装上最經济最卫生的式样。有人建議，同样严格的"配給制"，不是肉类和食糖的配給制，而是家庭收入的配給

制，也許可以带来更有益的效果。那时一些豪富的家庭妇女們，定必将她們的聪明才智和全副精力，从出风头的花錢竞賽移到另一种竞賽方面来，也就是，去发現怎样才能在規定的同等收入范圍內把家庭安排得最美滿可愛！的确，我們愿向那些重視艺术的人建議，假使每个消費者，最有天才的、最吹毛求疵的以及最濫花錢的人，都能够避免浪費的高价和瞬息的时髦的誘惑，而致力于探討怎样来利用社会規定給每个家庭的收入，以达到必須的效用和最大的美观，那末，家庭內部的式样設計和造作艺术、修建和布置，将出現一种全新的局面。

鼓励寄生游惰生活

在失业或乞丐增加的时候，工資劳动者一直被人提醒說："自然和道德的規律是，不劳动者不得食。"由于这个自然規律的执行，我們看到全国各地，都散布着这样的野蛮机构，如"劳动救济院"、"游民看守所"以及作为最后手段的监狱。以前，反抗的失业者的代言人曾带着特有的客气回答說：一位个别公民的劳动义务，必然地要以已否給以劳动的机会为前提；更大胆的是，工党已向英国議会提出了"劳动权利法案"。社会主义者宣称，对于中产阶級的批評，更正确的答复是：制定一种"劳动义务法"，規定任何健壯的成年人，如果发覚他沒有积极参加有全国重要性的工作，应当——不是用囚禁在"劳动救济院"、"游民看守所"或监狱的方式来殘酷地加以徵罰——而是十二分客气地取消使他們得以过游惰生活的那些收入。社会主义者深信，以法律来建立一个阶級，使他們能合法地依靠租金和股息来过着游惰的生活，这就等于在社会里安置了一批有特权的人，而这种特权又使他們无法抗拒地受着一种誘惑，将

自己置于"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自然和道德規律"之上。这种社会寄生性所給予社会的損失是十分大的，但是它給予寄生者本人的影响，危害还要大些。我們已經看到，那些处在"規律之上"的人們，无可逃避地是殘酷无情和盛气凌人的。这些缺点，虽則他們往往感覚不到，但危害性并不因之减輕。他們这种不自覚往往会使他們，对于不属于自己阶級的人所受的痛苦，感到好象对于另一个物种的痛苦一样，看做是不眞实的和无足輕重的。有产阶級漆黑的良心，看不到这个显而易見的眞理，就是，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方面，只会消費而对世界毫无个人貢献的男女，只是社会的寄生虫，他們的出現，使世界相应地变得更穷了。这种人，既不是殘弱无能，又沒有准予退休，正如罗斯金徒然地說的，是一个窃賊，并且，这种窃賊虽然經过法律的許可，仍是一个眞正盜窃的窃賊，一个被人憎恶的窃賊。甚至寄生阶級的智力也受到了毒害的影响。这不只是从許多科学发明家或文学艺术天才往往不出于百万富家这一事实，可以看到的。只有智力方面微妙的衰亡这一理由，才能解釋：为什么几乎不可能使一般有錢人了解，更不可能使他們相信到一个經济上的显明眞理——这个世界，是由于他而相应地变得更穷了，这不只是由于他沒有作出相等的个人生产而消耗掉衣食，并且是，由于他根据个人的欲望和放縱而进行的浪費；再者，在他的場合下，"花去的錢"不只是沒有"貿易上的益处"，并且，事实上，由于他的購买，借以供給他自己任意使用的緣故，减少了世界上商品和服务的儲备，而这部分儲备，若不是被他們所浪費，就可以用来改善普通公民的困难境遇，或者促进科学的发展，和培植艺术的向上发展。世界大战的震撼，也不过打开了少数富人的茅塞，使他們看到这个眞理，而且，到了今天，恐怕他們又已把它置之度外了。

无意識的盜窃生活

这种有产阶級游惰分子很有嫌疑的无意識的盜窃生活，連同它所滋生的、对于除本阶級外别人的痛苦的冷酷心腸和傲慢态度，不仅对富人有这样微妙的腐蝕作用，同时对于那些无力把自己置于世界法律之上的人們，在思想和品德上，也給予了不良的影响。一方面是由此而生的奴才性，另一方面是由此而生的羡慕心，或者，甚至对一种基本上違反一切道德原則的生活所抱的单純贊賞心，这对于穷人也和对于富人一样，都是有腐蝕的影响的。富人对于穷人的仁慈，实际上是使两方面都更加堕落的。一切慈善施与——基于个人友誼者除外——都使施与者和領受者的道德，同样地受到敗坏；而在彼此感到社会地位不相等的人們中間，饋贈礼物，无論用意多么良善，方式多么巧妙，总不免带有勾結循私和寅緣寄生的毒素。对有錢的男女，仅仅由于他們有錢的緣故而給予的尊重和敬佩——不管对他們有无好感，或由于他們的个人吸引力，或艺术方面知識方面的成就——对于授受两方，都是同样有害的。一个同样严重的毒害是：它伪造了社会的价值，并抹煞了本身确实值得贊賞的品德和智力的本質，从而阻碍了它們的被人仿效。可以不算过分地說：在今日的英国或美国，只要在任何附近区域有一个不事生产的富戶存在；即使这个家庭管理得很好，也会由于他們的坏榜样削弱全区的生气，降低做人的标准，敗坏人們的道德，并且在同样的程度上抵消教会和学校的工作。

“在法律之上”

假使一个人自己在商业界、金融界、司法界或行政方面，为生

活而劳动，由此并获得报酬，从而使他跻入有錢人的行列，那末，由于每日服务的貢献，他可以避免某些个人的腐化，虽然由于他收入的优厚而受到别人过分的尊敬这一事实，也带来了它本身的危害。可是他的妻子儿女，則很难逃避他們寻常消費过度和劳动不足的种种恶果。妻子的职业差不多确定地是对社会方面沒有生产性的，同时她在家里和店里接触到的奴顏婢膝的气氛，也一定危險地带有腐蝕作用。孩子們則都在腐蝕的物質奢靡气氛中成长。他們无法逃避一种前面已經解釋过的"我在法律之上"的感覚，虽然这种感覚也許从来沒有在他們的理智意識中实际出現过。他們所受的正式学校教育本身，也被阶級气氛引入了邪途。其中有些志气不特别高的、自我牺牲的热情不特别丰富或对科学知識的愛好不特别深的人，假使就业的話，也几乎必然地是在由于家庭地位而給他安排的崗位上，滿足于"鬼混过关"的生活，通过腐化的平庸的努力，获致平庸的結果；并且，在事实上，終身奉行一种为手艺人所引为羞耻的巧妙的怠工，或俗称"磨洋工"政策。沒有訓練、沒有紀律的游惰男女錯称为工作的那些权宜之計的工作——即慈善的、艺术的或单是社会的工作——也不能改善这种腐化的情况。理智的和道德的健全，以及公道的要求是：任何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支出他的收入向社会定購的"定貨"，必須以他自己的劳动成果来作交換，以便滿足社会中其他成員的"定貨"，假使这个成員在国民收入中也有他合理的一份，并且可以支配它的話。如果他愛好"孤独生活"，不愿服从别人"定貨"的要求的話，那末，至少就須叫他不要"定貨"；就是說，他的消費不得超过他本人的生产所得。除此以外，一个人与另一个人間的經济关系都是令人作嘔的自己騙自己和自得其乐的关系①。出乎寻常的是，那些个人主义者的哲学家們，平日一直高

唱竞爭对于生活的刺激作用（如象市場价值所測驗出来的結果），但关于寄生生活对那些优良后代（即这些哲学家們所認为本身已經証明出来是优良血統的人們的后代）的腐蝕和墮落影响，則泰然加以認可。我們很难看出，这些理論家怎样能够逃避这样的推論，即社会的和人种的进步要求：取消产生股息的財富的繼承权利，并且，同时也一起取消不劳动而生活的机会；就假定单是为了每一代

① 关于这个題目，在美国出版了一本杰作（梭士坦·費布倫："有閑阶級的理論"〔Thorstein Veble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1899），它把有閑阶級的起源，追溯到以两种致富方法为基础的古代文明，这两种方法是：狩猎、战爭、对于低級民族的劫掠和压迫等掠夺和强占的"光荣的方法"；以及强加于妇女和奴隶的个人劳役（农业和手工业）的"不光荣的方法"。这种傳統，經过了一些修改，一直傳到封建文明的时期，那时貴族（本身仍忙于使用着掠夺和强占的光荣方法）的妻子和女儿們，都不担任任何有用的职业，而变为"高貴仕女"。"从这时起，有閑阶級生活的特点，便是突出地免于从事一切有益的工作。……回避劳动是社会財富的傳統标記，因此也是社会地位的傳統标記；这种贊美財富的风气，也就导向了更加崇尚游閑的风气。……到了后来，习慣竟把劳动当作不只是公众眼睛中不名譽的事，并且在道德上为貴族、自由人所不可能做的及与高貴的生活不相容的东西"（同上書，第40—41頁）。在現代的資本主义社会里，男人則追求发財，但不是通过仍被認为不光荣的体力劳动，而是通过領导、組織、討价还价、投机取巧的方法——这些都是掠夺者或剝削者的表現——可是，他坚持要他的妇女輩，有时还要他的儿子們，代表他过着游閑生活，借以标志他的社会地位。特别游手好閑的效用和为建立社会地位的消費，是决定于浪費这一个因素——即担負金錢損失的能力。"时間是被不生产地消耗着，原因是：（1）由于对生产工作的不重視，和（2）作为过游手好閑生活的經济能力的証据"（同上書，第43頁）。除此之外，再加上奢靡的花錢。"貴重物品的惊人消耗，是有閑人士借以聞名的手段。到了手中的資財累积到很多的时候，单凭他自己的努力来运用这种方法，还不足以显示出他所有的資財。于是，他就不得不用饋送珍貴礼品、举行闊綽的宴会等方式，邀請朋友們和同他竞爭的人們来协助"（同上書，第75頁）。書中关于"突出的有閑"，"突出的消費"，"生活的金錢标准"，"趣味的金錢規律"，"表現金錢文化的服装"，"古代特性的保持"，"遺存在現代的豪勇气概"各章，在說明資本主义国家有閑阶級的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的青年——甚至資本家自己的儿女——不致于被剝夺自由竞爭的幸福果实，也应当这样做。

优良风貌的缺乏

但是，对于收入和个人自由的不平等，还有另一种根本相反的辯护理由，現在坚持这种理由的人，比公开提出它的人，往往还要多。有很多人感覚到，优良的风貌，高尚的修养，个人的魅力，和甚至人类的尊严，都要靠着一些处于"不劳动不得食"的自然規律和道德規律之上的家族的存在，如果这些家族是世襲的，那末更好。現在"大人先生"和"高貴仕女"的主要标志是，在他們或她們的日常生活中，沒有个人的苦役，沒有听人指揮的义务，和沒有无休止的金錢顧虑；他們或她們整个生活的目标，就是获得一种自由，借以发展对社会有利的新才能，虽然这种才能不能做出可以交換的商品或服务。与这一点相結合的是，作为个人品質的一种慣于发号施令的吸引力，即一种个人尊严的表現形式，及往往随之而来的一种用威胁来利用别人服务的习慣。

恶劣风貌的必然結果

我們要順便提一提，那些鼓吹具有优良风貌的貴族阶級的社会利益必須以財富和摆脫强制服务作为基础的人們，好象沒有注意到貧困和劳役在大多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所起的"恶劣风貌"的作用。在現代的工业国家里，无論是旧大陆也好，新大陆也好，我們所看到的市区貧民窟里的典型居民，就是所謂"大人先生"和"高貴仕女"的一个对照。象征很大部分工人区的野蛮、粗鄙、不顧别人的叫囂、卑鄙的背地誣毀和謾駡等行为，迫使着其中較"自愛"的

人們，由于感覚到社交往来的不可能，不得不采取他們所謂"独善其身"的政策。由于"恶劣风貌"的悲惨事实，成了貧民窟的象征——这种事实比自私、殘暴或缺乏互助，还具有更大的象征性——所以人人都要坚持"大人先生"和"高貴仕女"的称号；同时，那种光荣的男人或女人的称号，只是和咒罵的形容詞一道当作一种凌辱的名詞罢了！

但是，我們所要强調的事实，不是穷人的野蛮化，而是富人的下流化。我們否認現代工业国里的有閑阶級提供了任何优良风貌的标准的說法。相反的，正如老輩的貴族自己所痛悼的，現代的資本主义社会，一面頌揚利潤的牟取，一面又奖励奢靡的游惰，其特有的罪恶之一是乱貌的堕落；这种罪恶，由于容易被人仿效，所以比貧民窟的粗鄙野蛮更加有害。

丧失原有职能后的影响

很有趣的是，在世界历史中，那些强迫利用别人的劳力以便使自己摆脫辛勤的工业劳动的一种人，当初除了过着"美滿"的日子外，还有他們自己特殊的社会职能。他們过去曾为了本族的食物而进行狩猎；为了保卫本族而进行作战；他們致力于好象是本族的幸福所系的祭司职务；在古代的希腊，他們是哲学家和艺术家，在共和时代的罗馬，他們是政治家和法学家，并且往往是被征服的人民的統治者或管理者。只是到了資本主义时代，才产生了一大批脫离了生产的人，其中大部分的男子和几乎全部的女人都沒有一种独特的职能，并且否認負有任何为社会服务的义务。我們已經評述过由于沒有任务的富人阶級的存在所产生的罪恶——风貌上和道德上的堕落，以及腐蝕别人的风貌和道德的微妙影响。在

資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現代社会里的有錢人家中，曾經当作有閑阶級的社会美德的堕落，还有另一个原因。必須承認，最能发揮这些社会美德的，是象路易十四王朝的貴族、卡罗萊納或弗吉尼亚的旧地主家庭或者日本的武士那样的貴族阶級——他們的生活本质，就是摆脫有意去从事賺錢的活动，和維持一种严格的等級制度。可見，很明显，把活动作这样的划分，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它沒有自然的基础。假使資产阶級眞正忠实于封建主义，而只产生政治家或軍人、运动家或艺术鑒賞家，也許还可能維持住中世紀式的稳定的不平等。可是大自然并沒有理睬資本主义。在資产阶級的后代中，政治家和艺术鑒賞家的出現，如同在产生奧尔賽及李西略的那个阶級里一样，是非常少的。資产阶級活动的精神，多半包含着下流的野心、下流的才能和下流的趣味。这些活动的精神，与其說是合作性质的，毋宁說是竞爭性质的：他們愛好的是成功，成功就是发財，以及发財所带来的个人权力和威望；而大企业活动中的投机賭博成分，更为这种愛好加上了富于魅力的情趣。在現今的日子里，旧的世家的活动分子和暴发戶的活动分子一样，都在生产工具的組織和管理上，鈎心斗角，追求利潤。这种影响，已变得无孔不入；就是最大的富豪，也不能免。今天的"有閑阶級"，在英国和法国的，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不只是远沒有跳出金錢的追逐范圍，并且是被聚集更多的金錢的欲望所支配着，对于各种生产的形式与法律所許可的各种謀利方法，都是一視同仁地加以采用。現在已不再有貴族阶級、資产阶級和工人阶級了。現在有的，只是一个富豪阶級和一个无产阶級；并且在无产阶級里，旧有的特征，还是当作理想被保存着，和在实际上被悲慘地模仿着，同时，在富豪阶級里面，則富商巨賈与王公大人，同吃同坐，他們都是沆瀣一气的有錢的商

人而已。

企图把有閑阶級的貴族式理想跟資产阶級賺錢的努力結合起来，其結果就是一种最丑恶的风貌① ——至少，对我們的口味来說是这样的。閑情逸致的伪装；出风头的和无益的开支的愛好；凭价格来衡量物品优劣的識見；根据財产而不根据品質或成就来評价别人的眼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于每个人"社会地位"捉摸不定的神情；对百万富翁的阿諛献媚的态度；从占有感所产生的令人难堪的傲慢；以及認为别人在社会上都低我一等这种观念所包含的妄自尊大——所有这些在一切資本主义国家社会里都存在的特征，在我們看来，使得那种認为在現代資本主义文明里优良风貌有賴于有閑阶級的存在的說法，变成荒謬絕倫的笑談了。

眞正优良风貌的出現

社会主义者对于这个問題的看法，并不只是限于这种消极的

① 正如費布倫所指出的，貴族阶級的或野蛮的統治阶級理想所依靠的，不仅是完全回避体力劳动，并且也回避工业、商业或投机各方面牟取利潤的脑力工作。假使說貴族阶級的人是游惰和奢靡的人的話，那末，至少，他也是不从事于积极謀利的人。另一方面，桑巴特指出：旧的資产阶級統治阶級理想在資本主义早期可以看到，那时游惰和奢靡都被認为是两种致命的罪恶，而个人勤劳和个人儉朴却被認为是最神圣的美德。"'把螞蟻当作你的模范吧'，——达·芬奇(1339)的父亲、当时最有名的資产阶級分子写道，'它們今天已把明天的需要准备好了。你必須儉朴和有节制'。"(桑巴特："資本主义的本質〔Werner Sombart: The Quintessence of Capitalism〕"，1915，第111頁)。美国資产阶級理想的創始人富兰克林写道："为要保障我作为一个商人的信用和品德，我不只是要小心地去做一个勤劳和儉朴的人，并且还要避免相反的表現。我穿得朴素，并且在任何地方沒有人看見我有閑散的消遣：我从来不出去釣魚或打猎"(同上書，第123—124頁)。現代資本主义有閑阶級，已經把貴族阶級和資产阶級两者的理想的优点失掉了，而保留了它們的缺点。

批評。他还深信，"优良风貌"的新观念，正在民主主义国家里作为民主政治的果实出現。当一种确定的社会阶級制度不能維持，和社会交往必然地要普通化和复杂化的时候——如民主选出的团体成員間的共同身份，或者如公共汽車、电車、美國的火車和現在英国火車的"三等坐位"的共同使用——代替坏风貌的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相待以礼的共同标准。事实上，这就是在現代日本某些边远地方形成的优良风貌；在那里，貴族或百万富翁和看門人間，大地主和他的每一个种稻及种蘿卜的佃农間，都用同样的礼貌互相对待。在对人的关系上，礼尚往来的观念，还在現代法国的典型"文明"或文雅风气的根子里存在着，这是法国，由于大革命遺留的傳統，胜过比方說1871—1918年的德国的地方。我們应当还記得，在1879年，馬蒂·亚諾尔德批評当时英国的世襲貴族和富豪貴族时，选定的句子是"在基督教的語言里并不陌生但还沒有記入我們記录簿里的一句惊人格言：'选擇平等和逃避貧婪'"。① 社会主义者同意馬蒂·亚諾尔德的話，深信"选擇平等"是优良风貌的主要因素。

优良风貌的这种基本条件，曾时常受到那些一直被認为是这方面的表率者的承認，但只限于等待已經加入到他們的特殊社会等級为成員的人而已。在所有的时代，在有礼貌的圈子里，凡是屬于圈子里的人，彼此在社交上都指望平等对待。我們已經把这种社会平等的观念，推广到餐桌上面。当食物仅够分配的时候，我們不会求取比均分的一份还要更多的东西。我們現在不会認为，拿比餐桌上其他的人所喝的价值較賤的酒分給女管家，或甚至拿

① 亚諾尔德："論平等"(Matthew Arnold: "Equality")，載"杂文集"("Mixed Essays")，1879。

較差的肉类分配給佣人去吃，是合乎紳士风度的。但是，对于眞正同我們在这个世界的餐桌上共食的广大同胞群众，却只有极微小的少数人遵守这种优良风貌，甚至在那些自認为有教养的人士中間也是这样。不过这又是不可避免的事，因为大自然仍是固执地拒絕合作，它使富人在内心上有比穷人优越的感覚。天生的貴族阶級对較穷的可怜虫表示十二分的礼貌，是很容易的事。他的特权沒有被否認：普通人对于他的謙虛，是会受到感动的，并且亟愿表示他也知道怎样来尊敬这种眞正的品德——正如他所說的，在看到一个君子的时候，他就看得出这人是一个君子。可是富人并不是生来就有这种优越性的：他們和其他的人們一样，也是一般的貨色；而且他們在比較奢靡环境中的成长，还使他們养成了一种为所欲为的习气，并指望着一种与自己品格不相称的优先权利。他們既然沒有天賦的优越性，于是就不得不以傲慢的态度来支持他們的人为的特权，并以花錢的本領来显示他們的力量。沒有这类傲慢和花錢，他們可能还只配做他們自己的侍女和厨司，虽然一般的侍女和厨司还比他們要漂亮一些和有礼貌一些；的确，侍女和厨司們如果不是这样的話，恐怕不能得到好的位置。

在这种情形之下，向那些只有一般水平的品德但有特别多的財富的人們談优良风貌和合理节儉，是毫无用处的，至于对那些在水平以下并且生来就是卑鄙、粗鲁、自私和愚鈍的人們——收入以成千英鎊計算的也好，或是以先令計算的也好，都是一样的——就更不必提了。恶劣风貌就成为，即使不是完全强迫的风气，至少在实际上也是无可避免的风气；并且，正如每个阶級里风貌的公認标准就是該阶級每个人习惯的行为一样，大多数的人就会認为，他們的傲慢和奢靡，在破坏优良风貌方面，并不比他們自己和家属所花

的錢和所作的消費还要严重些。因此，他們就从这个世界上窃取了偶然的幸运給予他們的財富，而不管这种財富的消費在最完滿地完成他們对社会应尽的职責上是否需要。

事实上，在今天的美国和英国，阻碍着普遍采用优良风貌的民主观念的，是在各家族之間——在社交日益复杂的現代，这种家族間的接触，已轉变为个人間的接触——存在着物質状况和个人自由的不平等。由于这个理由，最优良的风貌，現在能够看得到的——这里所提的只是我們的意見——不是在英国的"一万个高等人"中間，或紐約的"四百閒人"中間，而是在物質状况实际平等、不靠有关的占有权而靠其他条件来决定其社会地位的某些社会阶层里。我們可以把大学区里学术界的家属、旧式行业里遺存到現在的技工以及仍属穷困和被人看不起的教会牧师，列举出来作为例子。社会主义者的主張是：如果我們要做君子人的話，我們不只是要在直覚上避免夺取比我們应得的同等部分更多的生活資料，并且要在我們的社会制度上，特别在所有同胞間文明生活資料的集体分配上，遵守一个基本格言："选擇平等，逃避貧婪"。

种族退化的影响

对于个人財富的不平等以及資本主义社会对它的重視所造成的社会等級現象，还有一点值得控訴。蕭伯納先生在着重提出个人間財富悬殊所造成的恶果和收入平等理想是社会主义信条的基本部分方面，曾比任何其他的社会主义者作出了更多的貢献，他对这一控訴，曾以特别的責难方式，表示他的意思。他說："除非等到你們选擇配偶的范圍大大地扩充了，并且，扩充到包括整个社会的程度，我不相信你們会在种族的改良上能够有所进展。只要想一

想現在所发生的情形。譬如說，我是一个少年，在牛津街上走路。我看見了一个逗我喜爱的女人。我很爱她。在一个有知識的社会里，很合理的办法好象是，脫去我的帽子，对这位女士說：'对不起，你对我发生了很强烈的誘惑，假使你还沒有訂婚的話，可否請你把我的姓名住址記下，并且考虑考虑是否愿意与我結婚？'可是，現在我却沒有这样的机会。也許在我遇見这个女人的时候，她是一个临时的女佣，我不能同她結婚，或者她是一个女公爵，她不愿同我結婚。我特意地选擇做临时的女佣和女公爵作为例子；但实际上，我們中間的距离，比这个例子划分得精細得多。我們划分了許多阶級的区别；这些区别都是以收入的不平等作基础的，它們是这样地窄狹和这样地細微，以致我在英国各地各阶級的听众面前，一次又一次地說：'你們很清楚地知道，当輪到你結婚的时候，作为一个年輕的男人或一个年輕的女人，你实际上沒有从4千万人口里未結婚的青年中間，选擇与你年齡相合的伴侶的可能。你最多只能从两三个人中选擇，而你如果有更大的选擇自由的話，則你可能选擇出来一个比从这两三个人中选擇出来的任何一个更为中意的人。'这是你們諸位熟知世事的人們所不可否認的事实。結果是，你們所得到的，不是一种适合于自然进化的婚姻选擇，而是一种阶級性的婚姻选擇，換句話說，是以金錢为轉移的婚姻选擇。在这种状况之下，你們之获得低級的和庸劣的傳种，还有什么稀奇呢？我相信，这个道理比我所能提出的任何理由更能使人了解。我曾用这个道理，使許多不能象你們这样体会經济論証和听不进政治論証的听众們，获得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我說：假使所有其他論証都不存在的話，那末，有一个事实却是明显的，即，收入的平等可以使整个社会从其一个极端到另一极端都有互相通婚和給一个年輕男

人或女人在全体人口中选择对象的权利——我說，单是这个論証，以及随之而来的种族进步的結果，就能使人信服①。”

在我們目前的优生知識的情况下，对于这种根据一时的冲动完全自由地选择配偶的呼吁，我們或許会表示异議。可是，我們必須記得，在蕭伯納先生的前一代，佛兰西斯·加尔頓已經决定性地証明，金錢利益的动机——即蕭伯納先生所謂“金錢的婚姻选择”——造成了最优秀血統逐漸絕孕的結果。

“金錢的婚姻选择”

除了加尔頓对于每代最有成就的人們在选择女嗣的偏爱上所造成的社会恶果，作了統計的說明外，我們还可加上这种选择对于出生率的恶劣影响，这就是，法国农民和一般小資产阶級，为了集中仅有的小量遺产起見，所采取的独女嫁独子的选择。在英国和美国，我們看到，在富有人家中，也有类似这样的“招女婿”的趋势，以便“把錢財集中在家里”。与这种办法相同的是，重視女儿的金錢利益的父母，甚至往往不顧年龄不称、身体衰弱、意志力缺乏或智力低能等缺陷，爱挑选更有資財的女婿。在許多高等的和低等的社会圈子里，我們看到了这种选择配偶偏向的最有害的形式的表現，人們为了追求拥有資財的丈夫或妻子，竟不惜和身体不适宜于健康的結婚的人甚至道德堕落或意志薄弱的人結婚。这种对优生有害的金錢选婚的另一面，是在所有阶級中最不顧后果和最荒唐的人們中間，尤其是在我們的大城市中无經常工作的最穷困的阶层

① 在倫敦自由党中央俱乐部的演說，“拥护平等”(“The Case for Equality”)；載“大都会”(“Metropolitan”)，紐約，1913 年 12 月，并在倫敦以单行本印行。

中間(他們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注定永远地互相通婚下去的)，不顧利害地在那里繁殖，其結果是，在优生方面所給予社会的灾害，与那些顧及后果而謹慎的人們过分限制出生率带来的后果，并无区别。

以金錢为轉移的婚姻选擇对于政治的影响，当另行論述；不过格林尼有一句俏皮話，可以在这里引用一下。他嘲笑一位先生，通过与一个很有錢的工业家的女儿結婚，获得了下議院的議席。格林尼称他为"依靠裙带关系选出的下議員"。实际上，这位先生有他在竞选中当选的理由；但是，这种偶然发生的事故，却减少不了这个諷刺射出的光芒的强度，这种諷刺是对着收入的不平等腐蝕下議院(已經有不少"依靠裙带关系选出的下議員")并且同样地腐蝕整个代議政府制度的力量而发的。

第 三 章

个人自由的不平等

在資本主义国家里，还有另一种不平等現象，工人对它也許反对得更为激烈，可是統治阶級对这种現象比对收入的不平等还要更加难于理解；这就是在个人自由方面的不平等。当然，自由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名詞，有着各种各样的和互相冲突的含义。对某些思想簡单的人来說，自由只是奴役的反面。对他們来說，任何不被别人当作动产的人，都是自由的。漂泊在无人島上的失事輪船的水手，和游蕩在强大警察保护下的有产阶級中間的貧穷的无賴汉，都是"自由人"，因为他們"不称呼任何人为主人"。不过这种自由比起走向死亡的自由并不見得好些。在現代的工业社会里，由于沒有人能够生产他自己生活上所需要的全部东西，个人自由与获得别人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必然分不开来。用日常生活的詞句来說，个人自由实际上意味着个人購置足够維持健康的衣、食和住等方面东西的能力，以及获得足够发展其智力的教育和書籍的便利。再者，由于我們不能承認那些仅仅肉体活着的人是自由的人，所以自由还意味着有时至少可以有少許的錢来作休假和旅行、社交和娛乐以及欣賞大自然和艺术之用。事实上，我們可以下一个定义說：个人自由就是发展我們的才能和滿足我們的欲望的机会

之获得。葛莱韓·瓦勒士教授提出的定义是:"繼續不断的主动能力的可能性。"在这种意义之下,"自由"确是一个相对的名詞。那些豪富的人,即那些享有消耗他人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而自己摆脫劳役的自由的人們,阻碍了一般人这种"繼續不断的自发能力"的发展,并且通过吸取他們的能力和时間的方式,来扼杀这种主动性。任何穷人的自由,都是极其有限的。对于无資产的工資劳动者来說,自由的意义,除了在飢餓的边緣带着永久劳役的創伤苟延生命外,再也沒有别的东西了。所以,收入方面的不平等本身,就带来了在个人自由方面的不平等。

"法律上的平等"

在資本主义的統治之下,我們对于表面上的所謂自由公民之間个人自由的不平等,已經是这样地习慣了,以致沒有認識到,就是在我們声称奉行平等原則的地方,不平等的現象,还是多么严重和殘酷。英国和美国向来是以实行"在法律面前大家一律平等"的原則自豪的。可是一个人如果不付訟費的話,就是向法庭乞求公道,也是不可能的(虽然政治家和有錢的人們拒絕承認这个事实),而这确在实际上阻碍了广大群众为时常受到的損害获得法律救济的机会。設立法庭的目的,就是保障人們的个人自由——使其免受毆击、盜竊、勒索、侵吞以及毀約和賴債等行为的損害。在每一个英国或美国的城市里,絕大多数的人民,从来沒有以原告的身份出現于民事法庭的,这并不是由于他們从沒有被人毆击过和盜竊过、欺騙过和賴过債——每个人必須知道,这些罪恶,加在穷困无援的人身上,比加在富人身上的,还要經常,有时还要普遍些——而是由于他們从微薄的收入中,出不起这笔訟費,更不必說到律师的公

費。但貧富之間个人自由的不平等，在刑事法庭里違反法律的控訴上，更加惊人。富人除了在杀人之类的重大案件外，通常是由傳票傳喚到案的；穷人在同样的犯罪案件里，則更通常地是，与往昔一样，强制地加以逮捕，并且还要押解监牢，听候提訊。在决定再审的时候，富人很容易获得保釋，而沒有資产的被告，則絕大部分都是押回监獄。这种手續，再加上他們的缺乏金錢，至少使他們在搜集可以証明他們无罪的証人上，或者在获得为他們辯护的支援上，得不到便利。至于富人在聘請最干練的律师和专家証人方面，或在获得裁判管轄区域的变更和連續的再审方面，或在从一个法庭移轉到另一个法庭的拖延方面，占了更多的便利，就更不必列举了。在定讞的时候，大多数的案件都是处以罰金的；这对于富人实际上算不得什么，而对于穷人，則可能对他自己、他的小营业和他的家庭带来毀灭。再就一般的違警罪法庭法官或治安司法人員来說，将那些大半不能繳付小額罰金的人們，改处一、二个星期或六个星期的拘押，是很当然的事。尽管监獄一向是人們認为毀灭犯人及犯人家属的所在，而在美国和英国，每年还是成千上万的人被押进去，仅仅是为了他們沒有能力为所犯的小罪立即繳付几个先令或几块美元的罰金，而这些小的犯罪行为，富人們却是实际上等于毫无处分地經常犯着。沒有任何一种个人自由方面的不平等，比在法庭面前富人和穷人間的这种实际的不平等，还要更令人伤心；这是每一个資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也是百年以来每个法官、每个执行律师业务的人們所熟知但始終沒有得到糾正的罪恶①。

① 見帕銳："法律和穷人"（E. A. Parry: "The Law and the Poor"），1914。

心理上的反应

但由收入悬殊直接产生的这一切結果，只在物质方面解釋了个人自由的問題；它还沒有說明这問題的全面。个人自由，还有心理的一面；它是完全从人与人間的关系而来的。即使是在工資劳动者获得了所謂"好收入"和固定的工作时，他也还反对一种事实，即：他象他所使用的机器一样，是作为一种生产工具而被人購买的；他的每天生活是被当作达到别人目的的一种方法。为什么他同他的阶級永远地要服从命令，而另外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級，一直要发号施令呢？就是这种把发号施令的职权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阶級手里的現象，和把服从别人的义务相应地集中在另一个阶級的人們的現象，才造成了"富人国"和"穷人国"之間最深刻的鴻沟。高尔斯华綏先生，在他所著的一本小說里，曾生动地描写过英国一个郊外别墅里的日常生活和一个工人茅舍里的日常生活的对比。富人和他的妻室儿女，早上起床的时間，随心所欲；吃的东西，也随心所好；做的"工作"和怎样去做，以及玩的玩儿和怎样去玩，都随心所爱；他們整天的时間，都由自己的本能或冲动来支配，或者由自己的理性或意志来决定。从早到晚，他們永远是在做自己乐于去做的事。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他們对别人发号施令以发展自己的个性，和使用着瓦勒士教授正确地指出的"繼續不断的主动性"。至于工人和他的家属，則永远服从着命令；按照命令起床，按照命令工作并按照命令規定的方式工作，按照命令停止工作，由于被地主的命令逐出老家，只得按照租地农业家的命令住上这間茅舍而不能住到那間茅舍，按照命令上学，有时甚至按照命令做礼拜；按照貧穷救济法賑济官員的命令享受医葯的救济，并且，在有

些事件中，按照着命令到劳动救济院里終其一生，虽然，在英国的宪法之下，这个生命在法律上和政治上是属于自由人自己的。从早到晚——除了"休工"时期稀有的几小时外，(但这几小时的休息还是付了痛苦的代价的)"工人阶級"一直是在做使人厌烦的或不愉快的工作。在英国，所謂統治阶級(包括直接参加政府工作以外的許多人)是典型地过着发号施令的生活的阶級。所謂"下层阶級"是那些依靠服从命令过活的人們。

可以服从权力的时候

任何人不要以为这些下层阶級，或拥护他們的社会主义者，甚至任何有常識的人們，是在反对一个人施权力于另一个人身上的。資本主义工业組織令人反对的地方是，富人对穷人、土地及資本所有者对依靠使用生产工具謀生的人們所发的命令的数量和种类。資本家和地主的权力是有其令人憎恶的特性的。它对于服从命令的人是控制着其終身的；它是不負責任的和不能清算責任的；它是决沒有相互性的；它也不是根据执行这种权力的才能或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精神来决定发号施令的人选的；最重要的是，它的企图，不是为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而是为促进发号施令的人的个人欲望或私人利益的。除无政府主义者外，沒有任何一个人反对：警察在拥挤的街道上指揮交通的权力；卫生检查員强迫将私人房屋的水管衔接到主要下水道的权力；公共卫生官員强制隔离傳染病人的权力；或者，甚至收稅員的繳稅通知書。沒有任何人反对鉄路管車員所发的"請坐下"或"在此換車"的命令。所有这些命令，都是在公民生活里某种特殊場合中发布的，并且是由那些被認为适合于发布这些特殊命令的人发布的。发布这种命令的人們本身也在别

人的命令之下行事的；他們对上級权力負責；他們如果作风不良，或"濫用职权"，都要受到查究。再者，他們的命令，从好的意义来看，是大公无私的，与他們个人的私利或便利毫无关联。我們对于越职的或所用方法不合的官員，可以提出控訴。我們对国家行政当局的政策，可以提出反对，对議会的立法，也可以表示遺憾。在服从这些命令方面，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都是一律平等的；并且所有的人都有向上級权力机关上訴的同等权利。最后，在政治民主里，受制于权力的人，恰恰就是創立这种权力的人；他們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权力推翻。他們以选民的身份，可以通过議会和当时的政府，对要求他們个人服从的一連串的命令，集体地执行最后的控制权。

在这一点上，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者对于在二十世紀頗为时髦的一句成語的解釋。我們常在工人的聚会里听到說，一个人应当"控制他自己的劳动生活"。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男人或女人在飢餓綫上的工資或过度的工作时間条件下，或在最不愉快的情形下，应当自由地工作。这是資本家代工人所要求的自由。为了反对这种自由，社会主义者和有組織的工人們已經作过了一个世紀的消耗战，其中所得到的胜利果实是工厂法、矿場和鉄路管理法、最低工資标准法等等。相反的，革命工人的所謂"控制他自己的劳动生活"，意味着他的工会，通过他所选举并且能够撤換的执行委員会和职員所执行的控制。这些工人的代理人的进退（对于那些仍旧愚昧地認为工会是独裁机构的人們来說，这好象是似是而非之談），都决定于他們为选出他們的人們保持或增加个人自由的能力。工人的革命不是反对权力本身，而是反对牟利的雇主們連續不断的和毫不負責的权力。他們要問：工厂和矿場、土地和机器

的所有者，凭什么有独断他們无数同胞每日生活和每周开支的权力，并且，甚至有随意断絕这些人的生路的权力？这种权力并不是从民众的选举得来的。它和掌管它的人們才德方面的考核，毫无关系。在許多事例里，它甚至沒有带着为它的对象謀取精神福利或物質福利的絲毫責任感。不仅在这种强迫工人服从的特殊命令跟国家的安全或兴隆之間，毫无必要的联系，而且由于命令作假和命令欺騙的事实十分普遍，时常引起两者之間很大的和显然的矛盾。从工人的观点来看，資本家和地主的权力是用来达到貪污的目的的，即增进发号施令者的金錢利益。

关于物質环境的壟断

沒有对工資制度的組織方式作过細心分析的人，很少能够对那些支配工人生活的一連串命令的持久性和壟断性，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但是有产阶級之支配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还不只是这些一連串的命令而已。由于更加細密的并且难以看出的財富不均的結果，出現了更加危險的一种現象，即資产阶級所拥有的、繼續許多年的、支配某一个地区所有居民的（不单是工人）物質和精神环境的力量。这种力量最惊人的具体表現是乡村的逐漸"工业化"，結果是：通过用水和空气的不断沾污、草木作物的摧毀、妨害他人事件的产生和肮脏街道弄堂房屋的兴建等等，形成了城市貧民窟的地区。正如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某几处最肥沃的和最美丽的地方（美国也是一样），由这种方式所产生的破坏，只有近代长期的战爭所造成的破坏，才能和它相比。在和平的时候，这种由土地和資本私有制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工业中心带来的灾害，是不会被社会上一般人及时了解的。等到这种罪恶已

經被人看出来的时候，整个一代人民的健康和幸福已經受到了致命的影响。那时，过了时的法律和来得太迟的規章，也許最多也只能减低用水的沾污程度，减少有毒气体和煤烟污染空气的程度，或許甚至挽救仅存的草木的生命。但是，沒有任何办法可以把資本家的独裁所摧毀的生命，挽救回来。閑逸的富人，是可以逃避他們的权力所一手造成的噪声、阴暗、肮脏、煤烟和臭气的；可是工人們，工业中的脑力劳动者們，以及跟随他們在一起的各种职业的从业人員和店員們，則不得不在工业和金融組織者为牟取私人利潤而在无意中为这些不幸的人們决定的丑恶情况下，居住下去和安頓家庭。当这些城市居民，在难得的假日里，偶尔逃到还沒有被糟蹋的乡村的时候，他和他的孩子們又要受到一种新的侮辱，就是：使他的住处坏得不能安身的那班人的产业所有权，阻止他們进入美丽的公园，禁止他們进入广闊的森林，和警告他們不得走进深山和澤地。最后，他在图謀自卫之中，只得被迫养成一种怪癖的习慣，就是：爱上阴森的街道，黑黯的天空，和震耳欲聾的馬蹄声，他所根据的原則是：你既不能爱什么就有什么，那末，你只得有什么就爱什么。

关于精神方面的壟断

有产阶級，为自己的私利，对社会群众物质环境的壟断，还不是个人自由的不平等所体現的最坏形式。牟利的資本家，到了我們的时代，又决定着我們的精神环境。誰能估計出那些从四面八方圍住我們的、不断重复的广告，对我們思想上的影响有多大呢？再者，支配着广大人民娛乐的性质的，也是資本家。酿酒厂和蒸酒厂替我們开設了酒鋪；控制音乐厅和电影院的資本家們，也許可以

和薩尔頓的福来杰(一个苏格兰的作家——譯者注)同調地說：只要他們能够供应歌曲和影片，就不理会誰是法律的制定者。但是，資本家壟断我們思想的最惊人的也許是最毒害的例証，是現代报刊的私有制。在这方面，我們甚至有着資本家的双重控制：第一，是一系列的月刊、周刊和日报的豪富老板的专制控制；第二，是在这些报刊上登高价广告的大富戶的控制。現代报紙巨額的經营費用，加上豪富广告戶对于反对資本主义制度(即使不是反对該戶賴以发財的特种营业)的报刊拒絕支持的自然傾向，就使无产阶級的工資劳动者即使合作起来，也几乎不可能在英国或在美国刊行他們自己的、在銷路上和影响上足以与豪富老板的报紙相比拟的报刊。这样，广大人民便十分不可能保障自己不受暢銷报刊每天向他們所傾注的无数的暗示、帶有偏見的报导和腐蝕性的新聞的影响①。

最后，还有生产工具所有者和組織者，利用他們的資財，对城市政府和議会机构的工作的阴險控制。

---

① 关于記述美国和英国报紙和它們幕后的資产阶級对于人們精神环境和对于中央与地方政府所施控制的情形和程度，讀者可參閱諾曼·安吉尔："报紙和社会組織"(Norman Angell:"The Pres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1920；和瓦尔太·李普曼："自由和新聞"(Walter Lippman: "Liberty and the News"),1920，及"公共輿論"("Public Opinion"),1922；李普曼本人是紐約一家大报館的編輯；另方面，从新聞記者的切身經驗所作的比較悲慘的叙述，可參見，柏乐克："自由的报刊"(Hilaire Belloc:"The Free Press"),1918，及辛克萊："銅牌"(Upton Sinclair:"The Brass Check"),1919；关于現代报紙經营的技术方面，可參見，狄布里："报紙"(G. B. Dibblee:"The Newspaper"),倫敦,1913,和季芬："报紙的經营"(John La P.Given·"The Making of a Newspaper"),紐約,1913。

在政府方面的壟断

关于这种控制，报紙老板的直接权力——它在英国强大到可以捧出一个首相来，在美国，不只是能够捧出一个总統来，并且还可以选定他的主要部长——只是一个最显明的例子而已。近几十年来，大金融的、船舶的、工业的和商业的合并和联合起来的集团，在金錢的力量象布仁諾司(Brennus 古代欧洲北部高卢人〔Gaul〕的一个首領，于紀元前 390 年侵入意大利地区，并擄人勒贖。当秤付贖金数量时，他往往把他的劍加重天平的一边。——譯者注。)的劍那样举足輕重的条件下，对于选举和立法机构、中央和城市行政当局的影响，已經是臭名昭彰和駭人听聞的了。我們認为，工人阶級，就是由于怀疑和发現了大大小小的財产所有者和利潤牟取者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方面普遍的强制的領导，所以才突然地和很快地丧失了对这些政府机关的信任；这个原因，比任何其他原因还要重要。而且，不只是在英国如此，在欧洲大陆和北美各国普遍都是这样。不幸的是，就联合王国来說，世界大战的一个令人恐恨的特征是，这种資本主义的控制，已經在中央行政当局方面发展到前所未聞的地步。英国的工人感覚到，把各政府部門暫时移交給有关企业集团的主要代表掌握的措施，和无耻地利用这样获得的势力来促进該企业私人利潤的活动，說明了国家的地位已經降到做利潤掠夺者的女仆和帮凶的最后阶段了。

为資本家服务的脑力劳动者

在資产阶級社会里，資产阶級对物質和精神环境逐漸地和自动地形成的控制(这些控制的形成，只是追求私利附带的結果，并

不是有意識的目标，正象追求食物的羊群在牧場上的踐踏所造成的損失一样），使資产阶級无孔不入的統治的工具，特别地显露出来了。比較无知的体力劳动者对于职业的脑力劳动者的存在所抱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仇視，并不是完全由于一个小工所怀疑的一个問題发生的；这个問題是：在一間幽靜的房間里，坐在火爐旁边一把舒适的交椅上的人，是否眞在做工作——这种工作比那种做了3小时或4小时后就会感到飢餓或疲乏的工作輕松多了。很多工人已經有了足够的教育，使得他們有了更好的認識；另有一些工人所从事的职业，是与金融家或数学家一样地安坐不动，甚至还显出更不活动的样子。他們之所以带有这种偏見，可以用下述理由（假使不是辯护的理由的話）来解釋：在每一个資本主义的国家里，脑力劳动者都被吸引和被經济迫使去为資产阶級服务了。从历史方面来說，这些职业都是作为統治阶級的雇佣而随时出現的。在近代工业制度里，他們很自然地是为生产工具的所有者服务，因为只有这些人才能保証給他們的大多数以一种安定而又优裕的生活，并且給予爬到"有产阶級生活"的某些希望。于是，律师、工程师、建筑师、有理財和行政能力的人、公务員、作家和新聞記者，中等学校以上的教师、整个的經理阶級、发明家，甚至艺术家和科学家——連同长期为穷人作慈善服务的医务界和牧师，甚至专为广大群众的儿童而效劳的小学教师，也不能完全例外——都几乎无可避免地被雇用来有意識或无意識地維持和保卫現有的社会秩序，而这种社会秩序的基石，便是生产工具的私有制。因此，全世界的体力劳动者，把在資本主义制度里訓練出来、为資本主义事业服务的脑力劳动者，而不是把科学、艺术或宗教（象时常被人們无知地断言的那样），当作和"游惰的富人"一样的"人民的敌人"，又有什么奇怪

呢？但是，这还不是問題的全面。脑力劳动者本身，尤其是那些工資很低的和社交隔絕的人們，已經对豪富的人們和豪富的阶級在国家政策上和民族文化上的强迫指导，开始进行了公开的反抗。脑力劳动者，作为学校教师、市政官員、公务人員、科学工作者、新聞記者和編輯，有时甚至（特别是在美国，德意志帝国也是一样）作为大学講师和教授，他們发現到他們的思想和言論自由，已被解职的恐怖（或者，无論如何，被丧失升級机会的恐怖）所扼杀了，假使他們胆敢反对有势力的雇主的政党或金錢利益，甚至反对当时所有富人依附的社会組織原則的話。再者，在大多数国家，大多数有权力的和肥美的位置，还是經由行政的門徑或个人的势力，习以为常地保留給具有脑力劳动者的資格而同时属于靠占有或組織生产工具为生的阶級的那些人，不管他們在所分派的崗位上，技能怎样低劣，或对社会作出最高貢献的能力怎样缺乏。就在这一点上，我們发現了現在各国实际上所有脑力劳动职业界动蕩不安的基本原因，在許多情况下导引着这些职业青年走向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道路，甚至現在还导引着許多职业組織同工会、工党和社会党提出共同的主張，借以反抗資产阶級的統治。

自由主义为什么衰亡？

我們可以認为，上面的分析偶然也揭发了許多号称"自由"的政党普遍失敗的根本原因；这些政党十分典型地象征着十九世紀欧洲各国的进步思想——特别在資本主义无阻碍地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以致还想在二十世紀里保持它們对于現在已經有了政治覚悟的工人阶級的号召力。就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来說，个人自由实际上意味着資产所有者的个人权力；正象政治的进步意味

着大小資产所有者的权利，脫离了封建的、教会的和行会的束縛而根据"他的所有"——他自己所有的土地和資本，以及他自己的个性——为所欲为一样。直到今天，这种毫无悔悟的自由主义者还拒絕承認——甚至不能使他了解——一个眞理，就是：正如我們已經指明的，在現代的工业国家里，凡是脫离了生产工具的人，甚至不能过他自己的生活，更談不上根据自己的个性而为所欲为。甚至对于不是資本家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如青年律师或医师、艺术家或著作家等）来說，工人受人雇用在性质上就是"工資的奴隶"这一观念，也是难以理解的东西。相反的，他好象認为无資产的从业者之受人雇用，并"沒有称任何人为主人"，只是从一連串的顧客那里賺取費用来維持自己的生活，而沒有特别依靠任何一个顧客来謀求生存——他認为这种种的情况构成了这些光荣职业最完备的条件，就是，完美无缺的自由。这些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的自由主义者所未能了解的是，无論过去的情形可能是怎样的，工业革命已把职业生活的自由，变成为手艺人或工厂技工、工人或职員所不可能有的东西。普通体力劳动者或低級雇員，由于对他所賴以賺取生活費用的生产工具或复杂的工业或金融組織，沒有所有权，从而对它們也沒有控制权，并且由于从許多顧客那里陆續收得的酬报又不够維持他自己的生活，于是为了吃飯起見，不管愿意与否，都不得不投身于一个老板的麾下；至于这个老板对于他的責任，他可不能过問；老板的命令則他必須服从；老板的利益則他必須保护；事实上，老板占有着他，并且，在他大部分的生存时期中，用他来达到与他自己沒有关系的目的。他不能选定他将要居住的地方，也不能挑选他的孩子們行将成长的环境。他发覚，他的娛乐甚至他所能看到的書报，都只能在有利于資产阶級金錢利益的范圍內供

应。他好象感觉到，几乎每一个职业的脑力劳动者，都是被雇用来反对他本人和他的阶級的。通过这种对于他的劳动生活和他的空閑时間、他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的控制，无資产的体力劳动者或脑力劳动者——虽然知道他和他的伙伴构成了过半数的选民——发現，即使有了最普及的选举权，事实上他也不能控制他本国的政府。因此，即使他已經取得了有投票权的公民权，自由主义所給予他的自由也好象只是一种虛伪的东西。他发現，自由主义的信条，既不了解資本主义制度使絕大部分工业社会陷入其中的那种奴役性質，也不了解工业組織里应用民主主义首要原則的需要。而这种了解，正是社会主义的眞諦。社会主义者的使命，就是要摧毀資本家的独裁。并且，既然那种独裁是每个工人从出生到老死一天也不能忘記的冤苦，那末，在他开始把政治联系到他个人問題的时候，在他看出他的一票是具有政治力量的工具的时候，他就自然地会走向社会主义。

自由主义者为資本主义所作的辯护

眞誠地为資本主义辯护的人們，在实質上是承認这个批評的眞理的；但是他回答說：沒有私人利潤的潛在的刺激，工业革命也許实現不了，現代文明所依靠的商品及服务方面生产的巨大增加，也可能无法获得。問題还不只是，在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之間的时期中，甚至在最先进的国家中，沒有实际上可以代替資本家独裁制度的东西。財富和个人自由的不平等現象本身，好象还有它自己的一个經济上的优点，足以冲淡它在社会方面的缺点，并且財富和个人自由两者的远景，正是鼓励和刺激人們的因素。正如一位当代的經济学者恰当地說的，在十九世紀的过程中，“欧洲在社

会主义和經济方面的組織，已經做到可以保証資本的最大限度的积累。当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正在繼續地有所改进的时候，社会的組織已經做到使增加的收入的大部分归入到那个最少可能消費它的一个阶級的掌握中。十九世紀新兴的富人，不是在巨大开支的生活中成长的；他們喜欢从投資中得来的权力，胜过从立时花費中得到的愉快。事实上，正是財富分配上的不平等，才使固定資产的和資本增加方面的巨大积累，成为可能，而这两者又使那个时代不同于其他所有的时代。事实上，这正是拥护資本主义制度的主要理由。假使这些富人曾把新得来的財富花費在自己的享受方面，这个世界便早已成了一个不能忍受的局面了。可是，他們象蜜蜂一样，从事节約和积累，这对整个社会是有不少利益的，因为他們在自己的远景中的目标是很狹小的。

"在世界大战以前半个世紀中建立起来的、对人类有巨大福利的固定資本之龐大积累，是把財富平均分配的社会所永远不能做到的。在那个时代建設起来作未来的紀念碑的全世界鉄路，它不亚于埃及的金字塔，乃是不能将全部努力的果实自由消費于直接享受而結晶起来的劳动創作。

"就这样，这个惊人的制度，就依靠着双倍的恐吓或欺騙而成长起来。一方面劳动阶級，由于无知或无力，或者由于被习慣、成規、权力及社会上現存的秩序所强迫、說服或欺騙，而接受了一种情况：在这情况之下，他們与自然界及与資本家合作生产出来的一只餅，其中只有极微細的一小部分，可以說是他們所有的。另一方面，資产阶級可以宣称这只餅的最好部分是他們所有的，并在理論上也有消費它的自由，可是这里还隐藏着另一个无明文規定的默認条件，就是，他們在实际上只消費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节約"

的义务变成了道德的十分之九的成分，而餅的增长，便变成了眞正宗教的目标。环繞在节約餅这一点上，就产生了清教徒主义的一切本能；这些本能，在另一个时代，早已把这个世界置之度外，并且把生产和享受的艺术荒疏了。就这样，这个餅就增大起来；可是究竟为了什么目的，人們就沒有加以清澈地思索过。"①

对于这种为十九世紀的資本主义所作的坦率而又現实的辯护，我們不需要表示反对。当然，資产阶級分子不是将他們从国民收入中分配到的巨大数量的全部，或者甚至很大的一部分，年年节約下来，轉化为新的財富生产的工具；作这样用途的，只是他們收入的一小部分而已——在十九世紀的联合王国，还不到四分之一！并且，在这四分之一中，投資于助长罗斯金所謂"病害"——暴食、奢侈、浪費和腐化——的生产工具方面的，又占了多大的一部分呢？因为，在資本主义的統治下，財富是拿虛拟的貨币来計算的。但是，我們可以大胆地承認說，資本主义的独裁，尽管有它的一切缺点，仍获得了初步的成功。它提供了商品。它創造过不断增产的、有高度效能的机器。并且，它帶来的社会方面的結果，虽是那样地丑恶，我們也許可以承認說，直到某一个时期为止，总結起来，它的优点是超过它的缺点的。关于这种初步的成功，我們将在下一章加以討論。

① 凱恩斯："'和約'的經济結果"，(John M. 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 of the Peace")，1920，第16—17頁。

第 四 章

資本主义制度的初步成功

我們可以想象得到，有些讀者对于以上关于近代工业制度带来的罪恶的叙述，会感到不耐煩。資本主义商业企业的开明的支持者将控訴我們，說我們犯了煽动者的共同錯誤——只集中注意于現在秩序中的黑暗面，而不計及它的成就，也沒有顧到所有的品質和所有的成功都有其缺点或不够的地方这一事实。贊成資本主义牟利者独裁的哲学家会感覚到，我們的批評，只集中在他可以承認的两点上面，即：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和商品及服务方面消費的不科学。但是，他要反駁說，商品和服务必須首先生产出来。他可以公正地辯駁說：穷人的貧困，資本主义社会中收入和个人自由方面的不平等，資本家利用他的地位和財产来实現其在环境上的控制和在国家政策上的强制領导，就其属于罪恶的范圍来說，也只是一件更大的好事中偶然发生的事件①；它們可以在資本主义制度內，用适当的改革来挽救；从資本主义牟利者的企业为国家財富和国家力量所直接带来的巨大增加方面得到的社会利益，与这些罪恶相比起来，則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微不足道。对于这样一种人，好象最主要的是，把生产工具这样地組織起来，使之不断发揮最大的效率，达到最高限度的生产量。他們認为，商品和服务的这种不

断增加，是区别进步的文明和停滞的或退化的文明的分界綫。他

① 值得注意的是，資本主义文明最巧妙的辯护人都为工业的企业主、組織者和領导者的利益作辯护；都对所有权以征收租金和利息的方式攫取貢物这种事实，緘默不提，并对所爭論之点靜悄悄地肯定說：除了将私有財产的观念应用到生产工具上以外，沒有别的方法可以获得企业主、組織者或領导者的服务。所以替資本主义制度辯护的一位能干的美国作者說："土地、資本和劳力，只是在作为那些領导和負責进行生产的人們的工具这种意义之下，才能說是生产的因素。唯一眞正的生产因素是企业主。純粹的租金、純粹的利息和純粹的工資，是企业主为获得控制和利用这3种因素的权利起見，所必須付出的代价……把腦子里的血液注到那些只能接受相等于腦子所容納的十分之一的血液的其他部分，对人們身体是无益的，同样，任何收入平均主义，如果要使社会中效能較高的成員减少他們尽量利用他們的生产能力的刺激，或削弱他們适应于所担負的重要职責——即作为企业主、生产机会的发現者和支配者以及資金积累者的职責——的能力和阻碍他們順利完成这种职責，那末，就会产生得不償失的結果。"（豪雷："企业和生产的程序"〔Fred. B. Hawley: "Enterprise and Productive Process"〕，1907，第85，122—123頁）。

"利潤是被当作收入的一种特殊形式，与租金、工資或利息有基本的差别，并且有与后者并列为在理論上具有同等（但只是同等的）重要性的一种基本形式。在土地、劳力和資本的固定要求被滿足后，它也被当作与'产品的剩余'一样的东西。它又被当作是企业主特有的收入，而企业主就是所謂'土地、資本和劳力的調配者'，可是在他自己的能力上，却不能提供这3种东西的任何一种……經济的企业主特有的功用是，对工业的措施負責……严格地說，一个調配者不只是做計划，并且是內行地执行一个計划，这两者可以并且也时常由两种不同的人来进行。执行的人，在执行原訂計划的时候，必須安排細节，这就产生了他必須做的相当数量的詳細补充計划工作，不过他在經济的生产过程里的功用，普通都認为是一个劳动者，他所获得的收入，普通都当作是一种工資……調配人只在他对他自己所調配的工作結果或对他人所調配的工作結果負責的时候，才变为利潤的获得者……假使說，这个調配者专門为調配的結果完全負責，調配的风險由他当，調配的利益由他得，这种人就是我所謂'企业主'。"（同上書，第11—13頁）。

但是，这种說法，还漏掉了一点，沒有辯明約翰·穆勒所叙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 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865年版，第477頁）"工业生产工具所有者从产品中攫取的巨大部分"，即付給那絲毫不起作用的股东和地主的租金与利息。

們肯定，在財富的生产上，这种数量上、质量上和品种上的不断提高，只有在激发人們不断的主动性、勤勉、毅力、勇敢的冒險心和节儉的美德等条件下，才能获得成功，而人所共知的唯一的刺激就是金錢的利益；这就要使这些人获得无限制的企业自由，但有一个条件，即如果他們运用这种自由时遭到失敗，則他們就要受到个人的經济損失，因此，人所共知的唯一的巧妙办法是：生产工具私有制与它們的組織权和行政权結合起来。

問題的症結

如果我們不了解，在这个爭辯里，資本主义制度的辯护人同二十世紀工人运动及社会主义运动的交鋒，是在問題的症結上面进行的，那末，我們对于双方意見的冲突，是不会了解的，对于双方的立場，也是不会公平看待的。存在于社会民主主义新秩序的信徒与資本主义制度最开明的拥护人之間的現代爭执，事实上，是环繞着两个症結問題：牟利动机的效力和必要性，以及其缺点；将全国土地、机器、劳力及智慧的控制权交給牟利的工业家、商人或金融家这种办法对于整个社会相对的好处和害处。

牟取利潤的性質

什么是牟取利潤？牟利者的使命是什么？

根据經济学者的說法，牟取利潤是使“人类天性的某种傾向得到滿足，即拿一种东西換取另一种东西的做交易的傾向。”它是古代市集中各种商品或服务的个体生产者間盛行的計較錙銖习慣的自然发展。这就是，一种商品的生产者，运用討价还价的艺术，不只是将他所生产的剩余物品換取他所想要而又自己不生产的物

品，并且将这个交易做得使他自己占到最大的便宜，因而可以拿出較少劳力制成的产品換回較多劳力生产的貨物①。正如亚当·斯密所正确地观察到的，討价还价的方法是兽类的一种取而不舍的方法的显明进展。他写道："沒有任何人曾經看見过一只野兽，用它的姿势和天然的吗声向别一只野兽表示說，'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情愿拿这个来換取那个'。"一只狗夺去了别一只狗的骨头以后，是会立即带着骨头逃开的。西方的旅行者，看到了东方市場里的討价还价情形，就不免感到这种方法与騙术，实在难以分辨，所謂騙术，就是用欺詐而不是用武力来取得某种东西的艺术。这种分别，好象是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性質上的各异。我們現代的著名印度詩人和哲学家，看到西方文明里金錢、股票、商品及劳力市場中資本主义牟利者的大規模交易，发現他也有同样的"思想上的搞不通"②。

---

① 泰戈尔爵士在向日本学生的一次講演里，曾将一位东方哲学家对于西方商业精神的批評告訴我們。"你們在日本已有你們自己的工业；它是怎样地篤实透頂，你們可以从它的产品看得出来——从产品的秀丽和牢固，以及那种难以覺察的細致中可以看出来。可是，虛伪的潮流，已經从世界的另一角落橫扫你們的国土了；在那部分的世界里，生意就是生意，而誠实只不过当作一种聪明的手段来奉行。当你們看到这种商业广告时，看到它們不只是用謊言和夸張之詞涂污了整个城市，并且侵入了农民誠实劳动的綠野和迎接那純洁晨曦的山顏时，你們曾否感到羞耻？……商业精神及其丑恶装璜的野蛮面目，是对整个人类的威胁，因为它正在用权力的理想来代替完美的理想。它使自私自利的邪教厚顏无耻地在那里狂欢…… 它的行为是粗暴的，它的声音是不和諧的喧嘩。它正在进行着它自己的該詛咒的毀灭，因为它正在把它所立脚的人类蹂躪得畸形怪状。它正在牺牲幸福来拼命賺錢…… 当前欧洲文明的致命野心，就是要独占这个妖魔"（"民族主义"〔Nationalism〕，第85—86，129，128，82頁）。

② 納沙·西尼尔認为："政治經济学的首要眞理"是"每一个人都想以尽可能少的牺牲，換取个人的財富。"

資本主义牟利者的交易，与个别生产者以貨易貨的交易不同的地方，就在于牟利者不是只用或主要用自己的劳动成果来交換，而是用无数其他人們的劳动成果来交換。因此，他的交易是双重的交易：他首先以最賤的价格購买到别人的劳力或劳动成果，然后以最高的价格出卖他收購的商品或服务。正是資本主义企业里的这种因素，被人称为"对劳动力的剝削"，或者更新近一点的称呼，"投机活动"。資本家主要是在他購买别人的劳动所付的代价同他在世界各市場里出卖别人劳动成果所得的代价的差額上，来获取利潤的。資本主义牟利者，除了牟利的功用外，还可以加上(往往也加上)其他的功用，如組織(并且有时也指导)农业的、采矿的、制造的、运輸的、銀行的、堆栈的或銷售的技术过程。但是，这一切工作，尤其是在充分发展的資本主义制度下，都可以并且越来越多地由支薪給的从业人員来担任，这些人本身并不是牟利者，只是一种高級的工資劳动者，在买卖两种行为的差額中，并沒有个人的利益。

牟利的活动是怎样发生的

我們必須一直記着，牟利的活动，作为对工商业領导人給予酬报的一种方法来說，并不是出于恶意的。它的本意并不是要产生穷苦的群众。它的主旨并不是要削减个人的自由及导向阶級的压迫的。它甚至不是計划建立一个凭所有权过活的世襲阶級的。牟利活动所必需的經济制度——生产工具方面的私有財产制和这种工具使用方面的自由經营制度——是由十八世紀与十九世紀期間的英美政治家和立法者在获得經济学家的贊同后維持和加以发展的，因为这些人們誠心相信，工业家、商人和金融家的无限制的牟

利，是增加国家财富的最有效的方法①。在英国历史的任何时期中，統治阶級最有識見最有公益心的領袖們和顧問們的判断，从来沒有象他們对于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工业革命的喝彩，表現得那样一致。最有学問的哲学家，最进步的政客，最开明的作家，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重复以下一系列的武断的命題。这些命題，在他們心目中，构成了一連串的推論，而在美国，則已变成这样不辯自明的定理，以致大家习以为常地奉为金科玉律了。社会的幸福，有賴于它的財富；国家的財富，有賴于它每年产品的維持和增加；这种維持和增加的最好方式是，讓每个人用他自己的方式尽可能使自己致富；个人致富的最快的途徑是在自由市場里的牟利活动；所以，个别資本家无約束的牟利活动，是获得国家福利和快乐的最好方式②。

資本家的这种辯解，在提出的当时，是有其充足的理由的。甚

---

① "財产私有和个人竞爭的制度，不是建筑在盲目的傳統主义或阶級压迫上，而是建筑在所有进步人类获取他們社会实利的和机动地适应千变万化的社会需要的經驗上面的"（史克尔頓："社会主义：批判的分析"〔Skelton: "Socialism: A Critical Analysis"〕，1911，第45頁）。注意这里面不能和不愿区别"財产私有"和"生产工具的財产私有"的地方。看来好象是一种似是而非之談，社会主义者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大大地增加"私有財产"的数量，不过是把它集中在与制度相适应的某些財产形式中而已。（見韦伯夫妇著："大不列顛社会主义共和国宪章"〔S. and B. Webb: A Constitution for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Great Britain〕，1920，第340—347頁）。

② "問題还是一样的，'怎样使一个国家"尽可能"地富起来'，但是，既然現在的答复是'使它每个成員，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尽可能致富'，則政治經济学的旧方法中教导政治家們怎样去'为人民提供富裕的收入和生活資料'的那个部分，便差不多化为烏有了"（薛特維克："政治經济学原理"〔Sidgwick: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883，第18頁）。

至現在的社会主义者，还很容易忽略牟利者是生产財富的一个因素这一有力的論据，而集中攻击关于国家的福利和幸福要依靠全国生产的实际增加这一假定。社会主义者，面对着資本主义的工业組織在世界各地各种情况下所产生的实际后果——劳人的貧困及其在"生命、自由和幸福的追求"方面极大的不平等——发現一个最便利的論据是：社会的福利，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依賴于每年产品的数量，而在絕大的程度上是依賴于这样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的有效分配和有效消費。的确，有些社会主义者甚至走向极端地否認生产力的增加是人类幸福增加的必要条件。他們認为：英国或法国、澳大利亚或美国目前的全国产品，假使平均地分配和有效地消費起来，是足够保障这些国家的人民正当消費之用的。这却不是我們对这种情况的看法。

牟利动机的效力

我們認为，現在商品和服务的产量，与参加生产的人們所作的努力和牺牲比較起来，是小到了悲慘的程度；并且認为，假定沒有过度的劳动，又有足够的空閑来发展公民生活的話，則商品和服务的每一次增加，如果分配平均和消費合理，也許还意味着每个公民得到更多的个人自由和人类的进步的发展。但是，社会主义者，在断言增加的生产力是不必要的或不应有的时候，他是沒有針对反对他的論点的。資本家反駁說：除非工业的組織者可以通过牟取利潤的过程来取得报酬，并且允許他享受这样得来的一切利益，那末国家現有的財富甚至也不能保持；并且，这种財富将会削减得如此的容易和如此的迅速，以致整个社会将很快地临到餓死的边緣。"財富的不平等"，美国一个批判社会主义的人总結說，"等于在企

业上、在工业上和在节約上的差别；若要把它拉平，就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就是使生产瘫痪，使整个社会陷到一种平等的悲惨境况中①。”“利潤的牟取”，一位英国大資本家告訴我們說，“决定着劳力是否用得适当，或材料是否用得正确。人們对他們所不需要的东西，是不会付出代价的，另一方面，对他們不能賺錢的东西，也不会繼續供应的。这样，我們就在利潤方面找到了商业开支在經济上是否正当的最后理由。每一种交易，都要在賺錢或蝕本的法庭上加以权衡，并且，除了試驗性的、教育性的或慈善性的事业以外，沒有任何一种商业企业能够違反这个指导原則而能永久地成功或有用②”。

有資格的商业观察者，沒有任何人否認牟取利潤的活动在激发和誘导牟利者的努力方面是具有效力的。对于所追求的目标的摇摆不定，也許是意志瘫痪的最普通的原因；它会使得人們在事业的执行上緩慢前进，并对事业的方向犹豫不决。我們可以承認，金錢的利益——在交易結束时比在交易开始时你口袋裝有更多的錢这一事实——是实际上尽人皆知的目标③。金錢利益的动机，是

① 史克尔頓：“社会主义：批判的分析”，第58頁。

② 布思：“倫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Charles Booth: “Life and Labor of the People of London”)第2輯，“工业”，第5卷，1903，第77頁。

③ “資本主义的經济活动，从头到尾，就是一笔金錢。結果，計算就成了資本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是資本主义历史早經承認的。所謂計算，我的意思是指通过数字来思考宇宙間的一切，并把这些数字轉移到一种严密的收支制度中去的趋向、习慣，也許还可以說是一种能力。不用說，这种数字一直是表示一种价值的；而整个制度的作用，則是表明这些数字的結果究竟是正的或是負的，因而指明这种事业会带来利潤，或者会带来損失。”(桑巴特：“資本主义的本質”〔Werner Sombart: “The Quintessence of Capitalism”〕，1915，第125頁)。

普通人都能活生生地感覚到的；它也常在智力欠缺的或衰退的人們中出現，有时是变态地出現；它甚至可以在許多有声誉的艺术家和有些科学家身上发現。再者，在牟取利潤这种职业里，成功的試金石就是所追求的目标是否已經达到。做了百万富翁的成功的牟利者，每次在滿足了他的欲望、增加了他的利益的时候，都提高了他所享有的声誉，即他在商业同行中由于財富而得来的声誉。"好"的生意，意味着大的利潤；"坏"的生意，意味着小的利潤；至于破产，則不論是怎样无辜地遭到，都是耻辱的表示①。当我們把商业界与自由职业作比較时，我們便認識到这种分析的眞理。一个大律师、大外科或内科医师或大土木工程师，从他收入的巨大数量和財产的迅速增加上，也許可以感到内心的十分滿足。但是在他同行的心目中，他的声誉不是靠着他銀行存款的多少，而是靠他工作的质量来决定的，无論是他作为顧問或是作为法官；无論是在診断方面或是在治疗方面；无論是在他所承办的工程的复杂性上或重要性上。正是追求的目标的这种单純性和一致性，以及其被公認为是成功的試金石这一事实，才把利潤牟取者，从一个乱抓新目标的昏头昏脑的人，变为一个运行无阻的老是重复一套工作的自动机器。但这还不是問題的全面。牟利的方式还要求着人类一切較原始的和較庸俗的情欲来帮忙：获取財物的本能，斗爭或支配别人的本

① "什么时候我們說是完成了一件成功的生意？这当然是在生意合同很好地結束的时候。但是，准确地說，什么意味着'很好'？它当然不是指着授受的商品或服务的質量或数量；它所指的，只是并且完全是花去的本錢的收回以及超过这本錢的剩余数目(利潤)。企业家的目的，就是操縱他所控制的各种因素，借以带来这种剩余。"(桑巴特："犹太人和近代的資本主义"〔Sombart: The Jews and Modern Capitalism〕，1913，第161頁)。

能，为妻子和儿女謀取安全或有特权的位置的本能。再者，牟利方式与遺产法律的結合，又带来了所有文明的本能中最坚强的一种本能："成家立业"的欲望，就是：保障子孙后代永远靠所有权生活的权利，因而使他們摆脫依靠能力或勤劳的需要。所以，資本主义制度的贊成者有理由断言：牟利的方式就是一种点石成金的仙术，可以用不断的和集中的努力，从抛入冶炼爐里的智力最愚鈍的、品德最卑鄙的原材料中，获得最大的产量。从来沒有一种职业，能够象这样吸收和轉变它的从业人員。用一句美国人的話来說，所有一切"普通俗人"的凡庸的本能、冲动和才能，都被用来"分路并进"，指向一个既定的目标。由于聚精会神在这一个窄狹的問題上，那些非如此便不会显赫的人們，就变成了先知先覚和預言家，养成了一种近乎兽性的"市場嗅覚"，能够以惊人的正确，預言遍及各大洲的、各民族的、各色各样的企业，那些交易将是——如他們所說——"合算"的。再也沒有那一种效率比成功的牟利者的效率还要更大。在所有的专家之中，他是最十全十美的人物。

为对亚当·斯密和他的直接追随者公道起見，值得我們記住的是，牟利方式的效力，在資本主义制度的初期，比在今日大得多。这是有一种很好的理由的。在大規模的股份企业兴起以前，尤其是在現代的合并和托拉斯制度兴起以前，利潤的牟取者还是一个自由行动的人，他不称呼任何人为主人。他不等待任何其他的人作出决定，就能采取迅速的行动。假使他因智力上或品德上的缺陷，而遭到了失敗，他只有責备他自己，并且他也懂得这一点。假使他获得了成功，則所有的利潤和所有的声誉，都是属于他的。他整天整天地在这种一方面是赤貧的地獄另一方面是巨富的天堂的

意識中工作。假使我們来想一想現代股份銀行或鉄路公司的經理，或者典型的世界性托拉斯有薪給的代理人的生活，他們一方面是服从董事会，及按照公司法的規定、稽核員的要求和全体专家們的技术需要，以及与各联盟或联合公司所訂立的合約，負責执行并完成他的一切确定的职責；另一方面是薪金的保障，不負一切損失的責任，和一直享有的离开这个公司轉到另一个公司的权利，我們便可以認識到工业革命时期脑力劳动者的动机和企业主的自由，是比資本主义建立并发展以后的时期，优越得多了。

"致富的捷徑"

这样，我們就必須承認資本家所提出的一系列辯解中的一点，是正确的，这就是，"个人致富的最快捷徑是牟取利潤"。我們还可以补充說，这一条捷徑是对大家公开的，不管他們是福特或是福萊奇毕斯，只要能够专心一致地去追求它，而不是十分"不認眞"，以致自己的心力被非自私的利益所分心。并且，牟利的效率，作为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来說——这是社会主义者所面对的一个鉄的事实——不只是可以从观察牟利者的特征方面，并且可以从牟利活动的統計結果，得到証明。在工业方面采取了最完备的資本主义組織的国家，都有着最富有的大富翁和最大的靠所有权生活而不是靠劳动生活的富人阶級。假使私人的財富是国家財富的試金石，那末，我們在接受資本家的辯解方面，已經前进了很大的一步了。

但是，牟取利潤者并不是在眞空中工作的。他是由他在其中活动的政治、社会和經济环境所造成的，并且又反过来造成这些环境。我們現在必須移轉我們的注意力，来考察一下这些环境的性質。

資本主义的环境

在历史研究中最令人感到兴趣的是，追溯人类由于适应新的环境而出现一个新的类型的过程；观察这种原始亚种的个人为了反抗敌对的保守力量，进行共同自卫，而結为一个集体的情形。假使这个集体，在它的防御方面已經获得了成功，那末，它就立即轉入公开的攻势。它在被人們承認为值得尊敬的职业之后，便企图改变社会的和政治的制度，以便为这种新职业的推行获取新的园地。例如，我們看到大不列顛現在的医务业，是起源于中世紀被人看不起的葯鋪和理发外科医师店(barber-surgeons'shop)的；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通过特許的学会和公司走向組合的影响，就形成为一种自治的职业；然后，逐漸侵入到十八世紀末期的医院体系；最后，通过1858年的"医务法"和"全国医学会"而取得現在的地位；并且由于公共卫生和体育以及医葯登記和国民保險等的不断扩大和发展，这种地位巩固起来了。今天可以說一句不算过份的話，人数相当少的大不列顛医务业，在行政机构和立法諮詢方面所运用的权力，甚至比正式定为国教的安立甘教会所运用的权力还要大些；在指导社会和种族的命运上，它的暗藏的权力，可以和具有同样势力的法学界媲美。

資本家的出現

但是，医务业的得势——就整个医务界来說，也許由于沒有个人財富的巧取豪夺伴随着它的緣故——同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时期現代工业国家里資本主义企业家兴起而占据支配地位的那种情况比較起来，并沒有那样的革命理想和政治光芒、浩大的气派和动

力。沒有被社会所承認的牟利者，或"新兴的資本家"，最初是以他的时代的反叛者出現的；他們高举起个人自由的旗帜，打倒現存的慣例、制度和教条。他們的革命热情产生的原因，至为明显。正如我們已經叙述过的，牟利者的职責，一直是以最低的市場价格买进，以最高的市場价格卖出。很明显，他的第一个要求是通向国内外市場的自由，不論为購买原料也好，雇用劳动力也好，或者出卖成品也好。在十八世紀初期的英国，这种企业的自由，是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障碍和阻塞的。因此，原始的資本主义牟利者阶級，便在議会里、大学講坛上、报紙上的盟友們帮忙下，无情地粉碎了阻碍他們前程的当时的社会制度。我們看到他們粉碎都鐸和斯图亚特王朝的工資和物价条例；粉碎貴族的領地及其庭院和公用地；粉碎特許的国家公司及其享有的开矿和制造、对外貿易和海外管轄权的独占权利；粉碎城市自治团体及其行会、学徒制度和禁止外人（这不过只是由邻近的市邑或附近的乡区来的人）經商的成規；粉碎旧的"貧穷救济法"及其廢弛的收容所，和工作不足的并由税款补助的工人的麕集現象；粉碎家宅和家庭及其古代遺傳下来的家庭工业，以便将它的成員，男的女的，大的小的，分散到辽远郡区新設立的工厂里去。在1832年，他們甚至还粉碎了根据国王的和封建貴族的"口袋里的城市选区"（"口袋里的城市选区"〔Pocket borough〕，即議員选举权为一人或一家所操縱的城市选举区。——譯者注），及古代市区陈旧的职业选举权选举出来的英国議会。事实上，資本主义企业家，在两个世紀的很大部分时期内，是当时的布尔什維克党人，相信着——用1834年利物浦商人請愿書上的一句名言来說——"崗位同等的人应当享受同等的权利②"，并且严格地排斥着不得已被他們雇用的无資产的工資劳动者参加本国政

府。的确，可以不算过分地說，1799 年到 1832 年的英国政府，陶醉于新資本主义增加了国家財富这一情况，对于体力劳动的工人們建立了一种恐怖的統治。引用一位对当时工人阶級情况有研究的历史家的話来說："雇主的法律，就是国家的法律。工人必須服从他們的主人，好象他們必須服从国家一样，而国家又必須执行这主人的命令，好象执行它自己的命令一样。这就是 1799 年和1800 年工人結社法幕后的新政策。这两个法律，第二个是修正第一个的，它禁止工人們为維护共同利益所采取的一切共同行动；它們乃是英国历史上国家向一个阶級的独裁所作的一次最无条件的投降②。"資本主义的寡头政治抓住不放，并加以发展的国内的古老制度，只有一种：关于私有財产的法律，和它的附属品，即由死人傳給活人的、有法律保障的財产繼承权。

資本主义破坏的残酷

値得注意的是，反叛的資本主义企业家，在他們昌盛的一个世紀中，在另一个方面，是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巴枯宁和共产主义者的列宁相似的；后者在 1918 年到 1919 年的俄国，是有机会把巴枯宁学說的很多精神付諸实施的。資本主义企业家在清除阻碍他們实行社会改造理想的障碍方面，是絕对无情的——既不衡量他們認为过时的制度的偶然优点，也不关心他們的革命所帶給无数个人的苦难——并且永远不应当忘記的是，他們对于收入被他們的革

③ 韦伯夫妇："領地和城市"（S. and B. Webb: "The Manor and the Borough"），1908，第 701 頁。

② 汉孟德夫妇："城鎮的工人，1760—1832"（J. L. and Barbara Harmmond: "The Town Laborer"），1917，第 113 頁。

命所消灭的、生活被他們的革命所摧毀的难以計数的无辜群众，并沒有对侵犯法律上"所認可的愿望"的行为，作出任何补偿。学徒出身的小手工业者；在有合法居住权的教区内，享有由貧穷救济委員安排工作的合法权利的工人；享有依靠古代傳下来的使用公共牧場权利的公簿持有农；享有排斥"外人"的权利的古代城市团体的"自由人"；享有本行业集体专利权的手工业行会成員——这些人們都享有为法律所承認的既得利益，而这种利益构成了他們个人产业的一个合法部分，正象俄国貴族所有的森林和草原、俄国"資产阶級"所有的工厂和商店一样①。1750年到1850年的英国資本主义企业家，也好象1918年到1919年的俄国布尔什維克党一样，把所有这些"法律主义"都看作似乎是阻碍着一种更有益处的（或者，正如他們所选擇的說法，一种更公平的）社会秩序形成的障碍物。

資本家的成就

对于一个已获成功的革命，或者，从新兴一代的积极分子看起来，好象已滿足国家需要的措施，有很多事情在事后是得到寬宥的。所以，十九世紀中叶在英国发展到最高峰的資本家独裁，除了使資产阶級发財的直接目标以外，是否还达到了更广大的目的这一問題，实在是值得探討的。我們馬上可以說，在我們看来，資本家的独裁，把它清算一下，虽有种种殘酷的孽債——罗斯金特地为

① 对于自耕农和自己当家作主的手工业師傅，"財产的原始意义、本質和目标"——引一位美国作家的話来說——"是保証一个人或一群人获得为其生活或福利所必需的东西的使用和控制权"（麥凱伊："美国社会主义"〔James Mackeye: "American Socialism"〕，第34—35頁）。对于資本主义以前的个体生产者，即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和从事自己的职业的人来說，工业革命好象是与他所了解的以及自古以来的习慣法和地方习俗所闡明的那些財产权，完全抵触。

它造出一个新詞叫做"病害"("illth")——仍是好处多于害处的；无論如何，从十八世紀的后期到十九世紀的中叶，确是如此。在十九世紀的后期，总的来說，它的成就是有疑問的；而在二十世紀，則甚至在国民收入数字的增加上（我們也象罗斯金一样，避免使用"財富"这个詞），它的缺点是超过它的优点的。

毫无疑問，在十八世紀后期和十九世紀初期的英国，在生产和生产力方面，无論是从所消費的一般用品的数量及品种来衡量，或是从生产它們的工厂的数量来衡量，确有一种急速的、巨大的和不断的增长。人口的增加本身——这是区分本时期和以前任何时代不同之点的显著特征，也是个体农业和家庭工业分离的一种直接結果——就代表了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原料进口和制成品出口的不断扩張，意味着构成国民收入的消費品数量上的增加和品种上的扩大。

生产的增加

在英国資本家处于独霸地位而很少有其他国家的竞爭的世界里，英国对一切国家的貿易的扩張，英国航海业的增长，英国銀行业和保險业的兴起，都汇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几乎具有无限利潤的黃金的巨流；这个黃金巨流所采取的形式是：資产阶級不断增加的收入，伴随着奢靡生活而来的一切物品的急遽增加，和利用剩余收入来增加生产工具的源源不絕的投資——从开采更多的矿山和建立新的工厂到輪船的增加，鉄路的添筑，机器的增加和市場的不断开辟。生产方面这种史无前例的增加，并不只是靠統計数字来証明的。我們能够追索到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家庭工业和个体农业的消逝，以及农业劳动者"居家过日"的习慣的无形放弃，和

麕集在城市貧民窟里的工厂的个别技工，造成了漫无限制的生育現象，从而产生了一支迅速增长的和在經济上无自卫能力的劳动大軍，听候着資本家的摆布。在这种情况下，能以工資的方式給他們一条生路的人們的专制权力，便差不多可以运用自如地給每个男人、女人和儿童安排他們最适合的、工时尽可能长而工資尽可能少的工作。片刻之間，就有了这种殘酷的、令人却步的工厂制度，来代替旧的貧穷救济法的廢弛現象，它带来了实实在在的飢餓，借以保护雇主的权力，并使人們的投身他的事业，好象工业的直接强迫征募一样，变为强制的义务。假使我們把人設想为只是一种生产工具，那末，我們可以毫无犹豫地承認，英国資本主义的組織，在它最光輝的时期，确实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就是說，它曾以最低的維持費的代价，驅使了最大数量的劳动力到生产上去；可以証明，这种成功，比起人們知道的任何奴隶財产和奴隶买卖的最有效率的制度，还优越得多。再者，資本主义制度还激发了和利用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劳动生产率大大增长的事实。旧秩序的瓦解，还为各級貪得无壓的創造天才开了一个終身事业的門路，并且征召他們到新的工业組織里面来。无穷无尽的机会在等待着有才能的和有冒險精神的人們。很大数量的手工业者和农民，都从工作不足和收入減少的共同命运里逃了出来，以便充当工头和經理，并且，最后，充当独立的資本主义企业主。我們很可以說，从較低的阶层升到統治阶級的人，数量最多、比率最高的，要算在这个时期，刺激也不亚于机会之多；并且，假使說才能的选擇性，在某些方面，会使人种退化，那末，也可以說，这种选擇是集中在一种才能方面，即，增加生产和減低成本的才能方面。首先，这个时候是一个机械发明的时代，空前数量的智力都用在改善工业技术过程上。而且，

商品的需求又是广闊无边的。全世界都迫切需求用工业新方法和日益低廉的成本所生产的紡織品、金属器具、磁器、武器、軍火、服装和皮革制品。同时，英国的制造商本身也貪得无餍地向地球的各个角落里，搜寻数量有加无已的原料，来制造其他国家好象永远买不够的商品。英国的牟利者每天的时間，不是用来計划彼此間的或对外国人的竞爭致胜的方法，而是用来对付新的需求；寻覓新的原料；創造新的产品；冒險地开辟新的市場；在商业的冒險上，从中国到秘魯，从北美洲西部的荒原到地球上相反一面原始的未开化地区，傾下賭注，有时甚至傾賭生命。意外的横財，当然是巨大无比的。有人說过，英国在这个光輝时期所得的利潤，"不是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而是百分之几千。"

讓我們重复一遍說，我們必須承認，成功的牟利事业这样巨大的发展，尽管有它一切的缺点，确实意味着国家收入中可以称为財富的那个部分的（至少暫时的）巨大增加。假使說那时的工資是低的，并且工人的状况是坏到足以損害人民的話，那末，也可以說，降低生产成本的不断压力——尤其是在普遍取消了日用品的稅收之后——却大大地有利于消費的人們。牟利者自己也发現了，他們的最大利益，是在不断減低每个人消費的商品的价格，和每个人使用的服务事业的价格，借以增加产量和消費量。資本家間联合起来以便永久保持超过成本的价格的办法，当时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通过物价的下降、币制的合理的稳定以及工資大致上的稳定甚至稍微提高，整个国家也在商品的不断增加、消費范圍的稳步扩大及消費的数量增加方面，得到利益。

对于那些以为国家收入的立即增加，是社会进步和社会福利的主要条件（即使不是唯一的条件）的人們，英国資本主义之暫时能

够达到它的目的，好象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在工业革命的世紀里，沒有可以走的第二条路。正如桑巴特所說："資本主义以前时期的經济活动，是完全依照滿足生存条件的原則来調节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都依靠他們的經济活动来維持生活，除此之外，别无其他①"。这些独立生产者的大多数都沒有聚积財富的野心。他們收获的农产品和制造的物品，大多是为自己用的；他們最强烈的冲动是用自己的方式过自己的生活，什么时候高兴工作就工作，什么时候高兴睡覚就睡覚，什么时候高兴吃就吃，和什么时候高兴玩就玩。他們中間最优秀的劳动者的劳动，不是由于謀利愿望的鼓舞，而是出于制作手艺的本能的驅策。可是，我們必須永远記着，自耕农和自己当家作主的手工业师傅，对于他們的剩余产品来說，也是道地的"牟利者"，和資本主义企业家同样地有着牟利者的短处和坏处。在許多事件上，他們自己也是剝削别人劳动力——学徒、学徒期滿的职工以及他們自己家属的劳动力——的"剝削者"。这种社会秩序，不管它的优点是什么，事实上是不能发展那种掌握大規模企业所必需的远大眼光或自制能力的。它也不能产生作为現代政治民主主义和工业民主主义的基础的集体精神或代議制度的能力②。

沒有第二条路可走

因此，在十八世紀，甚至十九世紀的初期，在英国实际上不曾

① 桑巴特："資本主义的本質"，1915，第172頁。

② 关于缺乏民主制度——工会的、职业团体的或政治的民主制度——的能力的情形，可以从象日本、俄国和甚至現代法国容易感染官僚主义弊病的現象看出来——我們認为这种現象的解釋是：一个个体生产者的社会，由于缺乏远大的眼光和联合起来的能力，不得不把現今世界上所要求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政府讓給一群官僚来統治，而对于这批官僚，他們既不能又不愿有效地加以批評和監督。

有过一种群众的或集体主义的組織。甚至相当誠实的官員，也沒有供应的来源。中央各部門的和当时英国地方政府的記录表明，要找到一批不直接或間接收受賄賂，或者可以賴以办一天公务的文官，是不可能的事；同时，大多数的低級官員，則嗜酒成癖，并且毫不迟疑地盜窃小額款項。公务职位被当作領干薪的差缺来看待和鉆营。沒有人懂得大規模行政程序或行政方法的知識，沒有考核候用人員才能的方法，沒有专业訓練的系統，因此，每个公务职位，或者成了世襲的职位，或者成了一些人包办的飯碗，从而时常落到統治阶級里最不称职的人們手中。所有矿务的、土木工程和机械工程的、工业化学的、建筑及营造的以及行政本身的专业，在萌芽的时期，只都是靠"凭經驗"和"尝試不成再尝試"的方法来进行的。沒有精确的簿記；也沒有稽核的制度，甚至稽核現金賬目的初步形式，也不曾有过；至于成本会計的观念本身，則更梦想不到。提供唯一的刺激和唯一的标准的是，牟利的强烈动机；它是謀取私人利益的手段，凭着它，就可以挑选所需用的人員，发明生产的方法，进行业务的管理，减低生产的費用，和发現銷售的市場。并且，資本主义制度，在工业、运輸、商业和金融等方面合作的科学和技术方面，还有教育全国的优越性。甚至它的压迫和欺詐，也有它們的用处，因为它們把資本主义所产生的从事体力劳动的工資劳动者的无产阶級，驅使到工会里和合作社里联合起来，并且启发了他們自己关于自由联合和工业代表制度的能力。事实上，在十九世紀的初期，利潤的牟取，是这个世界的一种代替品，用以代替当时还不曾有的品质，即：律己的能力，专业的技术，科学的知識，公共的服务，自由联合的精神和一般篤实的风气本身。

第 五 章

資本主义制度的最后失敗

資本主义制度統治的这种初步成功，究竟能够維持多久呢？

要指定任何一个年份，标志着資本主义在某一个特定的国家里，在农业、矿业、工业、金融、运輸和国内外貿易等多方面的发展情形，由对国家有利的制度变为对国家有害的制度的轉折点，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况且，另外还有相对的效率和絕对的效率問題；利潤的牟取，作为工业的刺激和报酬的一种方法来說，在未找到第二种适当的方法以前，要估計它的絕对功效，是徒劳无益的。大概說来，只是到了十九世紀的中期，比較深刻的观察家才开始坚持地說，資本家的独裁，不只是有了財富生产上許多絕望的局限性，并且还确实产生了許許多多与財富恰恰相反的东西。从那时以后，正象現在已經很明显的情形一样，利潤的牟取有了日益增加的恶性发展和邪恶的新陈代謝，因而产生了它們本身的毒素，并减少了这个制度本身的优点。只是在过去半世紀时期中，代替原来工业組織的新方法才被发現并实施起来；而这些新方法，在財富的公平分配和有效消費方面，比原来的要优越得多，并且在財富的生产上，从所有各方面通盘考虑，也和原来的相等，假使不比它更加优越的話。

資本主义开倒車的发展

近代商业企业这种失敗的原因，可以追溯到牟利动机的某些内在的缺点和牟利者的职业中某些无可避免的发展。資本主义对于因天灾、人禍和一切商品的加速損耗而发生的破坏，往往有濃厚的兴趣，关于这类显明例外的情形，我們不必去加以考虑。从修配玻璃者对于下冰雹的兴趣，到路旁汽車修理所对于汽車事故的兴趣，和龐大鉄路車輛修理工厂对于破坏最重的及損耗最大的运輸方法的兴趣里，我們已經有叙不完的甚至数不尽的事例說明：在資本主义之下，不可能产生一种对生产的兴趣，它同时不包含着对腐朽和破坏的兴趣。因此，我們建議只在下列的标題下叙述这种失敗的情形。利潤的牟取者是本性使然地要导向破坏和导向毀灭的，不只是对于最有价值的生产工具如此，并且对于无法补償的生产工具也是一样；他对于必需的商品，有一种以假冒眞的（或者以劣品来代替的）趋向；他时常使用他自己的和别人的劳力来生产对社会毫无价值的商品和服务——的确，有时还具有毀灭性的毒害；并且他还渴望以只为自己产生利潤打算而不計及其他后果的方式来运用他自己的和别人的資本与信用。甚至在資本主义最初的竞爭阶段，当社会需求一双新皮靴时，就有 100 个皮靴制造者各制一双来向这一个顧客搶售；象这样一种簡单的事实，就曾使工业方面遭受过一系列的供应过剩和商业衰退的現象，因而招致了个人堕落和經济損失的恶果。于是，經济危机便和傳染性的霍乱一样，变成了当然的事情。現在，我們已經渡过了这种状态了，可是增加产量和扩大营业的不断压力，还是导向着全世界各市場周期性的衰退，甚至可能变成长期性的蕭条，以致造成了銷售組織比生产組織更

加龐大的結果，因此，正如一句流行的話所說的，"銷售的費用比生产的成本大得多。"虽然在每一个国家內，資本主义牟利者間自由竞爭的原則（曾被認为是能够为消費者保障价廉物美的利益的），为了保障壟断的价格及强迫消費者接受对牟利者有利的标准化的物品起見，在一个接着一个的工业部門中，資本家相互之間的联合組織已代替了自由竞爭，可是，个别的工业間和个别的工业联合組織之間，內部的竞爭既已避免，仍然为了永远不停地积累新的資本而不得不进行死命的相互竞爭，并且，当获得这种新資本时，就运用它来再增加生产，賺取股息，不管它的产品有沒有人需求；于是，为激发这种需求起見，便施展一切广告招徠及旅行兜售的伎俩，和猎取国外市場——有时带着詩意地称之为"在太阳下面的空間"——的一切政治陰謀。就这样，每个欧洲大国的資本主义工业家、商人和金融家所抱的保持旧市場的愿望和获取新市場的貪心，便作为1914—1918年世界大战浩劫的基本原因而暴露出来，造成2千万人慘遭死亡和广大地区受到空前蹂躪及无数財富淪于毀灭的結果。最后，人們对于資本家独裁的仇恨，和无产阶級由于資本主义制度遺傳下来的收入上和个人自由上的永远不平等所引起的忿怒，便在每一个大工业国內自发性的阶級斗爭里，达到了高峰。

資本主义牟利者造成的生产工具的破坏和毀灭

这个罪恶的第一个发現者，是英国社会主义的創始人（罗柏特·欧文）；他在十九世紀的初期，就坚决認为：資本主义制度，在它的效果方面，对于它所用来生产財富的工具，是具有毀灭性的。欧文自己是一个資本家，并且是他那个阶級里第一个了解他的生产工具的性质的人，他認为他的生产工具，正和傅士麦說到外交工

具一样 是血和鉄，并且，又和另一个德国名人所指出的一样，認为"血是一种十分特别的液汁"。現在讓我們来闡明他的这个論点。

所有的生产工具，除了有生命的以外，都会由于使用而損耗的；它們生产得越快，損耗就越快。所以，資本主义的雇主，对于他的工具和机器，就得解决两个問題。第一，在他每年結算的总賬上，他可以准許划出多少錢来作为它們損耗的折旧？第二，由于一部机器的損耗可以在"使它工作到死"的意义上来加以考虑，并且由于生产过程占用的时間是靠这机器运行的速度为轉移的，他究竟給予它多少长的寿命才算最为有利？第一个因素是这部机器的成本。一个野人的錘子，只是一块石头；他的杠杆，只是一根木棍；他为这些工具所付的代价只是俯拾之劳，因此，他毋須考虑究竟这些工具能用到10分鐘或10年这一問題；因为在原来的地方还有很多这样的工具；所以，他对待这些东西，可以随意地不加照顧和給以破坏。但是，假使他所用的工具需要他一天的工作才能做成，而他却在半天之内将它消耗或破坏掉了，那末，在这个周末之前，他便要破产和穷困了。同一样的道理，假使一个雇主付出5千英鎊的代价，买了一部机器，而在它剛剛生产3百英鎊价值的貨品或服务之前，就把它損耗光了，那末，这部机器将会使他破产，而不是使他发財。另一方面，假使这部机器用得过少，以致在偿还成本之前就变成陈旧无用，或生产太慢，以致时間上損失的代价，超过了使用較勤因而造成損耗的損失的代价，那末，加速它的使用，对于雇主是合算的。准确地确定获得最大利潤的那种恰到好处的地方，也許是一件微妙的事情；但是微妙的事情并不是感情冲动的事情：机器的感覚可以弃置不談，因为它根本沒有感覚；再者，社会的利益也可以弃置不談，因为这与生产者的利益并沒有冲突。至于将

旧的机器廢弃，則只要是在可以得到較好的机器的时候，也不会有任何后悔。

可是，假使生产工具不是一部机器，而是一个有生命的生物，那末，問題就立刻感情冲动地复杂起来了。假使这个野人，不去花費一天的劳动来做工具，而是以10天的功夫来捉获并馴服一匹野馬，并且在这10天所花費的劳动获得补償之前，就以过度的工作、虐待和飢餓把这匹馬弄死了，那末，很清楚，他立即就会遭到同这匹馬一样的命运。象雇主对于机器一样，他也得确定他应当讓这匹馬活多久才能从它获得最大的利潤这一个問題。一个奴隶主对于他的奴隶也要作同样的計算。这种計算，是象資本主义的生意經一样冷酷地进行的。在奴隶制度沒有被廢除之前，美国南方各州有些大农場公認获取最大利潤的办法是使黑奴在8年苦役中就被消耗掉。倫敦的街車，在还沒有用电力牽引来代替馬力牽引之前，曾有人算出，获取最大利潤的办法是在4年中把馬消耗掉。

很明显，以雇用的白种工人来代替奴隶的黑种工人，或街車公司以租用的馬匹来代替自己所有的馬匹的办法，并沒有改变这种計算的性质。当兰开厦的工厂主人們受到在一代的时間里消耗了九代的人的譴責时，他們的答复——假使他們有足够的大胆来說老实話的話——是：不管他們高兴不高兴，計算的結果就是这样，而且生意就是生意。

为了社会的利益，这种計算是不許可的。尽管雇主們有着政治的权力，殘酷的結果还是迫使議会通过了"工厂法"来加以干涉；这种干涉的有益效果——不只对工厂的雇工，并且对雇主的利益，都有有益的效果——証明：这种計算，不只是不人道的，并且是这样愚鈍地和这样不准确地粗制濫造，以致把雇主也导向自絕財源

的路上去了。可是，准确的計算，也象不准确的計算一样，最后也是与人类的福利不相容的。我們不可能証明，一种为了每个特殊雇主获得最高利潤的单純目的而在人道方面所作的毫无約束的和毫无忌憚的牺牲，不会在任何时候任何工业里导向获取比"工厂法"所規定的还要更高的股息。

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使用的生产工具中，机械的工具与人类肉体的工具之間有一个經济的和生命方面的区别。对于机械的工具，資本家必須付出全部的甚至更多的代价；至于人类肉体的工具，則虽然生产成本高得很多，却是可以不付代价而取得的。他的母亲的痛苦和风險以及料理家务的勤劳；他的父亲的劳动，納稅人为他負担的教育費用，地方和中央公有財产所供給他使用的物資，每一个幸获生存的健康工人所身受的生命力的消耗：这一切都是一个在工厂門前乞求工作的人的原始成本；但是雇主竟不花費一文錢就能收他来作为一件生产工具；雇主对他唯一的花費，只是維持他一周又一周的工作能力的起碼代价——衣，食，和住；这好象等于雇主不花一文地获得了一部蒸汽机，又从这部机器本身賺取油和燃料来供給它使用一样。假使由于驅使过度或喂得不飽而濫用了这件白手得来的活的生产工具，使它受了損坏，或者消耗得太快，以致到了"四十即衰老"的地步，那末，这雇主所需要做的，只是把它挪回街头，讓它由納稅人去照料，然后再以同样的条件，另拾一件新的人类肉体的工具。

对于濫用和敗坏国家人力的这样殘酷的一种动机，各地也有出来反对的人，他或者宁可使自己貧困，拒絕經营任何生意，或者依靠着某些生意部門特别組織力量的支援，作个人慷慨的解囊；可是資本主义的雇主們，作为一个阶級来說，是不能够反对这种动机

的。在这种动机的压力之下，我們不只有那些所謂被水淹沒的十分之一的人口，并且还有十分之八的仅在污水上面露出头来的人們，至于剩下的十分之一的人，則花費着所得到的利潤的极大部分，以便使自己脫离环繞着他們周圍的苦海。这就使全国人民的大批墮落成为无可避免的事实，因为，在成年的戶主中間，5个人中就有4个人除了把自己当作生产工具出售以外，沒有其他的求生之路，而他們的买主，則除了商业兴趣以外，对他們沒有其他的兴趣，并且也沒有替他負担任何的公共責任。象这样一种制度竟能持久地作为一种高度文明的基础，确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試想一想看。煤矿主人必須买另一匹小馬来代替他在矿場里所杀死的那一匹，否則便无馬可用。可是，他毋須买另一个孩子来代替那个同小馬一道杀死的孩子。第二天早晨，他的經理人便可以在門口发現另外一个孩子，或者也許很多的孩子，一切現成，可以用維持每周生活的条件換来填补那已被杀死的孩子的位置。这就說明了为什么所有資本主义国家的典型企业家，对于他所雇用的工人的生病率和死亡率，是如此地漠不关心，正如他直覚地反对每一种保护工人的措施的例子所首先証明的那样。但是，意外事故还不过是許多罪恶中最小的一种。我們不必再引十九世紀前半期在无約束的資本主义下的悲慘故事，那时通过过低的工資和过重的工作，通过流浪工人階集的形成和失业周期的循环出現，造成数百万家庭不幸的貧困，非人的墮落，和过早的夭亡。我們也不要自安自慰地說这只是过去偶然发生的事。在資本家的独裁还沒有被法律的权力或工会的对抗所限制的每一个工业部門中，低的工資、长的工时和不卫生的劳动条件等罪恶，現在还是存在着；而就业不足或失业所造成的慢性飢餓，仍旧是用花費公家的錢来举办的，代价很高及腐蝕

性很大的失业救济金，来加以緩和的。人类肉体的生产工具的这种破坏和毀灭，不可能認为只是因为資本主义制度走入了邪途。現在已經看出这种罪恶是牟利的方法本身不可避免的事故。的确，归根到底，个别牟利者的本质就使这种罪恶成为必然的事情，因为除非他在剝削的勾当中能够赶上他的最殘酷的竞爭者，則他所賴以为生的利潤本身（即依靠成本价格和銷售价格的差額而构成的利潤），終久就会失掉。到了十九世紀后期，資本主义在这方面的缺陷，已經获得了全世界公正学者的公認。

較晚的一个发現是，資本主义給那些还沒有变为私有的公共資源所带来的毀坏，例如牟利者的工业的煤烟和有毒气体所薰染的空气，它所沾污的流水和所弄脏的通道及空地。对于这些公共卫生必需条件的任何重視，都成了个别牟利者的障碍，因此在牟利者的独裁統治之下，都是不会得到支持的。牟利者在水、陆、空三方面散布的污秽，和对千百万同胞安乐的和美丽的环境方面的破坏行为，对損害人們健康、幸福和智力方面——都是人类生产力的因素——的影响，誰能衡量得出呢？

天然資源的毀坏

牟利者破坏的还不只是人和人的环境：他所沾污的还不只是較古老的文明。在追求人口稀少的新地区无限天然財富的当中，牟利者就把他毀灭的方法从这一个洲带到了另一个洲。天然的資源是极其丰富的和代价很低的：在許多地方它們不需要絲毫代价。因此，不論在季节中也好，不在季节中也好，产毛的和当食物用的兽类都被杀掉，直到它們絕种为止；原始森林夷为平地；天然草原剝得精光；处女地的土壤变成貧瘠；煤和金属、石油和天然煤

气——所有蘊藏的动力資源——都被浪費和耗尽；連河流也弄成涸地，气候本身也遭到損害。沒有一个人会批評美国政府是反資本主义的，或是对牟利的方法有任何理論上的偏見的。可是在譴責蹂躪和毀灭美洲天然資源上，任何一个布尔什維克的煽动者都沒有比罗斯福总統和各州州长說得更激烈。罗斯福总統在1908年的州长大会上沉痛地說："我現在邀請你們到这里来聚会，为的是这些資源的巨大消費，和其中有些由于漠不关心和浪費的使用，已到了即将枯竭的威胁境地，有再一次要求共同努力，共同行动的必要……同样清楚的是，这些資源都是国家力量和永久生命的最后基础。最后，目前的事实已很显明地預示，这些資源都在很快耗尽的过程中"①。"今天当你們經过南方的时候"，一位最大的美国工业巨头，希尔先生，断言說，"你們可以处处看到滿布被大雨剝蝕形成的水沟的土地；沟的两岸土地，一度是肥沃的农田，現在都变成了荒蕪的紅土和黃土，并且，由于主要的支持物都已被冲刷掉，农业也因此衰減。成百万亩的土地，有的地方甚至达可耕面积的十分之一的土地，都是这样地被毀坏了，以致不能用人工来恢复原状。"② 伊利諾斯大学校长詹姆士宣称："沒有疑問，我們已在許多方面浪費了我們的家产。在我們急于致富的追逐中，我們象馬一样地用后蹄的前端踢着前蹄的后端，把国家长期工业和永远生命

① "保护天然資源的州长会議記录"（"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f Governors on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1908年5月13—15日（載"众議院文件"，第128卷，第1425号，1908—1909年第二届会期，第67頁）。

② "保护天然資源的州长会議記录"（"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f Governors on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1908年5月13—15日（載"众議院文件"，第128卷，第1425号，1908—1909年第二届会期，第67頁）。

的基础本身也毁損了。"① 政府的专家报告說："巨大的浪費，已經伴随着我們森林的利用而来，……浪費的主要原因是火灾，砍伐方法和提炼松节油方法上的浪費，木厂的浪費和木料使用上的浪費。"② 矿产也有同样的破坏情事："丢开已經开采出来的部分的浪費和过度的使用不談，"一位美国专家向州长会議报告說，"单是留在地下而无法取出的煤的百分比，在各不同的煤田里就占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七十；至于最宝貴的一种燃料，天然煤气的浪費，則竟大得甚至沒有人可以估計它的百分比……隐藏在公司权势和影响后面的貪婪自私的势力是这样地根深蒂固，以致任何对它們的攻击，都好象与西斯法士③ 的努力一样，使你們看起来往往是徒劳无益的；但是，你們既然爱护你們的本州和国家，我恳求你們为保

① "保护天然資源的州长会議記录"（"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f Governors on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1908年5月13—15日（載"众議院文件"，第128卷，第1425号，1908—1909年第二届会期，第174頁）。

② "半世紀以来的經驗明白指出，在弗吉尼亚、南北卡罗萊納和佐治亚各州，現在提炼松节油的方法，使南方长期的海軍軍需工业，完全不可能維持。这些方法往往使森林在4或5年之內就停止生产。它們已經把現有的可以炼油的长叶松減少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在有些地方不得不用到4或5英寸直徑的松树。这就一般地意味着松节油的收获量将极度減低，否則，就要使可以长大作木材用的松树在一两年之內死去……由于不小心的砍伐和火灾，我們把現有森林的复原能力，一年又一年地降低下去，或者整个地毁灭掉了。……虽然我們的木材树成长得惊人地快，可是由于濫費的砍伐和火灾，以及一般在培植幼苗上的疏忽，我們已經使我們的森林比世界上任何同样地区的森林的生产率都低。"
（"中央天然資源防护委員会报告"〔"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nservation Commission"〕，第1卷，載"参議院文件"，第10卷，第670号，第60届国会，1908—1909，"森林部部长发表的声明"，第57—59頁）。

③ Sisyphus，希腊古时一个国王，因生时作恶多端，死后堕入地狱，被罰推石上山，但推上又滾下，永远如此，劳苦无已。——譯者注

护我們的燃料資源而掀起斗爭，并且下定决心，永不投降，直到那急剧敗坏我們国家繁荣基础的貪婪勢力完全屈服、并同意終止象过去那样的粗野的破坏暴行为止。"① 加拿大的資本家也不比美国的資本家更加善良。"在世界大战以前不久，在卡尔格里地方"，有人告訴我們說，"他們发現了一个油井里藏有少許石油。在 48 小时內，邻近的土地就立刻更換了主人，价值从每英亩 1 万英鎊漲到 1 万 2 千英鎊，并且发行股票达 1,200 万英鎊的許多公司也組織起来了；讓与和租借的契約都以机关枪的速度来訂立了；即使发現出来的是眞正的油田，那末，也会很快地被那些乱七八糟的、漫无約束的、爭奪油井的烏合之众所掠取精光和浪費干淨"。② 我們必須再一次强調說，这一切蹂躪和毀坏的根源并不是人們的惡意，甚至也不是資本家們的惡意，而是牟利企业无可避免的結果。一位州长总結說："在旧的各州認識到它們的森林、它們的水道、它們的矿場和矿产的价值之前，它們已經讓这一切資源从自己的手上溜到私人的占有中去了。現在同样的情况也在較新成立的各州进行

① 第 1425 号，"保护天然資源的州长会議記录"，1908 年 5 月 13—15 日（"众議院文件"，第 138 卷），第 36 頁。

② "观察报"，1919 年 6 月 1 日。"那是差不多在美洲开采的每个油田的历史"，这位作者补充說。"一次油田的发現，一批投机商的涌現，一些土地价格的暴漲；看起来，几乎小到逸起重机也眞要互相挨着的地区，竟不加考虑地竟相开鑿；勉强可以支持 3 个井的地区竟鑿上成打的井；每个瘋狂的小矿主都尽可能搶快地采油，以免他地下的油被邻近的人和竞爭的人所采去；对于作为迫使石油流动的唯一力量的煤气，竟沒有科学的保护措施；这是一种白热化的、乱糟糟的、互相傾軋的、逼使邻人去作乞丐似的，竞爭，在竞爭过程中，几乎有一半到四分之三的石油都被弃置在地下而永远不可复得——就这样，全世界最富有和最浪費及最忽視油藏的美洲，已变成了油田不能得到很好开发的典型例子"。（"保护天然資源的州长会議記录"，1908 年 5 月 13—15 日〔"众議院文件"，第 138 卷〕，第 36 頁。）

着；并且，我們从祖先得来的丰富的遺产，不久将面临一无所有，无需保护的境地。"①"直接关心并从事这种工业的人們的金錢要求"，一位現代經济学家說，"无論这些人是发起人、資本家或移殖者，往往是只顧眼前的利益的；并且他們举办事业的报酬必須是暴利。他們当时的經济利益只限于当前的价值。"② 对于未来的价值，即后代应得的正当遺产，資本家当然是毫不关心的。在有关后代利益的一切問題上，"牟利的活动"，不仅不去决定"究竟劳力用得是否适宜或原料用得是否恰当"这个問題，并且实际上是把企业領导者的思想引向另一个方向，即用劳力来毁坏将来生产所必需的原料。

其次，我們必須注意到，贊揚利潤的牟取是工业組織方法上唯一的和足够的法門这种說法，会使商品的質量不断降低。資本家的竞爭导致生产方面的改良这种說法，一向是人們深信不疑的原理。可是我們現在所看見的是，它也同样确定地导向产品質量的降低。当利潤的牟取是生产效率唯一的尺度和生产成績唯一的試金石时，資本家独裁的座右銘是"金錢是不会发出恶臭的。"凡是产

① "保护天然物資联席会議記录"（"Proceedings of joint Conservation Conference"），"參議院文件"，第10卷，第676号。"中央天然資源防护委員会报告"，第135頁。

② 伊利教授編："国家繁荣的基础"（"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 Prosperity", edited by Prof. R. T. Ely），1918，第100—101頁。"斯密（亚当·斯密）派所傳授的，只是关于价值的理論，别无其他……它是……教人們怎样去生产、分配和消費財富或可以交換的价值的科学。毫无疑問，这不是教人怎样去启发和发展生产力的科学，也不是告訴人們这些生产力会怎样地被压縮和被毁灭的科学。麦克洛克明白地称它为'价值学'，并且近来的英国作家們都称之为'交易学'"（"保护天然物資联席会議記录" "Proceedings of joint Conservation Conference"，"參議院文件"，第10卷，第676号。"中央天然資源防护委員会报告"，第74頁）。

生利潤的都是好的；并且利潤越大，則所認为对社会的利益也越大。假使获利的刺激，誘导了許多新的发現和发明，那末，我們看出同样的刺激也确定地使产品的质量降低了。

产品质量的降低

渗劣、假冒以及各种短斤缺寸伪造乱眞的度量衡器，都能被当作——用約翰·布莱特的名言来說——"竞爭的方法。"① 这种竞爭的形式，直到了十九世紀的中期才被公众发覚出来，而且是由显微鏡把它暴露的。"在显微鏡沒有暴露出这个事情以前"，調查食品渗劣特选委員会第一次报告告訴我們說，"大多数的渗劣商品，都是无法发現的，并且产生这种商品的人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任何工具甚至能够暴露这些秘密的和罪恶的勾当。在那个时候，渗劣的活动是很有保障的和比較无人查究的；現在这种保障的感覚已被摧毀了，渗劣的人也知道他的勾当随时可被人識破。"令人欣羡的自由竞爭原則所产生的毒害結果，已經由著名医葯証人向普通的公民指証出来了。"可能是湊巧发生的，并且毫无疑問有时也实际发生这样的事情，同一个人在一天之內，将我所列举东西中的 8 种或 10 种，一齐装进肚子里去了。例如，在早餐吃的罐装肉和魚、鰌类、紅酱油或紅椒粉，他就或多或少地吃进了亚美尼亚的或威尼斯

① 布莱特的一个同时代人，曾为辯护这种渗劣行为作过解釋。"假使你們把渗劣商品的竞爭消灭了"，李明頓地方卫生委員会主席告訴調查食品渗劣特选委員会說，"那末，你們将不是为公众造福，而是为他們造成最大的損害，因为你們将会造出一大批眞品的专利人，从而会使那些貨品的价格漲到这样地高，以致三分之一的人口无力問津。""調查食品渗劣特选委員会第二次报告"("Second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Adulteration of Food")，1885 年 8 月，第 480 号，問題第 2535 号。

的紅色顏料、鉛丹或甚至水銀的酸性硫酸汞，或硃砂的酸性硫酸盐。在晚餐的时候，随着他吃的咖喇或紅椒粉，他也許湊巧吃了第二剂的鉛和水銀；再随着所吃的酸菜、罐头水果或罐头蔬菜，他几乎确定地服了銅了；同时，假使他在餐后食品之中享受了一份糖果的話，那末，他究竟消費了多少有毒顏料，簡直无法計算了。再者，在吃茶的时候，无論是混合茶或綠茶，他可能少不了要尝着一点普魯士藍顏料，而且又可能还有更坏的东西。最后，假使他是一个用鼻烟的人，他便随时确定地把小量的鉄質土、鉻酸鉀、鉻酸鉛或鉛丹送入鼻内。假使他是一个病人，則他的情况，还要更坏；因为这就大有可能，使他失去医师内行帮助的便利，而在服用药剂上受到冲淡和滲劣的不良影响。必須指出，这决不是幻想的或过甚其辞的描述，它是从卖給消費者的各种物品的分析中所得的合理結論作为根据的。"① 自从 1855 年第一次的調查到現在，我們看到，在所有的資本主义国家里，都涌現了忿怒的高潮，反对牟利者所行的滲劣和假冒的复杂办法，并为偵察和限制这些办法起見，接着就連續制定了一套法律。可是，假使显微鏡帮助了化驗人員去发現滲劣的情况，化学的进步却又帮助了牟利者用科学的方法来規避显微鏡的眼睛。1915 年一位医务官員說："偵察滲劣的工作是越来越困难了，原因是：第一，由于滲劣物品的卖主的狡猾；第二，由于現在采用的更高度的科学方法。以前的报告指出，牛奶的卖主們是'調制'过牛奶的，或者，用普通的英語来說，是滲入了提去奶油的牛奶的；但是他們很細心地不使这奶'調制'到农业部規定的标

① "調查滲劣食品特选委員会第一次报告，証明文件和附录"，1855 年 7 月 27 日，第 432 号，問題第 150 号。

准以下。拿提去奶油的牛奶渗入鮮奶的办法，差不多已經变成某些牛奶供应者的一种細致的技巧了；虽然大家知道他們收进了大量提去奶油的奶，并且沒有将它出售，可是他們渗杂得这样地巧妙，以致不可能把他們投入法网。"① "主要的困难，是对付肉类，它里面的疾病象征，是普通的人所难以偵察出来的：这些象征，往往是很容易地被去掉；而且，作为最后的掩护办法，紅腸用碎肉器、香料，和最后吸引口味的調治，如罐头肉、肉酱、紅腸或其他美味食品，都将食物加上有效的同时也許是很不适宜的伪装。要有效地檢查肉类，唯一的地方和时間是在宰牲場和剛在宰杀之后腐肉尚沒有被去掉之前。……格林斯俾的情况是地方城市中最典型的；'那里有 54 个每年領照的宰牲場……散布在全市各处；每天日夜（連星期日在內）任何时刻都可能同时进行宰杀'。从那些負責肉类供应的卫生事务人員的眼光看来，这些事实已构成設立地方公营宰牲場，取締私营宰牲場的理由了。"② 簡单地說，这个要求是以市

① "地方事务部第四十二次年报"（"Forty-second Annual Report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Board"），1915，第Ⅲ編，第 66 頁引用的話。

② 班宁吞："英国公共卫生行政"（B. G. Bannington: "English Public Health Administration"），1915，第 160 頁。"一位关于这个問題的現代作家叙述私营宰牲場的情况如下：

'所有四周，都被住宅圍着，空气的流通几乎不可能，光綫有时可以射进，但很困难；地面往往完全沒有鋪砌，或者鋪得如此的坏，以致竟变成了污血和垃圾盖滿了的地方；墻壁往往是木板的，上面灰尘厚积；兽圈則不够牲畜之用'。除此之外，还可以加上一个大的下脚間，所有的粪便、腐肉和血都从屠宰間墻上的一个洞，流入这个下脚間里去，它的地平是特别为这种目的安排的。环飞在这肮脏的廢料堆上的成千成万的藍蒼蠅，在下脚間、屠宰間和卖肉店之間，从事于杀人的任务；这 3 个地方好象是为了方便起見，彼此都联在一起的"（"市政府关于肉类的檢查"["Municipal Inspection of Meat"]，派斯雷市首席卫生檢查員凱尔涉在格拉斯哥大学英国公共卫生学会年会上宣讀的論文，1896 年 7 月 27 日，第 3 頁）。

营企业来替代資本家的企业。

所有的文明国家，为侦察和惩处牟利者产品质量恶化的詭計和反侦察的詭計而不得不施行的严密規章，大致都是限于食品和葯物的。大家已經承認，这种渗劣的形式"意味着逐漸毒化民族，使整个国家的体质降低，阻碍我們的生长，迅速敗坏我們的身体元气；同时，从道德方面来說，意味着卖者在买者身上行使的一种每日的和經常的欺詐：一种从极小事情开始的詐欺，可是不久便把我們养成了这样硬心的人，以致会在更重大的事情上行之而无愧。"②

同样的产品质量恶化的过程，也可以在所有各种各样商品和服务事业中看到：在棉布的过分上浆上；在不經用的家俱的制造上及翻造呢絨做的現成衣服上；和在除豪富的住宅以外所有住宅的偷工减料的建筑上。的确，机制的东西，与成本較高的手工制成品比較起来，許多人对于前者的憎恶，都是由于它十分容易伪装坚固，而在实际使用方面，却失掉了它大部分的价值。沒有理由認为机制的坐椅或窗格、机制的衣料或长靴，应当比相类似的手工制成品，还要更不經久，或者甚至設計更缺乏艺术性。但是，資本主义牟利者为图一时的利潤而施行的劳动分工和机器生产，却帮助着、并且最后还要求着各种下流的欺騙，其中很多实际上还是手工完成的，如現成衣装各别部分的縫綴工作。在这里，資本家又是在短

② "全国社会科学促进会会报"("Transactions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cience")，1870，泰恩河上的紐卡斯尔会議。比万："应采用那些立法措施来取締食品、飲料、葯品的渗劣？"(Phillips Bevan: "What Legislative measures ought to be taken to prevent the Adulteration of Food, Drink, and Drugs?")，第391頁。

期的成就上着眼，并且往往把馬上就会被看出是根本不經济的商品——有时甚至連样品的标准都沒有顧到——供应到不惜化費很大推銷費用的新市場里去，从而使他的同行，甚至他自己的公司，在几年之間失掉市場，讓給其他国家的商人，而这些其他国家的商人，开始供应确是比較优良的商品，可是，由于他們也只是牟取利潤的人，最后也将貨品的质量貶低到同前者的一样。

某些特殊出口貿易的从一个国家的手里轉移到另一个国家手里的这种經常变动状态，是每个国家里貿易商日新月异地意图使用政治力量来掠取他們市場的因素之一。一个美国評論家告訴我們說，牟利的企业"是在那些专心一致从事竞爭活动的人們掌握中的。对于可以促进他們自己利益或者可以阻碍他們的竞爭者的利益的手段，他們是不愿放弃或忽略的，业务的竞爭也不准許他們放弃或忽略。"①

供应有害的商品和服务

对資本主义牟利者来說，正面的坏事也許是一种好处。在建立那种供应无效力的或有毒素的专卖葯品，葯酒以及治疗毒瘤、結核病、性病、痛风症或风湿症的自疗葯物的龐大工业上（且不提避孕打胎），牟利的刺激，与为飢餓的人供应食品及为赤身的人供应衣服这种企业所有的牟利刺激，是同样地强烈有力的。"这种生意（卖假葯）的利率"，有人告訴我們說，"仍然很高，因为很多正派的人們不屑于去做……一个人本来只要买 2 盒或 3 盒葯片，就能够

① 凡布倫，"商业企业的理論"(Thorstein Veblen: "The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1904，第 292—293 頁。

并且确实可以治好他的疾病，可是他却要連續許多年去买那些对他永沒有什么好处的假药。这是很普遍的情况。"① 有人算出，单在这一种生意上，每年从公众榨取的錢，就在 300 万英鎊以上，而所花的本錢，只是用在夸大的广告上面的就有 200 万英鎊——这是买通报紙对这种不正当的营业保持緘默的費用。在从消費者身上榨取的总数之中，只有极小的一部分——可能是 10 万英鎊——是生产的成本，300 万英鎊中的其余部分是造成私人豪富的"价格上的利潤。"② 制造专卖药品的托拿朋盖的牟利工业被一个敌手，就是一位华倫夫人③，所从事的行业所打倒。在全世界所有各大都会里，好几百万英鎊的資本——有些部分是由十分无知的"不劳而获"的人們拿出来的——投入住宅、茶室、按摩院、音乐厅、跳舞場，以及在其他方便的掩护名义下首先进行誘騙，然后强制青年男女作性的罪恶活动的牟利生意。經济学家一定要列在这类生意中的是，推广和組織各色各样的賭博营业。私人賭博可以是也可以

① 狄布里："供求的定律"(G. B. Dibble: "The Laws of Supply and Demand")，1912，第 113 頁。

② "下議院特选委員会报告"("House of Commons Select Committee Report")，1914，414，第 9—10 頁。关于所有主要的自疗假药，英国医学会出版的两种書刊——"关于秘制假药"，1909 及 1912，曾作了一系列的分析。这个分析揭发出，这些专卖的药品中，虽然有些是肯定有害的，可是大部分只是毫无用处的，其中唯一显著的地方是，成本加上印花税的数目和消費者付出的数目間巨大的差額。价值 2 先令 9 辨士的止咳药片的成本只有 1 辨士的三分之一；1 先令一瓶的另一种药水的成本只有 1 法寻的十三分之一；一种以治疗毒瘤作广告宣傳的电液，分析之后，什么也沒有；另一种药水是以水来冲淡的不清洁的酒。跟着这次的揭发，下議院在 1914 年特成立了一个特选委員会；該委員会的报告主張政府对所有的专卖药品都实行分析和管理——这种措施，到現在还沒有实行，并且，甚至还沒有实施的影子(1923)。

③ 托拿朋盖和华倫夫人是蕭伯納两种書作里的主角。——譯者注

不是一种适宜的消遣。但是有意地去刺激和利用男人、女人和年輕人的賭博本性，来为私人的利益服务——一种使用巨大資本的营业——則很难認为是国家資本、智力和体力的正当利用。另一种例子是借貸的"服务"，即以百分之几百的利率借款給未成年的青年、暫时遭遇困难的地主或不善于經营的商人，或那些把薪水花費过头的懃笨职員。① 最后，我們还須注意到一个事实，即，由于"文明"的进展，工业先进国家越来越多的土地、机器和劳力——越来越多的、由牟利的强烈刺激发出来的、自命不凡的經营才能——都引向到一种首先为着鼓励后来为着滿足全世界对各种有害的酒精飲料的"有效需求"而經营的企业；至于鴉片、古柯硷和其他毒品的

① 地方事务部政务次长，在1900年向下議院提出借貸法案时，曾引述了"两件曾被提到一个委員会面前的例子，这个委員会就是为本法案所要取締的借貸制度而組織的。一个不幸的爱尔兰地主，名叫芬雷，从一个經营貸款的商人那里借了300英鎊，并出具了一張456英鎊的期票，按月分期偿还。芬雷先生已經按期偿还了数次，不过有一次为繳偿的部分所开的支票，迟交了一天。于是支票退回，并要求付还全部借款。而且背約的利息还要由他負担；当芬雷先生来到法庭时，他为了300英鎊的借款，从1890年11月13日起到1892年2月20日止，除了分期付的114英鎊以外，还被迫付出了另外的600英鎊——总共是714英鎊……另一个例子是：一个英国商号叫做亚当斯的，于1892年11月向伊撒克·戈登借了50英鎊，并出具了一張200英鎊的期票。他于1893年2月又借了50英鎊，同年6月又借了20英鎊，并于11月又借了50英鎊。从1892年11月到1894年9月，亚当斯先生总共偿还了461英鎊，可是在1894年10月，戈登仍宣称：关于这笔220英鎊的借款，还欠他介紹費（佣金）5英鎊……戈登遂根据那一張期票，向伯明翰郡法庭提出控訴"（"韓輯議会实录"，1900年6月21日，第681頁）。这議案曾交付一个有权威的法律委員会审查，該委員会的报告說："經过仔細考虑証据以后……本委員会毫无犹預地得出結論，認为职业放債者高利貸款的制度，足以产生犯罪、破产、对債务人的其他債主不公道的待遇、向債务人的家属和朋友勒索敲詐以及对社会发生其他的严重損害"（"下議院特选委員会报告"〔"House of Commons Select Committee Report"〕，1914，414，第682—688頁）。

生产及走私，則更不必說了。这种企业說明了現在許多豪門賴以兴起和許多乡間別墅賴以維持的大部分財源。是否有人想到，假使把每年的儲蓄，有考虑地用在扩充和发展那些好象最需要增加的生产部門方面——假使这些儲蓄能由民主地組織起来的合作运动、由地方經营的企业或者由議会授权的国营工业来加以支配，那末，全国的紅利中，还会有这样大的比例部分用于这些即使不是实际上有毒素的也是可恶的目的嗎？

不事生产的收获

在生产工具私有者或組織者的企业中，許多諷刺事件之一是：全国积累的資金，可以用来保証获得价格上的巨大利潤，而完全不必生产任何有用的或有害的商品或服务。一位拥护近代資本主义的德国人告訴我們說："旧式的資本主义企业主，都是带着技术的烙印的。近代的企业主則是毫无色彩的。"他也許决定将他所有的或所控制的信用和資本用来制造商品或提供服务，或者，他也許发現，用它来制造不代表任何資产但以浪費的开支来登广告和抬高紙上价格的"証券"，还有更大的利潤。"从此以后，股票和股份出現了；这种出現，并不是由于有人有筹集金錢和依靠信用的需要，而是完全独立地作为一种資本主义企业来举办的。"① 事实上，"野猫"（Wild-cat 一种投机公司。——譯者注）的举办工作，和有用企业的辛勤組織工作，是一样地一年做到头的，并且也是一样稳定的利潤泉源。"这一类的詐欺"，我們最偉大的最高法院院长于 1898 年在倫敦市长举行的招待会上說，"正在这个社会里蔓延着——

① 桑巴特："犹太人和近代資本主义"，1913，第 101 頁。

种最危險的、活动广泛的詐欺——接触着所有的社会阶級，使社会受着巨大的金錢損失——这損失大部分由那些最缺乏負担能力的人来負担。并且，甚至还有比这更加重要的、是那阴損和敗坏公共道德感的詐欺，而这种公共道德感是凡属关心社会福利的人都应該当作共同目标来維持的东西——这是有伤荣誉和玷污名声的詐欺。"①"一个例案是这样的"，这位最高法院院长繼續說，"一笔財产的买卖是講妥了，或者，至少可以說，卖主意图将它出卖了，——这是一笔在非洲西海岸的財产——卖价 4 万 8 千英鎊，而这財产在出卖时却完全沒有存在。在这次虛构的买卖做完之后，一个代表便被派出去作調查；这位代表的报告記載說：有一笔財产以 140 英鎊从当地一个土人酋长处买进，他認为这差不多符合发起書上所叙述的虛构財产的情形。另一个例案是：一个企业，在公司組成以前几星期，曾以 637 英鎊买进，后来在市面上卖出时，它吸收了大約 76,650 英鎊。这些都是較显著的例案。还有一种盛行的詐欺——我只是根据我在法院的經驗来說——是这样的：拿尚未繳納足額的資本来做分配股息的勾当。公众的認股并沒有象預期的那样踊跃，因此只能从他們收得小額的金錢。那末，怎么办呢？一个誠实的、独立的、沒有利害关系的內行的董事会一定会說，

① 收买沒有經商訓練或經商能力的貴族和其他社会名人来作为吸誘头腦簡单的投資人这件事情，与将爵位卖給那些沒有品德的暴发戶这种公开的丑惡事件，恰恰是一个对照。1900 年上議院 586 名貴族中（連同教会貴族在內）共担任了"不少于 435 个商业組織的董事或董事长。在各公司的貴族董事中，有 2 个主教，9 个公爵，8 个侯爵，53 个伯爵，9 个子爵和 81 个男爵——他們都是上議院的議員"（麦克尼尔："詐欺的公司和坐視的議会"〔J. G. Swift Macneill:"Company Fraud and Parliamentary enactivity"〕，載"批发合作社年刊"〔"Annual of the Co-operative Wholesale Societies, Ltd"〕，1900，第 174 頁）。

根据这样的認股情形，分配股息是不可能的事。可是，他們不是他們自己的主人翁；在我所想象的例案里，他們是发起人的傀儡，发起人給他們薪水；他們沒有独立思考的地位。結果怎么样呢？发起人把所有一点錢都收刮干淨，而为維持公司的悲慘的衰弱的生存起見，董事們发行了債券，这种債券大半是沒有登記过的，关于这一点，債券持有人也沒有得到通知。于是这公司得以經营相当数量的生意；零售商和批发商都与他們做生意；等到垮台的时刻一到，債券持有人立即蜂拥而至，将他們的存貨——公司所有的东西——一扫而空，弄得許多債权人一点补救办法也沒有。"

牟利企业的一种更加狡猾的方式是把公司的資本額估計得过大。"一个确值 10 万英鎊的公司"，这位最高法院院长告訴我們說，"根据那个資本价值，很可以对所投的資本支付一笔相当好的贏利，可是，如果把股票升值，借以滿足中間人和发起人的貪婪要求，并藉着它来支付浪費的广告費，浪費的专家报告費，为延請董事而贈送的金錢或股票，甚至为董事的介紹人而作的贈与，那末，这个公司就变成一个欺詐的公司了。于是它便根据这种方法，按照升值后的价格——实际价格的 2 倍或 3 倍——在市場出售了。在这种例案里，損失和失敗是肯定的，并且公众还要为了在他們头上所行使的欺騙付錢，这还有我来說的必要嗎？"假使說董事会能为这公司的业务带来实际的营业知識或政府的支援，这至少也可以減輕一点它的坏处。可是，特别显明的事实是，在实在太多的事例里，他們既不能带来业务知識，又不能带来政府的支援，他們之所以被挑选为董事，就是因为他們的名字或头銜对于公众是有吸引力的。① 的确，营业的失敗，尽管带来了一切的損耗和資金的損失，以及它所造成的破产、失业② 和毀家的悲剧，但就資本家們整

个阶級来說，从这种专門經营使大胆而又缺乏經驗的小另售商上当的商行，到那些注定迟早要"改組"的大飯店的发起者和装备者，

① "泰晤士报"，1898年11月10日。罗素勛爵宣称：清理官曾告訴他說，从1890年到1897年"社会所損失而落到那些不正当的人的腰包的总数，不下28，159，482英鎊；其中属于与公司往来的債权人的損失为7，696，848英鎊；属于投資者或股东的損失为20，462，633英鎊。"（这些数字只是关于被迫倒閉的公司，那些减少資本的公司不在其內。）由于破产而丧失固定职位的損失，已由1909年貧穷救济委員会少数委員的报告指出。調查人員在研究使人們失业的原因时，发現破产或雇主营业的改組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在1899年，即貿易繁荣的一年，在英格兰与威尔斯，共发生破产及立契出讓給債权人的案件7，085起。在1904年，在循环的經济萧条的深淵中，这种数字就增加到8，631起，或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貿易部关于破产事件第二十五次年报"，載"下議院文件"，第254号，1908年）。如果我們假定每一起案件里，平均只有10个人失业的話，那末，虽然整个营业一直沒有完全停頓，这个統計就說明了在一个旺年，有70，000人并不是由于本人的过失而丧失了职位，而在一个淡年，就有86，000人同样地失掉职位。并且还有許多小的营业是不經过正式的破产而失敗和倒閉的。"（"少数委員报告"，第572頁）。

② 我們由于問題尚有爭論的緣故，沒有提及关于全世界股票交易和物品交易市場的巨大投机活动。一部分的投机，可以为之辯护說，它是平衡物价的一种間接的（但我們以为是麻煩的）方式。可是，近年以来，正当的投机，已經被商业賭博的严密的上层建筑压在底下了；这不只是出現在証券方面，并且还出現在主要的食品和原料方面；所有关于小麦、棉花等物品的期貨（近期和远期）买卖；"卖空"和"操縱市价"，"抬高价格"和"压低价格"，"全部拋出"和"急速轉卖"的詭計，以及在指定保証金上的賭博等习慣，都是致富——往往是巨富——的窍門，可是它們除了造成各种生产者的收入和各种消費者所付的价格的极端不稳定以外，沒有生产任何东西。"商人生意的主要点"，費布倫教授說，"已經从曾經一度与他生活密切攸关的对于工业生产过程旧式的監督和管理方面，移轉到投資方面敏捷的調度上面，使之从賺小錢的冒險轉到賺大錢的冒險；和移轉到通过机巧的投資及与其他商人合作的方法获取商业上战略的控制权上面去了"（費布倫："商务企业的理論"，第24—25頁）。再者，这种活动也意味着生产过程上危險性和不稳定性的实际增加。"大概地說，这类商人，只要他們不是别有用意的話，是欢喜把商場的騷动搞得越严重越頻繁的，因为他們的利益就在商情的变动上面。"（同上書，第34頁）。

仍是和那种以劳力为基础的隆盛的新工业一样地获得利潤。倫敦郡議会曾經造成的一次"損失"，是不容許我們忘怀的。造成这次"損失"的原因，是議会組織了它自己的工务部門（为了反对包工"集团"的一种自卫的机构）和自己經营了那私人資本主义已經遭过惨敗的一种企业，就是，泰晤士河上的汽船交通事业（为成千上万的乘客带来了健康和娛乐）；反过来看，在"私有企业"之下，在使用龐大数量的資本、才能和劳力举办的服务事业中，有意地和繼續地抽取一部分来，象上述的方式，使点不賺錢的有利于社会的事业，則沒有听見过。

推銷机构的过度发展

牟利冲动中一个最重要的并且确实是最难预見和最难認識的結果是，它所带来的为推銷而推銷的机构的过度发展；这种为推銷而推銷的机构，是与商品的生产机构及正当的分配机构有区别的。作为利潤泉源的貿易和金融的过度发展，层层剝削的寄生的中間人的成长，使得不只在一个高度組織的資本主义国家里，而且在所有高度組織的資本主义国家里，用于竞爭和往往是欺詐的广告方面每年成亿英鎊的費用①，已經走到这样的极端，以致人們都

① 狄布里在其所著的"供求的定律"（第183頁）一書里，曾引用了广告顧問社社长罗素先生所作的估計說：在这个国家里，每年用于广告的費用，总共有1亿英鎊。"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并且，当我們把它与全国整个机器工业的产量相比的时候，这个数字好象还要更大一些。全国的机器工业，包括造船工业和发动机工厂在內，在1909年的总产值，就整数来說，約为1亿5千万英鎊，其中7千万英鎊是原材料的成本。它們增得的产值是8千万英鎊，比联合王国的广告开支还要少些。"美国和加拿大在这方面的开支，合計起来，至少有2亿5千万英鎊；德国、瑞士和工业的奥国在这方面的开支，合計起来大約与英国相等；因此，我們可以估計，欧洲和北美洲用于广告支出的大概数字是5亿5千万英鎊。

說，一件物品生产以后，它的推銷費用，比起全部制造費用——整个生产过程，从头到尾所需要的一切材料和一切部件，运輸过程中从种植地或矿場起直到把制成品运到貨車上，所耗費的一切成本——来，还要多得多。可以不算过份地說，資本家的独裁，在私人利潤的刺激之下，已經把我們带上了这样的一条路上，以致在今日的英国，全国四分之一（甚至可能有二分之一）的土地、机器、劳力和商业才能，都卷入到牟利工业中，使我們作为生产者所生产的商品，被当作牟利对象，仍旧回到以我們作为消費者的手中。

也許可以問：为什么不应当这样呢？分配过程中的成本高于比較更加集中的生产过程上的成本，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不足为奇的。一个显明的例子是自来水的供应，在这一种企业里，生产方面是不需要任何成本的，而分配方面則需費很大。任何看見过針或鋼笔的机器生产或甚至7辨士的布面装訂書籍的生产的人，都能相信，将成品从机器上运送到消費者手里的任务，要比从原料生产出它們来的任务，需要多得很多的时間和劳力。再者，由于一种产品的存在和用途，如果不使消費者知道，則这种产品就等于不存在一样，所以广告的事业，在国家的工业中，就也有它的正当的作用。

可是，牟利制度下发展起来的分配过程，可以更适合地說是一种拦路打劫和敲詐勒索的严密制度。从生产者到消費者的康庄大道上，現在被一些人設立的一系列的海盜式的关栅堵塞住了，而这批人既沒有筑过也沒有修过这条路，只是潜伏在它的一段地区上，开办了一种征收通行税的业务。也許一个更加准确的比喻是，一条运河，在河的面上安置着許多不必要的水閘，使轉运的駁船在那里更翻地上上下下，直等到它們仍旧回到它們起运时原来的水平面上，并且它們根本就不需要离开这个水平面。至于牟利的广告

的消息，亦只是当作混淆眞相和勾引公众的事情提供出来的。举例来說罢，某人已經有了一件工具，如縫紉机或打字机或汽車之类，他能够很好地使用它10年；可是有一种特别大的努力，要通过广告的方式来誘使他每年买一个新牌子的工具；并且，好也罢，坏也罢，把工具作了一番改动，借使他相信这个新工具确有許多改善的地方，其实这种改动，往往是可有可无的，或者确是減低效能的。正是从牟利的追求发展出来的結果——分配和宣傳部門充滿了"卖不掉的貨色"或毒瘤——才使这些部門那样地費錢和那样地作恶，并且給我們已經举出的那些銷售机构过度发展情形的显明例子作了說明。

銷售机构的这种过度发展，是制造商和批发商人，为了牟取利潤，不願需要强制不断增加产量而产生一种永久性的焦虑所造成的。在資本主义的初期，特别是在英国几乎独占了机器生产和动力的使用的时期，商品的产量通常是不会完全滿足国内外市場的有益需求的。那时，全世界仍是渴望着获得各种各样的商品。等到欧洲的需求，已經达到了飽和点时，热心的商人們，"还能在东方的偏僻角落里，追逐到了一些世界上尚未被滿足的需求和随之而来的利潤，从而获得了一些愉快的年头。"商人的主要任务是将商品运送到高价征求的地方——直截了当地說，即在最低价格的市場买进，在最高价格的市場卖出——只要他們所經营的銷售业务是一直暢行无阻，那末，旧經济学家所說的定理，即認为物价的波动，只要是在还能忍受的最恶劣情况下，在长期过程中終久是会接近于生产成本的（包括运輸的成本），就还有一定的意义，因为，生产过程中任何增加的效率，或者，商品从生产地到消費地运輸过程中任何增加的便利，都为消費者带来物价的削减。

"生产过剩"是怎样发生的

但是，随着所有文明国家制造业大規模的扩展，这种效率提高和物价降低之間的因果关系，就宣告結束了。牟利的制造商和銷售商們，在不断扩大营业以追求更多的利潤当中，已經走过头了。他們为全世界的所有市場生产了暫时过多的商品；他們对于这些商品，只好或者以极大的牺牲留存起来，或者亏本卖出去。"在这点上，我們就到了我們龐大工业制度一个大問題的边緣了"，一位对于这种銷售机构普遍过度发展情形的最敏銳的观察家告訴我們說。"假使我們把現代生产資源的水閘打开来，大批貨物就会以惊人的廉价，和还要一直下降的更廉的价格，傾泻出来，奔流到各市場里去，使商业酬报的可能性化为烏有。这种比拟，是非常恰当的，一点也不需要加以修改。任何价格上的屏藩都不能拦住这种泛濫；并且这样形成的洪流，还会意味着产品的浪費和生产資料的可能破坏。所以，現代的工业，除必須花費大量資本来降低生产成本以外，还必須划出总数更大的一笔資金来維持推銷商品的机构。""現代工业的生产力是这样地大"，狄布里先生解釋說，"以致在几打拥有优良訓練的工业人口的，英国、德国和美国的适当城市，投下相当小的一笔資本，便可以生产种类极多、能够无穷尽地扩大生产的貨物，足供全世界之用。不过，我們現在所講的大数量，是那种如果沒有更多的銷售組織便永不能有利地被銷售掉的数量。""費用大的"，他总結說，"不是生产，而是銷售。既然工业的大部分报酬，在表面上都跑到那些从事于調节卖出、买进又卖出的商业組織成員的手里去了，我們也应当想象得到，在这些使他們获得巨大报酬的任务里，一定也有些相当的困难。它不可能完全是欺

騙和盜窃的勾当①”。

① 狄布里：“供求的定律”，(第43，47，52頁)。以降低成本来增加价格这种方法的一个最有趣味的結果是，貨品推銷专家所賺的薪金，要比貨品生产专家所賺的为高。“举例来說罢”，狄布里先生說，“‘兜到生意’这一句普遍通行的話；它并不是制造鞋子、大理石鐘或可可粉的意思，而是为鞋子、大理石鐘或可可粉找到了买主的意思。它說明了現在每一个人的思想領域，已經被一种思想所优先占領了，这种思想就是，一个以‘兜攬生意的能手’聞名的人，在他所乐于从事的任何商业行当里，事实上，自然会有他服务的現成市場。如果一个人有了这种才能，并且能够提出主意来使生产为这种生意服务，他就有了致富的捷徑。它是生意中最宝貴的才能，任何一个想避免失敗的人都不能沒有这种才能。”(同上書，第180頁)

“經济学者們沒有明确地提出来的一件事实是，中間人在市場上的实力是由于他們处在交易中心的地位所造成的。他們可以一面向生产者取費，又一面向消費者取費；并且(除非有外来的竞爭和內部的分裂)他們所須要做的，只是形成一个集团来同时操縱双方，使其有利于他們自己。战爭，由于它紧縮了生产組織并加强了对生产的急迫需要，比經济学者們更明确地表明了，坏的或付錢太多的分配行业不只是对消費和价格有影响，而且在生产上也有反应。在世界大战以前，中間人是可以把生金蛋的鵝杀死的，而这些金蛋就是他們所从事买卖的东西；沒有人会来过問他們；不在国內生产的粮食，可以从国外进口。但是，战爭却把这鵝的地位抬高了……現在这种錢到哪里去了和为什么到那里去这种問題，应当是更加明显的了。大多数的魚市場都是或多或少包办性質的組合；新来的人是不大受欢迎的。事实上，价格往往被提到天一般高来对付他。可是，他一經站住了脚，那末，为原来的商人的利益起見，他們就得团結他，以便一面对付生产者，又一面对付消費者。由于所处的交易中心地位，两边对付着分散的和比較无組織的生产者和零售者，中間商人便成了当时情势的主人翁；因此，几乎在每一个商务口岸，我們可以看到：

“(1) 魚販和中間商人，比起魚的数量来，人数实在太多；和

“(2) 公認的收費和利潤标准的被抬高，不是按照所担任的分配服务的抬高，而是抬高到这样的地步，使現有的过多人員，每人都可以从分配到的由他經手的魚，謀得生活。

“假使一个小的和沒有效率的中間商人能够从他所經手的数量不多的魚，謀取生活，那末，很明显，在同样的利潤标准上，一个大的和更有效率的魚行，一定能够从更多的数量上，大发其財。”(向托拉斯調查委員会提供的証件，1916—1917，銳諾尔德所提备忘录“魚业中間商人的壟断集团”〔“Rings among Fish Middlemen”〕，未經政府出版)。

資本主义是怎样增加成本的

这样大胆提出的結論，是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的。一种要求真正才能的經营，并不能保証它就具有誠实的美德。小偷的技能也許比鎖匠的还要高明。但是它的主要論点是正确的，这个主要的論点是，銷出超过消費者真正需要的商品和发現消費者新的潜力这种职务，比起生产的职务来，确系困难得多，并且又是一种性質完全不同的职务。因此，它变成了一种单独的部門：自成一行的企业。并且，由于它吸收着一批脫离生产和脫离直接分配的但具有牟利才能的特殊人物，所以它最后就形成了一个中間人阶級；这个阶級起先是为推銷剩余产品而作为制造者方面所不可缺少的人物，不久，由于創立一种为生产者和小店主所不懂的和所不能运用的金融和商业机构，他們就变成所有产品的推銷方面所不可缺少的人了。就这样，中間商人便变为时势的主人翁了。他們不准生产者和小店主們竞爭，从而以旧式的討价还价的方法来規定物价。他們的理由（直等到他們处于指揮地位的时候）是，"那种方式会使我們同归于尽。"他們規定的价格是从自己利潤的观点出发的，只有消費者感到宁可不要这种商品也不愿出更高的价格这一点，才能加以限制，因此，他們在大多数的生活必需品上榨取了最高的收費。不到半个世紀以前，美国經济学者瓦尔克曾宣称：作为企业主的制造商是工业界的最高权威。可是这个企业主却亲眼看到他的主人翁地位，已經移轉到有錢的中間人那里去了；而这个中間人，既不生产什么东西，又不分配什么东西，但却是銷售一切东西的人。

因此就发生了一种似非实是的情况，即：由于推銷方面更大的

困难和費用，一种貨品的生产成本（包括运輸成本）越低，則它对于消費者的价格越高。或者，換一句話来說，竞爭的增加，意味着推銷成本的增加，并且这种增加的成本必須加在取給于消費者的价格上。竞爭越大，則零售价格越高！

独占企业的兴起和个人企业自由的否定

美国、德国和联合王国的最机敏的或最有势力的生产資料組織者，是首先发現自由竞爭的錯誤和牟利职业"讓每个人按照各自的方式去发財"的悲慘結果的人們。当生产的方法变成了"公开的形式"，市場的追求已到了水尽山穷的时候，这种不只是一直磨括穷人，并且在即将磨括到資本家本身的削价竞爭，在时髦的商人的心目中，当然不能当作致富的捷徑。有势力的牟利职业者，虽然彼此不相信任，也不能不認識到联合行动，比起"互相殘杀的竞爭"对他們是更为有利的，因为这种竞爭一直引导他們的每一方面扩大自己的产量，并且还要用无限期的減价，或增加推銷成本等方法以力求銷售出去。我們不必去追究从 1825 年到 1887 年在英美商业界留下印記的周期性的通貨膨脹和"生产过剩"；也不必追究过去半个世紀中"君子协定"、壟断集团、协会、卡特尔、托拉斯、联合公司和合并組織的产生过程；它們已将德国、联合王国及美国的各种工业，整个地轉移到資本主义独占者小集团的控制之下了。在一种商业或工业里，团結所有牟利資本家的利益的必然傾向，可以在美国找到許多最惊人的例子。美国的政府报告和美国小說都反映了他們的許多恶毒行为，首先是美国鉄路大王的，后来是煤油、肉品、銅、鋼鉄和其他无数商品的大托拉斯的。德国經济学者們贊美为条頓民族組織能力登峰造极的表現的、德国卡特尔的兴起，已受

到特别在世界大战时期不断地模仿它們的英国商人所斥責!的确，今天每个国家的工业大王們都毫不迟疑地承認这些反对自由竞爭并为法律所許可的陰謀集团，同时又为它們的活动作辯护。“在食盐联合公司成立以前”，它的一位代表在英国政府所派的托拉斯調查委員会上說，“曾有一个极尖銳的竞爭时期，結果是大多数的制造商只获得很少的利潤，假使确有利潤可說的話。很多实际上破了产①。”“組織协会的原因”，一个重要金属公司的董事长在同一个委員会上說，“是由于这种工业在英国已經多年无利可图了，并且还有被国外的竞爭和国内制造商之間太多的竞爭所淘汰的危險；大家認識到，如果要挽救这种工业的話，只有由制造商們联合在一起，組織一个协会……在国内市場获得了有利可图的价格的保障以后，他們就能够在出口貿易上以成功的竞卖价格战胜国外的竞爭。他們有一笔經費，一笔作战的經費，专門用来津貼那些必須以低于經济价格的代价出售貨品借以擋住外国的竞爭的人們②。”“在过去，商业組織”，被单制造商大会主席向同一个审訊机构作証說，“在許多事件上，都把产量加以限制；他們了解到，如果一种貨品的生产超过了所能銷售的数量，結果一定造成无利可图的价格。所以，我們必須解决的問題是，怎样来生产最大的产量，而同时維持住有利可图的价格；按照我的意見，唯一的办法是采用过去德国施行得很有成效的办法。这些商业組織必須变成推銷的經紀机构。那末，它們便可以在自己中間避免竞爭，在能够获得有利

① “食盐联合有限公司报告”，1918年9月11日。

② “托拉斯調查委員会报告(總務事务部)”，1919，“國会报告文件”，第9236号，第5頁。

可图的价格的市場里，获取利潤，在有别的国家剧烈竞爭的其他市場里，則在尽可能获得最好价格的情形下，也必須进行銷售——必要时亏本出售——这样就可做出最大数量的生意，并且把无利可图的生意的負担，分摊到整个行业的身上。过去，德国亏本地出口了它的鋼鉄产品，結果得到了相当大的好处。将来，这个国家也要照样去做，也会有利可图"。"在現代工业的和商业的世界里"，托拉斯調查委員会的秘書在他的淵博的备忘录里总結說，"竞爭——它的确从来不是完全'自由'的——并且一年又一年地变为更不自由了。在許多貿易的和工业的部門里，認为相互竞爭会把物价維持在竞爭的水平上的营业机构，事实上，都有了这种或那种合約来制止竞爭的活动。再者，在某些貿易部門里，以前敌对的企业，現在都合并起来了，結果是，在某些事件上，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在財政上互相密切联系的企业集团掌握了整个貿易这样大的比例，以致获得了一种有效的独占权①。"的确，現代工业的一切事实决定性地証明，工业企业投資的竞爭式的管理方法和个别占有者事必躬亲的管理方法，都导向着毫无希望的缺乏效率的境地②。

这些連續不断的集中及其所带来的标准貨品的最大規模的生产，以及許多不必要的成本的逐漸免除，是有工业上的优点的，我們不必抹煞它們。不过，很明显，在这些优点之中，全世界損失了資本主义賴以发生的和賴以获得許多偉大胜利的大量的个人主动性、个人的风險和企业的自由。更加严重的是，消費者丧失了制止价格过份越过成本的保障，品种和質量的保証和甚至認为自由竞爭給予他們的充沛貨源的担保。

① "托拉斯調查委員会报告(建設事务部)"，1919，"議会报告文件"，第9236号，第5頁。

② 同上書。每种工业的雇主委員会向貿易部(1916—1918)提出的报告，都証明了各种重要行业生产方法上、机械設备和組織上极度的缺乏效率。調查战后工程业情况的部派的委員会說：这种缺乏效率的現象，"可以从現存的比較小的企业的巨大数量看出来——每个有它的各别的組織，各别的固定收費額，各别的买和卖的办法，并且每个都生产着重复的貨品。其中有些好象对它們所生产的商品品种数目，感到驕傲；同时，愿意以較低的价格向竞爭的对手購买物品的构成部分的，为数很少，即使对方准許它們这样做的話。閉关主义和隔离制度标志着战前工程业的特色。每一个制造商保守着他的秘密，并且，如果他有任何特殊的制造方法，他多少是很自然地希望自己保守起来，而不把它加入到全国共有的制造知識里去。許多厂商从事生产大量日用品的結果是，生产的品种紊乱复杂，以致沒有两个制造商好象有意生产完全相同的物品……結果是运銷全国的各种各样的貨品，不必要地大量貯存着并且以不必要的高昂成本制造着。工人們則經常地从一种貨品的制造方面調到另一种貨品的制造方面，因而浪費了許多时間；而且机器的更換，又使相当巨大数量的机器停止使用，因为当某种特别貨品暫时不生产的时候，专作这种生产用的机器就得停止使用。这是一种浪費的、成本很高的生产方法；它限制了产量，并且因此，減少了利潤和高工資的可能性；同时由于沒有复制的工作，致使計件致酬的制度，也无法大規模地实行。"的确，雇主和雇工两方面的自供和相互的控訴指明：无論如何，在工程工业里，資本主义的脑力劳动者和各級的体力劳动者都坚持着一种"磨洋工方式"——雇主們則控訴英国的机器工人說：他故意地把他的产量限制到"每天合理的工作量以下，并且这种故意的限制，最后对于他的品格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至于这种限制所养成的习慣，使他的体力不可能生产每天合理的工作量"。另一方面，工人們則把这种产量的限制归因于雇主們削減計件致酬的标准的措施，工人失业的顧虑，和劳动生产率較高的工人不能把年老的和經驗較差的工人置于不利的地位这种信仰。(参閱"部派电气业和电力供应調查委員会报告"["Reports by the Departmental Committee on the Electrical Trades and Electrical Power Supply"]及"貿易部关于調查战后英国某些貿易部門商情的顧問委員会小組搜集的証据"["The Evidence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f the Board of Trade on Commercial Intelligence for Securing the Position after the War of certain Brauches of British Trade"]，"議会报告文件"，第8275号。这些資本家的委員会只有一种补救办法提出，就是：英帝国的政治和軍事力量所支持的英国資本家的联合組織。

工业集中的缺点

的确，資本家对于权力的漸进的、虽然是隐蔽的篡夺，已經造成一种独裁的制度了；为了反对这种独裁，不仅有工会分子，也不仅是社会主义者，而是整个的世界都在起来革命。美国的、殖民地的和英国的政治家采用的第一种挽救办法，是建立一种复杂的法律机构，这种机构，或者是将托拉斯和联合公司整个地加以取締，或者是监督它們采用限制产品和提高物价的有害活动。但是，到現在为止，所有管制資本主义独占活动的尝試，都告失敗了。在所有資本主义国家里，壟断集团、議定价格的协会、卡特尔、托拉斯和合并公司，有的是全国性的，有的是国际性的，都从一种工业蔓延到另一种工业，它們积累的資金变得比以往还要大，它們的触須向上向下伸展开来，独占着天然的資源①，包攬着制造的方法，控制着运輸的工具，并且以操縱价格和限制产量的办法越来越牢固地統治全世界的市場。"竞爭是变得越来越脆弱，越来越短促了"，李斯特·瓦尔德教授总結說，"联合的組織是变得越来越有势力，越来越固定了……思想准則上打倒竞爭的合作趋向，只有以一种更高的合

① 托拉斯已經出来控制工业里那可以認为是机器动力的第二大来源了，即水力发电。"一个調查人員新近发表了一些使人信服的証据，論到两大公用組織，史通—韋白斯特公司集团和通用电气公司集团，都正在系統地攫取国內尚未开发的水力資源的控制权 …… 工商活动对于水电日益迅速增长的依賴，将很快使水力的所在地处于具有巨大价格的地位。我們知道，这种財产的获得和保有，可以不花一块錢的資本，而保証有巨大的投机利潤。我們知道，工业动力的来源是这样地有限，以致水力的集中和无限制地的控制在少数私人公司手里，将很快成为可以想象得到的最有势力的独占自然資源的壟断企业的基础"（伊利等："国家兴隆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National Prasperity", by R. T. Ely, etc.〕1918；赫斯："資源的保护和經济的进化"〔Ralph Hess: "Conservation and Economic Zvolution"〕，第159頁）。

作形式来加以克服；这种更高的形式能够控制住較低的形式，并且能够使自然的力量再一次获得自由。"①

对于工业集中的崇拜

現在，毫无疑問，世界大战的結果，已經在英国、美国、法国、尤其是在德国，加速了（比一般認識到的加速程度还要快些）每个工业或每个工业集团里各别資本主义企业的縱的横的合并过程，以便公开地結束国内外市場里的自由竞爭。經济学家对于这一点也不能有所怨言。因为，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斗爭的緊張情形下，行政方面的新发現之一是，在达到最大的生产力方面，无論是質的方面也好，量的方面也好，竞爭的牟利制度都遭到了失敗，并且几乎是駭人听聞的失敗。在每个国家一个又一个的工业里，人們看到，敌对的牟利者之間的竞爭越是有效，生产的过程，总合起来說，越是缺少效率和不經济。因此，許多資本主义政府，对于干涉竞爭的牟利活动，虽然有极端的偏見，政府部門仍不得不强迫資本家們停止彼此間的竞爭，而結合为大規模的組織或协会，以便利用全部力量来以最高效力的方式，将总的供应量提到最高限度。那就是說，当每个国家的統治阶級眞正地关心到产量的时候，"利潤的法庭"，及其无組織的消費者的陪审官們，都被抛在一边了；而与利潤无关系的成本会計专家这个新阶級所組成的"审計的法庭"，却获得了資本主义工业的裁判权了。但在战爭停止的时候，傾向于維持資本主

① "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年刊"，第3卷，第4号，1893年1月；瓦尔德："社会經济的心理基础"（L. F. Ward: "Psychologic Basis of Social Economics"），第89—90頁。

义王朝的政府却又急急忙忙地放弃了它們新发現的控制方式。不过,"审計的法庭"虽經放弃,"利潤的法庭"却并沒有恢复。正如經济学家們不会看不到的,"为共同的目标和照标准的方法而合作的习慣,已經揭开了业务行政上許多节約的窍門;这些窍門,虽然是在金融和商业十分动蕩的时期为了管制物价的显明关系而产生的,却对战前資本主义走向联合組織的趋势,給予了一个很重要的刺激。認为这些大的联合組織,特别是在金属业和机器业、化工业和某些紡織业及陶器业,以及有关建筑、鉄路、船运的联合企业的附属工业,有恢复自由竞爭的可能,实在是白費心机的事。"①

"不得不走的第二条路"

就这样,現代資本主义的牟利者,由于取締了单純的竞爭自由,竟使社会面对着一条不得不走的路了;或者消极地屈服于这种現在已被承認并且接近完成的資本主义的独裁,或者不加拖延地建立一种使社会可以控制它所賴以生活的工业和服务事业的任何社会机构。或者是托拉斯来占有全国,或者是全国来占有托拉斯。并且,这种不得不走的第二条路已經被眼光清楚的保守党人所承認。塞西尔勛爵写道:"認为把一切生产資料放在国家手里,比讓它們由一些私人的联合組織来独占,还要更加危險和更能作恶,那是很难使人信服的。的确,摆在我們面前的切实可行的路是:竞爭(无論如何,在我們本国人中間的竞爭)或国家的控制,并且,为任何私人集团的利益,或者比国家較小的任何組織的利益而限制竞

① 霍布森:"新工业秩序的动因"(J. A. Hobson: "Incentives in the New Industrial Oerder"),1922,第16頁。

爭的任何努力，都将很快地被認为不可忍受的措施。"①

脑力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分离

十八世紀后期和十九世紀初期在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以及在十九世紀中在美国和欧洲工业地区发生的工业革命，已使体力劳动者和生产工具所有权——如我們平常所說的——分离了。等到十九世紀股份企业兴起，企业及公司合并为龐大的壟断集团、托拉斯及联合公司，拥有以千万英鎊甚至以成亿英鎊計算的資金的时候，脑力劳动者与生产工具所有权的分离，更走向了极端，使他們降到支薪給的雇員地位了。英国过去一世紀的四分之三时間，美国过去的半个世紀，德国及法国的过去的三、四十年，都証明了大多数工业組織者和經理者日益加速地脫离了主要物質財富的所有权；这种主要的物質財富包括土地、建筑物、矿产、机器和工厂、以及运輸产品的工具。

这种分离的現象，是作为私有制的結果而逐步出現的。在工业的管理和領导方面，遺产法的运用逐漸地打破了"适者当选"的規律。奢侈家庭的紈褲子弟，繼承了他們父亲經营的业务；这种繼承，至少不是根据他們牟利的才能而挑选的，因为这些业务也逐漸地丧失了那些作为資本家独裁理由的品質标志，如創造能力、发現能力和进取能力。而且，这些业务又不象十八世紀的情形那样，时常遭到失敗。

已經証明越来越切合实际的办法是，采用雇用脑力劳动者的

① 塞西尔勛爵："保守主义"(Lord Hugh Cecil: "Conservatism"), 1912，第104頁。

办法。一代又一代的人們看到，数目日益增加的企业都是由領薪給的管理人員領导的；这些管理人員就是企业中游手好閑的老板們的靠山。金融方面的、更大范圍的运輸方面的以及目前相当巨大規模的矿业、制造业与貿易等方面的股份企业的发展，揭开了一种未曾預料到的事实，就是，領薪給的人員主持的管理工作，在董事会的监督之下，很能够維持大的和各色各样的企业的存在，并能够为股东們賺到合理的股息；同时这些董事們本身，也逐漸脫离了本企业的占优势的所有者地位，而成为事实上只是以做董事为职业的有薪給人員。在有些方面，有薪給人員管理之下的股份企业，例如銀行业，实际上，几乎在所有国家之内，都把个别資本家自营的企业打垮了。在英国，矿区使用权制度的兴起，乡紳統治的沒落，和城市房地产业的大量发展，已經促成了一种收租阶級的形成，以代替从事农业的地主，这种收租人在不动产的管理方面，并不比收股息的人在工业的管理方面，过問得更多；在法国和德国，如同在联合王国和美国一样，这两种人就形成了代表私有財产的"靠利息生活者"的一个阶級。財富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在英国也許达全部財富的一半——現在就按照这样的方式，移轉到稳步增加的絲毫不起作用的股东和收租人的一个阶級手里去了，他們有男的、女的和小孩們，总計可能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二；他們不过問工业，并且多数甚至不知道他們的收入来自什么地方。这些无耻地"靠所有权生活"的人們收入的总数，明显地相当于先进工业社会全部生产的大約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专业阶級的兴起

但是，約翰·穆勒在70多年前称为"社会大害的游惰富人阶

級"的大規模发展，还不是当前情况中最重要的特征。与这个阶級平行发展的是，在所有先进的工业国里，一个更大数目的、有薪給的、各种等級的脑力劳动者阶級；他們沒有牟利的刺激，并且，除在收入許可范圍內为养老及靠他們生活的人們作有限的准备外，也沒有"发大財"的远景；他們大都終身从事于各种工业的和专业的服务。这个阶級的一个极小部分，获有巨額薪金和其他业务报酬，并且可以列入到資本主义工业的董事的行列中，其中有些人实际上也轉入到資本家的队伍里去了。可是，其中絕大多数的人，都是終身为了十分有限的报酬作工头、經理、会計、科学工作者和各种各样的技术人員——甚至作設計师、作家和发明家；同时与他們一起合作的，还有无数的办事員、店員、推銷員以及各种各样职业的助手。与这类人們列在一起的，还有迅速增加的大批的各类公务人員，从公立学校的教师及市政官員直到国营服务事业的最高行政人員。在世界大战之前，已經可以說，联合王国有 100 万以上的人（陆海軍人員不計在內）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直接雇用的，象格拉斯哥或曼彻斯特这样的城市，就有百分之二十的家属是向市政府領薪的。①

現在，这种新的社会底层人物包括每个国家广大的积极的脑力劳动者——誠实的、勤劳的、高度熟練的和成績卓著的人們；这个阶級的成长和遍地都有的服务，已經使資本家的下述論点变成荒誕无稽的了，即認为在工业的領域里，只有通过牟利的刺激和"成家立业"的野心，才能获得社会上有效的服务的謬論。同时，这

① 在德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是一样——在世界大战以前，这个比率，甚至还要大得多；虽然在美国，由于鉄路、电报以及多数的电車、煤气和电力服务事业仍在資本家的手里，这个比率比較小些。

种"有知識的无产阶級"发現，資本主义制度，对于脑力劳动者的广大群众，实际上也沒有值得追求的东西。在許多事件上，他們发現他們自己在金錢方面比体力劳动者还要坏些。他們往往賺得很少；他們的生活有时更加沒有保障；并且他們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更大的个人专制的对象。他們越来越多地在工联主义性质的組織方面寻求挽救办法；并且，和体力劳动者一样，他們正在日益增多地为他們的职业要求对公共服务事业所应有的尊严和保障。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这两个阶級都不要求获得財产来挽救他們的貧困。虽然，已經有人在宣傳所謂"平均分配的国家制度"，假使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个所有者，从而消灭貧困，可是劳动者們，无論体力劳动的或脑力劳动的，在要求以光荣的服务来作为謀生的手段这一点上，实际上都是一致的。这一种誠实的、有效率的和奉命行事的"薪水阶級"的发展，不仅强調出牟利动机活动的范圍不断地縮小，并且，正如我們将要看到的，使工业組織的另一种代替的制度，成为切实可行的措施。

飢餓的鞭笞丧失了

我們現在要談到已經开始的資本主义文明不断衰亡的一个最有力的但在以前人們最不愿承認的因素。在二十世紀政治民主的气氛里，运用飢餓的鞭笞，已經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

現在，我們知道，使資本主义制度获得初步的、差不多是自发的成功的原因，是由于施于体力劳动群众身上的飢餓的鞭笞較多，而由于牟利的动机（这实际上只能在极少数的企业者中間发生效力）較少。这就是为什么，从科学的經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看来，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是工人脫离生产工具所有权这个事实，而不

是那些改变工业生产方法的一系列的技术发現。新資本主义企业主所有的、仓卒地和同时地解雇成百甚至成千工人(他們除此以外本人和家庭就别无謀生之路)的权力,这是一种为中世紀社会甚至在十八世紀初期的英国和美洲殖民地也不曾有过的新的独裁制度①。每种工业循环不已的膨漲和萧条,工业生产方法上接踵而来的革命,和对外貿易的起伏不定,都影响到毫无限制的日益扩大的城市里新近麕集一起的人們,都在一代接着一代的工資劳动者的心目中,留下了难忘的烙印,叫他們認識到一个无产的人,只有服从資产阶級,才能获得他自己的和全家的生活。但是,至少在英格兰和威尔斯,在机器工业开始的半个世紀內,曾經緩和了这种新

① 值得回忆的是,不只是在中世紀时代的英国,并且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初期的英国,大多数的工人都是占有他們的生产工具和劳动所得的。自耕农、家庭手工业者、城市手工业者及他的由学徒出身的职工和学徒,也許会由于歉收、瘟疫或火灾、对外战爭或改变行业或生产方法,而使他自己和家属处于飢餓的边緣。对他来說,这一切对于习慣了的生活的临时干扰,好象是上帝的行动,无論怎样都不会改变他与环繞他生活周圍的社会关系的。只要这个小工业团体的首領占有生产工具和他的劳动所得,并且能够为他的家属和同胞生产食物或其他的商品,則由于不断的失业而产生的、特别是由于經济上的支配者故意使他失业而产生飢餓的恐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再者,自耕农或自己当家作主的手工业师傅,由于运气不佳而受到的任何損失,都可以从生产方法上緩慢的但却不断的改进上——資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特征——获得补償而有余。就这样,我們在十八世紀上半期发現到一批人数固定的强橫工人,他們喝着大量的酒,吃着不少的肉,游蕩街头,在市集里从事賭博和斗殴,有时候还要招募一些以拦路打劫为职业的英雄好汉,有时候还要以职业流浪者的身份走遍全国,并且一般还表現着这样的作风,以致道貌岸然的治安法官为之惊倒,而急忙去組織社会风气改良促进会,同时使城市里蓬勃兴起的、丑名昭彰的、作生意的治安法官們,有遮法收入的无限机会。关于与工业革命同时发生的匱乏和貧困增长情形的詳細叙述,見韦伯夫妇:"英国地方政府:特种的法定权力"(S. and B. Webb: "English Local Government:Statutory Authorities for Special Purposes"),1922,和"教区与郡区"("The Parish and the County"),1907。

的独裁。如果資本家不能或不愿給予健壯的人足够維持生活的工資的工作(这种工資是可以，并且确应該由治安法官規定的)，那末，这个健壯的人就能按照伊丽莎伯女王頒布的"貧穷救济法"，要求教区視察員安排工作，或者从貧穷救济税款中貼补他那微小工資不足維持本人及家属生活的缺数，至于身体不健康的人們，則当然发放全部的生活救济費。我們已在别的地方叙述过，英国一个个教区的視察員怎样地面对着成百、有时成千被資本家拒絕繼續給予工作因而淪于穷困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們的情形，并且也叙述过，地方政权，抱着使穷人为自己的生活而生产的空洞希望，根据各别的法律設立許多劳动救济院，以便"为穷人安排工作"。毫不奇怪，由于資本主义的扩張，在某种程度上抵銷飢餓鞭笞的貧穷救济費的总开支，也增加得很快。在十八世紀的初期，全英格兰和威尔斯征收的貧穷救济税仅勉强达到 100 万英鎊。在此后一世紀的 75 年之內，它便慢慢地增加到了 170 多万英鎊。在 1776 年和 1785 年之間，它突然地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在十九世紀初期，它便增加到 400 万英鎊以上，到了 1813 年又增加到将近 700 万英鎊，1818 年复增到了将近 800 万英鎊。1815 年的和平，好象 1918 年的和平一样，带来的社会情况，比 20 年的战爭所带来的还要更坏。从 1816 年初起，英国就遭到了史无前例的貿易停滯。"穷人"，布兰特于 1816 年 3 月 28 日在下議院里說，"在很多的事例里，放弃了他們自己的住所。整个的教区荒凉起来了；并且从一个教区流浪到另一个教区的日益增加的成群穷人，又将这种荒凉慘状傳播得越来越广"①。

① "聯辑議会实录"，第 33 卷，第 671 頁；瓦勒士："佛郎西斯·卜雷斯生平，1771—1854"(Wallas: "Life of Francis Place", 1771—1854)，1898，第 114 頁。

"惩罰性的貧穷救济法"的插話

到了1832年，每个开明的人都完全明白伊丽莎伯女王頒布的貧穷救济法与資本主义制度的工业是絕对不相容的东西。只要用教区的資金来"安排工作"的这条路是为健壯的男人和女人开着的，只要教区劳动救济院一視同仁的游惰生活——即使不是"厂外救济"的自由生活——这条路是为不健壯的人們开着，并且，只要以公家費用从一个郡轉到和再轉到另一个郡借以寻覓他們合法居留地的教区的机会，是为那些有冒險家精神的人們开着，那末，怎样能够使男的、女的、小孩們的广大群众，为了往往不足維持生活的工資，并且在很悲慘的和不卫生的情况下，在24小时內，辛苦地和紧張地工作到12、14、16小时呢？我們不必去重述人們常說的、被教区官員們的漫不經心所減輕了的資本主义統治下英国大批人民貧穷化的故事，也不必去重述托利党治安法官們的仁慈的和引向錯誤方向的努力即企图用津貼的方法来获取都鐸和斯图亚特王朝立法所要求的和施行的全国最低生活标准。逃出这种进退維谷情况的办法是一定要找到的。因此，1833年改革后的議会第一件偉大的立法成就是，随着資本主义制造商以及跟随他們的大小商人和店主組成的新中产阶級的获得选举权，通过了1834年著名的"貧穷救济法修改案"，显明地把受救济的貧民的生活条件規定得比最低級的苦役工人还"更差"。每个失业的健壯男人，不管他失业的原因是什么，只有两条可以选擇的道路：或者在資本主义牟利者所給的任何工資和任何条件之下工作，或者在一种蓄意为难的惩罰紀律之下，过他不够温飽的牢獄生活。英国的工資劳动者对于这种不經过申訴就被断然地置于資本主义独裁下的办法，

已在宪章运动中表示了他們哀苦无援的忿怒；同时，工会組織又本着双重的目标加速地建立起来，这双重的目标是：关于雇用的条件，以联合的力量来对付資本主义；关于防止成員們失业，以联合的力量来加以保障。

但是，另一种力量也在发揮作用。工資劳动者，通过他們的工会和政治組織，为了爭取政治选举权而采取的、緩慢的但是不懈的压力，导向了一个結果，即 1867 年到 1918 年間在联合王国和在其他国家里，施行了成年男子以及后来包括妇女的成年人的选举权，对于这种运动的政治后果，我們只是慢慢地才察覚得到。

"惩罰性的貧穷救济法"的廢除

明显的事实是，正如資本主义的选举权不能和伊丽莎伯頒布的貧穷救济法相容一样，民主主义的选举权也与代替这种貧穷救济法的"惩罰性的貧穷救济法"不能相容。一直到二十世紀时候，"开明的輿論"，无論是主教的或教授的、商人的或公务人員、热心訪問各地方的人士或办理貧穷救济事务的能干行政人員的意見，都拥护着"劳动救济院的測驗办法"和"使救济条件更差"的原則，以便劝誘人們接受資本家的雇用，放弃貧穷救济法上規定的救济。一次又一次地証明，如果給了失业者以合理适当标准的救济，无論是救济性的工作或是失业救济金，将使其中的許多人拒絕接受在雇主們所提的条件下工作，并且，許多人将在长期只靠救济不事劳动之后，丧失受雇劳动的能力。一次又一次地証明，任何用"厂外救济"或者甚至用暫时在劳动救济院寄居的办法来补貼收入最差工人的苦役工資，都会扩大苦役的范圍，而使这种补貼变成了立刻按照补貼数目将工資再行削减的那些最殘酷的雇主們的补貼了。

但是，想把資本主义制度与伊丽莎伯时代"工作或救济"权利的观念結合起来的任何尝試，尽管已經不断地証明一定要带来灾难，可是，每一个上台执政的政府，无論是自由党的或保守党的都好，都发現它不得不抛弃"使救济条件更差"的原則。

为了制止貧穷救济法及其实施上的这种腐敗現象，于是成立了一个1905年到1909年的很大的"貧穷救济法委員会"；它是根据一个确具信心的假定而成立的，这个假定是：除了建議恢复1834年的原則，委員会别无良策。但是，在这里，政治民主主义的无形力量又发生作用了；不只是委員会少数委員的报告，并且該会多数委員的报告(有地方事务部和慈善組織联合会的代表签名)都明文地否認了"使救济条件更差"的原則，并且斥責了劳动救济院的測驗办法。但是，两种报告在否認"使救济条件更差"的原則的同时，又加上了一种适当的測驗的規定，借以測驗失业的人們在能为他們找得工作的时候有无接受雇用的意愿，并且能否这样地工作下去，使他們的繼續服务成为必要。这里不是討論或批評这些建議的地方。这里所要說明的是，公共輿論，通过工党以及同样地通过自由党和保守党表达出来的輿論，干脆地拒絕提供資本主义杠杆不可缺少的支点，即否認接受資本主义的雇佣是带有强迫性質的。所有关于請求救济而根据法律又不能加以拒絕的穷人的登記、測驗和必要时的訓練等建議，都被否認。貧穷救济委員們要求那些靠救济金过怨天尤人日子的健壯穷人离开劳动救济院，自謀生路；可是結果还是失敗；他們在离开之后，并且在賺了一些足够暴飲暴食的錢之后，又以穷人的面貌来到劳动救济院的門前重行进去居住了。納稅人大叫起来了，雇主們大叫起来了，甚至社会主义者(带着广泛的道义上的号召力)也大叫起来了，他們反对支

持那些对自己消费品的生产不負責任的人；但是，工人群众知道，資本主义已經使他們的背脊頂到墻壁了，假使这道墻壁被摧毀掉，那末，后面除了无底的深淵之外，再沒有什么东西了，所以无法讓步。在1905年到1914年中，不經測驗的失业的健壯工人的救济机构便大大地增加起来了。在1920年，作为一种制度来說，曾在世界大战时期一度被半国有化工业所代替的資本主义工业（否則战爭就不可能进行下去），已經无法維持生产机构繼續生产，并且完成了摧毀战时曾拯救英国的半国有化生产形式的工作。結果是，几百万英国工資劳动者的生路，絲毫也不是由于他們自己的过失，就被断絕了。可是，他們并沒有餓死；并且他們也沒有到劳动救济院里去。在1921年到1923年間，英国政府，虽然有減縮政費的各种愿望和公开表示强制削減工資的意图，仍不得不为每个失业工人作救济的措施；这种救济措施是：或者采取过去任何时期都認为是浪費的巨大規模的"厂外救济"办法，或者发放标准实际上高于有些郡里雇主发給农业工人的工資、直接从国庫支付的每周救济金。在好几年中，这样分配給合計約2百万戶的救济金，每年在1亿英鎊左右。这就完全証明了資本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不相容。在这里，不能不看到，否則就会受到資本主义的飢餓笞鞭的，占全国五分之一的人口得到挽救了。

不可避免的結論是，假使政治的民主主义能够持久下去的話，今后就一定要采取以公众的費用来施行"工作或救济"的政策。并且，我們可以預言，中央或地方政府給予所有自称为失业的人們的工作或救济，将必然地要摆脫惩罰和穷困主义的烙印。就是从1834年到1900年貧穷救济法的专家們所認为办理公共救济的主要方式的穷困測驗办法，也被毀弃了。因为資本主义制度未能按

照适当的工資給那些人們工作，并不是由于那些人們自己的过失，所以大多数的选民对于阻碍救济那些失业工人的这些办法，都表示强烈的反对。只要这个社会彰明昭著地容忍一群少数人"超然处在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自然規律和道德規律之上：那就是說，只要准許这一种游惰富人所組成的确实寄生的阶級保留它的"突出的浪費"的习慣，那末，工資劳动者阶級的代表們就有理由（他們的主張并且会在选举柜前获得支持）反对将这种自然規律应用到那些最无辜的不劳动的人們身上去，就是那些由于資本家沒有完成所担任的任务而被迫停止工作的人們身上。

或許有人說，并且很能令人信服地說：民主主义可以愛說什么就說什么，可以愛怎样投票就怎样投票，不过，在任何制度之下，如果一个很大部分的人口，都能为他們自己和家属的生活获得救济，而不需要一定接受当时当地实际能够获得的工作和工資，那末，这个国家一定要走向破产的路上去；并且，如果反对資本主义制度的一个理由是它使成千成万的人口过着游惰的生活，那末，一种使成百万的人口过着游惰生活的制度，在这方面，便是这种罪恶难以忍受的扩大。这是实在的：并且就是由于这种考虑，才使 1834 年的貧穷救济法，尽管民众很憎恶它，仍然获得实施；那时的民憲，虽然选举权当初还沒有扩大，还可能摧毀这个法律，假使宪章派能够提出当时切实可行的代替办法的話。今天，这种代替的办法已經是大家很熟悉的了，甚至在世界大战充分証明以公共的工业組織和管理来代替資本主义的工业組織和管理的可能性和甚至必要性之前，就已經是这样了。就是那些蔑視大战的經驗，而認为这种代替只是一种梦想的人，也不能否認人民确实是在梦想着它的这个事实，并且也不会再有拆資本主义的台就是拆人类社会的台这种顧

虑。

除此以外，資本家虽把强迫劳动的获得当作生死攸关的事情，但是对于用法律来强制劳动的任何办法，却不得不加以反对。因为他的整个目的是要使他自己、他的家属和后代，过着一种文雅的游惰生活，免除他們自己的劳动。当他被引到一个論点，突然被問到是否贊成在法律上强制劳动的时候，他是不能答复"是"的，因为他的工人馬上就会来問第二个問題，"你的儿子們是不是和我們的儿子們一样，也要强制劳动呢？"假使用取消供应生活必需品或其他任何方法① 来使劳动变为强制的，并且这种强制必須对所有游惰的健壯的人們，不分出身或教育的区别，一律适用，那么，这是一着致敌死命的棋子；因为在政治的民主主义之下，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执行法律的主要条件。

就拿倫敦交通車輛对于警察統治的特别服从，作为說明这一点的例子罢。一个在交通最繁忙的时間站在皮卡得利广場的观察者，看不到任何一个事例，表明着交通警察的权力，被人忽視、逃避或者甚至埋怨过。但是，假使对于所有有官衔爵位的人，所有繳附加所得稅的人，或者所有有汽車的人，法律給予蔑視交通規則并依照他选擇的速度向左或向右駛行的特别权利的話，那末，試想一

① 不必提醒讀者，在以前經济蕭条时期，"惩罰式的貧穷救济法"还在实行；曾經涌現出广大的流浪群众，这些人以拘禁监牢的惩罰，不是以取消供应的方法来处置的。"劳动保險法"对失业者的普遍救济和"广外救济"的从寬执行的显明优良效果之一，是流浪穷人的相当減少：失业的人宁愿放弃失业救济而去做"拦路强盜"的，是很少的。現在还沒有象这样普遍認識到，取消这种救济的任何措施，会意味着流浪情况的立刻复发，使处理和惩罰任何因"生活无着"而流浪的人的要求，再度发生。但这又要遇到一种相反的宣傳，就是处理和惩罰所有"生活无方"的人的問題，即，沒有采取生产商品或服务以供他人消費的公認謀生方法的人的問題。

想，情形将会怎样。至少在二十世紀的英国，每个其他的人将会立刻为他自己要求同样的权利；而任何規章将行不通。在1914年到1918年的世界大战期中，最惊人的一件事是，全国接受各种必要的紀律措施，已經接近了普遍化的程度。但是，試想一想，假使这些有产的"紳士們和仕女們"在这种法律上获得了豁免，那末，要在占人口五分之四的工資劳动者身上执行兵役或食物配給的法律，会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就这样，資本主义便发現它本身处在进退維谷的境地了。民主主义已經夺去它手中的鞭子；使人們为它工作的唯一可用的另一种强制工具，就要加在它自己的身上，从而取消这"食利息者"整个阶級的特权和它的存在的唯一根据，即生活在"不劳动不得食"这个首要的自然規律和道德規律之上的特权和唯一根据。

从社会方面来說，資本主义唯一的凭借也是相当危險的。当失业者被抛在一边挨餓，或面临着1834年貧穷救济法有意地給予他們的慘痛和侮辱的时候，叛乱的危險一定是这样地明显，以致不得不在商业特别蕭条的时候，象美国南北战爭所造成的棉花恐慌那样情况下，以巨額的公众捐款或救济基金来阻止这种危險。过去在商业蕭条的时候，这种叛乱的危險并沒有阻止停业和大批解雇等措施，因为这些措施都是資本主义商业的主要特点；不过它可以叫雇主們在沒有商业上絕对的必要而造成这种緊張局势之前，仔細地加以考虑。今天，由于有了几乎普遍施行的办法，使每个失业工人每周都有一笔收入，所以雇主們能够随其所好，作各种投机性的变动，而不致冒工厂被飢餓的暴徒包圍和住宅被他們放火的风險。甚至这种完全被人唾弃的"补貼制度"，即补貼在职工人收入不足部分使其达到足以維持生活水平的制度，也于1922年开始

在英国恢复了；它的方式是：或者是每周輪流一星期做工領工資，又一星期休工領失业救济金，或者，在連續受雇的农业工人和苦役女工方面，每周发放貧穷救济金。

現在，这种古老的眞理——經常被事实的驗証所加强了的——即，只有分配而无等量生产的制度意味着通过消耗而造成的毀灭的道理，还有再一次重复的必要嗎？沒有工作的純粹救济的緩慢而不断的扩展，这是一种有害的貧血症；也許可以証明，它是比用流血的革命来摧毀資本和資本家更为致命的病症。这样的情况是不能持久的，即一方面把生产交給了資本主义，另一方面却使工人对于国民收入有坚持他們的要求的政治权力，而資本主义又不能并且也不愿提供这种国民收入。这种情况是，在前面的人喊"开步走"，在后面的人喊"向后轉"的形势。

政治的民主主义与地主的貴族政治或商业的专制統治之不能相容，早已被一个十足的乡紳阿利佛·克倫威尔所預見到了；对他来說，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是，1894年的自由党政府还由它中間最富有的成員捐出錢来为他建立了一个銅象。我們只需想想1647年在雷定举行的軍事会議的生动辯論，就可以看出，克倫威尔和艾黎頓曾花了一天又一天的时間，企图說服他們的軍官和士兵，"它是最彻底的和最基本的东西，假使你把它取消了，那末，就沒有一个人有任何的土地，任何的貨物，（或者）任何的公民利益；它是这样的：那些推选代表以便制定管理这个国家和王国事务的法律的人們，作为一个集体来說，都是了解这个王国的地方利益的人們；就是說，他們也是一切土地的所有人，并且那些在公司里的，都是一切貿易的所有人……假使我們把政治組織的这个基本部分取消，我們将很清楚地要去取消每个人所有的土地和利益，承襲的土

地也好，占有的产业也好或任何其他的东西。”① 当时急进分子的辯护人倫鮑罗上校的主張是沒有用处的，他說，“在上帝的法律里我找不出什么認为一个貴族可以推选20个議員，一个紳士則只能推选2个或者1个議員，而穷人則1个也不能推选的規定。这种东西，我在自然法里找不出，在国际法里也找不出。但是我确实发現了，所有的英国人必須服从英国的法律，并且我确实相信，象每个人所說的，一切法律的基础是在人民之中……所以我确实〔認为〕并且現在仍是認为：每一个在英国出生的人，不能，也不应該，不根据上帝的法律或自然法，剝夺推选那些制定有关他生死存亡的法律的代表的权利。”② 克倫威尔和艾黎頓一次又一次地申說，假使“一个人同另一个人有同等的推选管理他的人的权利，那末，根据同样的自然法，他对他所看見的任何貨物——肉类、飲料、衣服等也有同等的权利，都可以拿来作他維持生活之用……假使主人和仆人都是平等的选民，那末，很明显，那些对王国沒有兴趣的人，一定会把推选沒有这种兴趣的人这件事情，当作他的兴趣。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多数的人可以不必造成混乱用法律来毀掉財产；也可以施行一种法律来規定大家对所有的貨物和財产具有平等的权利”③（着重点是我們加的——作者）。最后倫鮑罗上校以諷刺的

① 費思：“克拉克文件：威廉·克拉克文件选集”（“The Clark Papers: Selections from the Papers of William Clarke”, Edited by C. H. Firth）克姆登学会（Camden Society），1891，第1卷，第302—303頁。并見顧池：“十七世紀英国民主思想”（G. P. Gooch: “English Democratic Idea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第202—226頁。

② 同上书，第1卷，第304—305頁。

③ 同上書，第1卷，第307頁。

口吻反駁說:"先生,我了解了,除了沒收一切財产外,是不可能有自由的。假使規章是这样訂立的,假使你是这样說的,那末,一定就是这样。"①

反对資本主义的經济理由

現在,我們在談到我們的控訴的最后一点——牟利方式对于国际間和阶級間战爭的关系——之前,可以总結一下反对牟利的資本主义繼續作为占有和指导生产工具唯一的甚至主要的方法的严格的經济方面的理由。

在这本書开始的三章里,我們叙述了資本家独裁制度对于人民群众产生的不良結果。虽然,由于在追求利潤的有力刺激下运用自然科学的結果,商品和服务的总产量,有了巨大的增加,但資本主义却在每个地方为工資劳动者带来了持久的恐慌和經常的穷困,以及普遍的貧苦深淵。并且,新的富有阶級的兴起和成长这件事情本身,虽然沒有加剧人民群众的恐慌和穷困,或加大周圍的貧苦深淵的范圍,可是貧富的对照,却添增了进一步的痛苦,同时暴发戶的寄生游惰生活的鼓励,智力的退化,和作风的腐化,都变成了社会的罪恶,并在貧民窟的穷人中間,孳生了奴顏婢膝的作风,嫉妒的心情以及高尚理想的堕落。除此之外,資本主义固有的个人財富的不平等,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还有它本身的罪恶。在劳工分工已由原始农家的家庭分工发展到一般工业組織的分工的一切社会里,大多数的工人必然要以全副精力来完成技术操作,即把原料变成产品,或在有組織的服务系統中从事局部的服务工作。因

① "克拉克文件",第1卷,第304—305、315頁。

此，他們必須服从少数人的命令，而这些少数的职务是購置原料，銷售产品和組織服务事业。这种自然的必要性，就把一种权力放在这些少数人手里去了；而这些少数人，除非象在公务部門一样，有了为公共的利益而建立的控制，就能够变成并且确实变成了一种暴虐的統治者；政治方面最坏的暴君統治跟这种統治比較起来，也显得小巫見大巫。当这种权力被一些不負責任的生产資料私有者或其代理人所掌握时，則有效的自由——"不断发揮主动性的机会"——就会少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等于人民群众实际上的屈服。这种服从关系是戴着隶属关系的假面具的，但是在純粹社会性的发号施令的場合上，指揮者发号施令的自由，并不比他的属員們工作的自由为大。資本主义的占有者和指揮者完全不隶属于任何人，他的雇員則是絕望地处于从属地位；就这样，这种必須的和有益的隶属关系，就变成一种作恶的和压迫的服从关系了。資本主义給予資产阶級騎在人民头上的新权力大到怎样的程度，可以从例如断然停閉工厂或矿井，作为用飢餓来迫使全区工人就范的手段这点看得出来，或从这个阶級，通过它所豢养的全国工业的領导人員的决定，对于成百万同胞終身居住的环境所作的那种不負責任的决定看得出来，这就是：对于美丽的乡村的蹂躪，对于溪流和空气的沾污，对于城市中心貧民窟里疾病和夭亡条件的創造——凡此种种，在每个地方都是在私人利潤的追求中，由采矿业、冶金业和制造业的資本主义企业所带来的。至于在社会方面所得的結果，也并不比这种結果好一些——甚至还要更坏——，原因是，在英国和法国，在美国和澳大利亚，資产阶級早已知道怎样去避开它为工資奴隶所造成的这种恶劣环境，虽然，說句公道話，它并沒有完全意識到它所做的是什么一回事。还有一种現象，并沒有被一个

世紀以前为生产工具所有者的放任的企业作辯护的經济学家們或道学先生們所料到，也許是直到我們这一代的資本家們自己也很少有意識地去探討，这就是二十世紀民主主义所带来的一个典型現象：凡支配权集中在比較少数人手里的私有財产，都能通过它对于报紙的統治，在很大的程度上，控制着全体人民的思想环境；并且，通过这个或那个各种各样的方法，甚至用它的力量取消普选的权利，和为私人利益的目的危險地影响着每个工业先进社会的政府行政以及立法措施。

"利潤法庭"的荒謬判断

在这一章里，我們提供了关于資本主义本身的某些发展情况，而这种情况，在我們看来，好象从开端的时候起，就击溃了支持資本主义独裁制度的經济方面的理由。全世界的經驗，无論是在工业先进的国家或是在新近发展資本主义企业的国家的經驗，都揭示出，牟利的巨大刺激是不擇手段的。假使資本家認为致富的捷徑是，任意地消費这社会里无法补償的矿产資源，极端浪費地利用它的森林和耗尽它的农田肥力——尽管对于社会的永久經济利益也許是具有毀灭性的——那就沒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或者劝阻这种生产工具私有制所孕育的独裁制度这样地使用。在"利潤的法庭"里(就是查理·布思很滿意地認为一切資本主义企业必然要受到它的考驗的)，仅为一代人的利益而广泛地剝光全世界的森林；浪費它可能获得的煤、石油和煤气資源；耗尽它的处女土壤，以致，正如我們現在所看見的，美国和英国已經同野蛮的地区一样，成了不为将来打算的国家：这一切都被認为是"好的生意經"，并且被贊揚着，甚至从一个保險統計专家的观点来看，也是这样。在同样的

情形之下，狡猾地降低商品质量，只要还能够誘騙消費者照旧購买的話，則比起供应較好质量的物品，也許（并且往往証明，也确是如此）可以产生較高的利潤率，而且在他們整个連續的营业时期中，也往往产生个别牟利者較大的总收入。甚至資本主义企业最乐观的拥护者，也不能証明"利潤法庭"的判断是与商品的任何鉴定人的判断——即关于質料好坏、美观、适用性、耐久性以及从整个方面来看对于購买者是否便宜等的判断——完全吻合的。但是，更加严重的是另一种发現，而这种发現又是整个一代的經济学者們和道学先生們可惊地熟視无睹的，这就是，当資本主义把它的企业帶到"利潤法庭"請求裁判时，那个法庭居然可以对牟利企业完全脫离了公共服务这个証据，不加注意。在刑法所規定的广大范圍內，所有的营业都是同样合法的，所有能銷售的商品和服务都是同样許可的。毀掉商品——无論是魚或是丰收的棉花——以便保持价格的这种办法，与滲劣或冒假借以降低价格的办法，同样地是"生产"的企业。私运鴉片到中国或私运威士忌酒到美国，和在一个外国工厂里制造古柯硷或在另一个国家里开設賭場——两者在資本家所居住的那个国家里都是犯刑事罪的——都和种麦一样地是正当的財源。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整个的工业組織，可以被一种事实弄得畸形化；这种事实是，更大的利潤可以从金融的运用甚至商品的銷售得来，而不是它的生产得来；这种牟利的方法已經运用到这样的地步，以致造成了一种完全不相称的、专作商品交易的中間人的社会机构，使生产者和分配者双方都繳納不必要的和过量的貢賦。在"利潤的法庭"里，不触犯刑章而确能获得的任何利潤，就被認为是决定性的証明，說明它有社会服务的同等价值。

放任主义的基本錯誤

"利潤的法庭"为什么在所有这些事例里，作出全世界現在認为錯誤的判断呢？这就是因为，使資本主义依賴十九世紀道德感的基本假定，現在看来已經是沒有根据了。全世界的人再也不会相信：假使每一个人，資本家也好，工資劳动者也好，毫无例外地、严格地追求他自己的金錢利益——并且甚至以学問和智慧来追求它——这就必然地符合着整个社会最大的总的金錢利益。我們現在知道，个人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往往是冲突的，甚至在金錢利益的范圍內也是这样：个人可能用不事服务的各种操縱方法来获取利潤；整个阶級可能要单靠貢賦生存，无論这种貢賦是商业独占的果实，或是比較好听的租金、特許費和股息；最后，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整整一个世代的人，可能在資本主义倫理观念的贊同下，为了它自己的利益，浪費所有后代人的实际物資。亚当·斯密所梦想的、一直引导着資本家的独裁（甚至連資本家自己也沒有覺察得到），使其增进社会經济福利的"无形的手"，是不存在的。

我們要避免言过其实的任何表現。虽然，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利潤的存在，不是作了社会服务的証明，可是，說明在什么限度之內，"利潤法庭"的判断，可能为商业企业提供一种測驗，这是有启发意义的。例如，在一个牟利者与另一个牟利者之間，这个法庭的判断可能有些正确性。它可能在人的劳动上及領导的能力上，和在从商业的最大利潤着眼的材料买卖上，測驗出相对的效率来。但是，它沒有，并且从它的本質来說也不能，在敌对的企业之間，断定某一个是为了利潤的目的，而另一个是为了其他的目的。

成本的比較

在那种法庭里，利潤以百万英鎊計的专卖葯品的制造商与毫无利潤的公立医院，是不能比較的。在抱着不同目的的企业之間，它永远不能作为一个有效率的法院。要达到这种目标，需要的不是对利潤的一种灵巧的而又公正的估計——在这样的估計里，一方（比方說一个私营的电灯公司）的目的是尽量将它扩大，另一方（比方說一个市营电力公司）的目的是尽量把它縮小，否則就会以瀆职定罪——而是那种客观的衡量和公开的事实，即科学的方法。在这里，我們看到，資本主义进一步的发展所导向的一种分离，即：不只是体力劳动者，而且脑力劳动者的广大群众，包括工业先进社会里兴起的具有独立性的专家，从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到分析的人員和測量人員、会計人員和稽核人員的各个整个阶級，都与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分离，这种分离正在創立着可供选擇的一种"上訴法庭"。在世界大战的期間，成本会計专家决定了，不是哪种方法可以获得最大的利潤，而是哪种方法可以用最低的成本生产貨品。并且在这里，我們看到以比較成本和比較生产的測驗方法来代替比較牟利的測驗方法是怎样地使我們在工业的知識上和工业的組織上，向前跨进了一大步。这就使我們了解到，为什么在今日的英国，特地把促进科学这个任务列入党的政綱的，不是拥护資本主义的自由党或保守党，而是抱着社会主义目标的工党。

权力的問題

因为如果沒有把科学的方法应用到社会組織方面，則民主政治的一个决定性問題，权力的問題——我們怎样才能避免一个人

的意志专横地施加在别人头上的这个問題——就不能得到解决。对于工資劳动者来說，到現在为止，社会組織方面的重要問題好象一直是：誰应当发号施令和誰应当服从这种号令——工业的管理，究竟是应当从上而下，还是从下而上。經驗証明，这两种行使权力的方式都有它們的特殊缺点。在社会主义化不断增强的年代里，这种爭論大体上来說是毫无意义的。現在看起来好象是很奇怪的，但我們仍敢說一句預言，从个人权力的立場来說，行政命令权如何准确地分配的問題，将来是不会象現在那样重要的。今天，在工业方面也好，在政府行政方面也好，衡量和公开事实两种方法的結合，无形之中已經在削弱个人的独裁。我們認为，有意地加强这种公开知識的探照灯，是民主政治成功的基石。最后的决定权仍是必要的 不只是在紧急时期有它的必要，并且在政策方面也需要它；因此，根据問題的性質，把作决定的重大責任付托給适当的人选，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情。怎样才能把整整一个世紀以来侵占到資本主义領地的那些民主制度，无論是中央政府的或是地方政府的、消費合作社的或职业組織的制度，为着这个目的，进一步发展和配合起来，以便运用工业中最終的权力，我們在另一本書里，已經作了叙述①。这里所要指出的是，由于科学的发展，在政府部門和資本主义工业里一度認为是不可少的旧的独裁統治，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效率方面来說現在已經是不必要的了，并且将随着民主主义之日益認眞地被人們接受而逐漸淘汰。

使工业車輪不断运行的一連串决定或命令，将不再是执行一

① 韦伯夫妇："大不列顛社会主义共和国宪章"(S. and B. Webb: "A Constitution for the Socialist Common wealth of Great Britain") 1920。

个人加在其他人們行动上的专断意志。独立的专业人員，无論是成本稽核員或效率工程师，医务人員或教育顧問，将根据他的知識提出报告；但是他不发出任何的命令，也不行使任何的权力。他的报告做完后，他的职务就尽到了。在发現和衡量的过程中，和在不顧行政当局的自尊自大及任何等級的雇員的反抗本能的威胁下大无畏地据实提供报告当中，他将无限制地表現他的人格和行使他的自由。那些"当权"的人們，无論是董事、經理或工头，工会行政人員或厂店領导人員，将根据这些专門的报告发出指示。他們将在公布的知識的探照灯下，行使他們的权力；这种探照灯将鼓励他們——假使不是强迫他們的話——感覚到他們的責任不只是局部的責任，而且是对于整个社会的責任。除了对于紧急的事件之外，所有有关各級和各部門彼此間的协商范圍，将稳步地加以扩大，許多判断和决定，将大部分以共同同意的形式从那里涌現出来。这种共同的同意，是根据正确核实的和有权威的报告所报导的，并且是由有关公共輿論靜悄悄的解釋所闡明的事实的力量而获得的。在任何眞正的民主政治里，作最后决定的是公共輿論；公共輿論培养得越有效，科学的发現越受到重視，則任何行政所获得成功就越大。我們可以預見到，数以千計互相竞爭的工业企业对其經营方面的严格保密，和目前标志着邮政局和国营造船厂的那种官僚主义的守秘密作风，将由每个国营工业和服务事业的一种新作风所代替；这种新作风，将不再关心扩大某些特定的資本家集团的私人利益，或者增加国庫的純收入，而只是在一系列的探照灯光芒照耀之下——这些探照灯的光芒，从各种不同角度集中在同一个問題上，就是，怎样为整个社会获取对于所作的努力和牺牲来說最大可能的效率——致力于增加为公众服务的效率。引一句我們在"大

不列顛社会主义共和国宪章”一書里的結束語来說:“我們所想見的,是組織这样不同作用和具有这样重大差别的一个社会,以致不仅是由于个人自由感而使它生气勃勃,并且依靠試驗、观察和証明的新鮮空气經常使它煥然一新。我們要去掉現在毒害我們的制度的私人利益的‘悶热’;并且欢迎一个‘有衡量的和事实公开的’統治的来临。”①

① 韦伯夫妇:“大不列顛社会主义共和国宪章”,第355—356頁。

第六章

資本主义制度是战爭的一个原因

在上面关于資本主义企业現在日益发展的可怕的肿瘍和不知不覚之間加剧的病症的分析中——这些肿瘍和病症使我們得出一种推論，認为牟利的資本主义，虽然有过初期的一切优点，可是現在总結起来，已經对社会不能有所裨益——我們在这里仅仅講到它对于物质財富总生产的影响。对于資本主义的工业組織以及它所依賴的牟利动机，还有一个甚至更严重的控訴，值得加以考虑，这就是：这个制度，在現今的时代，已經日益加甚地变成了国际間灾难性战爭的原因。的确，假使我們把我們的观察范圍限制在只是那些最先进的工业社会里，那末，可以不算过份地說，在过去的半个世紀里，資本主义企业家敌对集团間追求金錢利潤的斗爭，可以認为是近来国际糾紛中（特别是包括 1914 年到 1918 年达到高峰的灾难）最有力的原因，虽然通常只是一种基本的和部分地隐蔽的原因。这些国与国的战爭和——正如我們将要叙述的——明显地由資本主义刺激起来的同样有害的阶級与阶級的斗爭之所以成为引起最大恐怖的事情的是：假使不立即把这种牟利的斗爭为着公共的利益而控制起来，并且本着牟利以外的其他动机，逐漸地以一些較好的工业組織来代替牟利的資本主义組織，則文明本身，

是否注定要被資本主义的統治所毀灭，实在未可逆料。

国际間的战爭

首先讓我們来研究一下高度发展的帝国主义制度，及其日益扩大的貿易业与金融业和生产集中在控制巨大产量的少数独占集团手里的現象，和各大国間以掠夺为目的的帝国主义在过去几十年的成长，帝国主义的这种成长最后掀起了 1914 年到 1918 年的世界大战。

英国的制造商和銷售商，只要还保持着对世界各地原料和市場的"天然独占权"，他們对于英帝国的成长是漠不关心的，并且甚至認为英国人民的殖民地区几乎等于徒耗英国納稅人金錢的无用贅物。可是，到了他們自己內部的竞爭日益加剧的时候，和到了美国的及德意志帝国的制造商和銷售商——正在"旭日东升"的日本姑且不提——侵入世界市場的时候，英国的牟利者的政治信仰和經济信条就有了逐漸的改变，借以适应新的情况。为了保証作为这些世界性托拉斯和联合組合的特征的大量产品的有利銷售，他們不只是需要控制原料的供应来源，并且还需要在国外市場上的支配地位，使他們不致受到敌意的保护关稅政策的約束，同时能够以自己的保护关稅来阻止在别的国家里不属于自己联合組織之內的生产者可能的竞爭。因此，十九世紀后期的英国資本家，便由深信不疑的自由貿易主义者，"小英格兰人"（指反对对外扩張的人——譯者注）和反軍国主义者，一变而日益不信任他們旧有的信条，并且对于保护关稅及用强大的海軍和費用浩大的远征軍向世界各个角落里推广"英国統治下的和平"这些政策，越来越同情。当英国棉織品掌握国內外市場的时期，十九世紀中叶的棉織品制造

商約翰·布莱蒂，是一个拥护世界和平主义的主角。他的在激进派領导方面的偉大繼承人，約瑟夫·張伯倫，剛在联合王国获得了螺絲釘制造的实际独占权之后，也在这个世紀的末期确信一种說法，認为"这个帝国……就是商业……它是商业所創造的，是建立在商业上面的，并且，沒有商业，就一天也不能够存在……由于这些理由，和其他的理由，我永远不愿意失掉我們現在对于我們的偉大的印度属国的掌握——这是我們現在和将来的一切买主当中最大的和最有价值的主顧。基于同样的理由，我同意繼續占領埃及；并且根据同样的理由，我曾敦促过現在的政府和前几屆政府，必須利用每个正当的机会，在現在正在进行文明的和商业的开发的非洲大陆，扩張我們的势力和控制；最后，还是根据同样的理由，我坚持我們的海軍应当加强，直到它的优越地位达到这样地稳固，使我們在所掌握的或以后能够掌握的任何属地，都不致被动摇……假使这些'小英格兰人'的主張获得了胜利"，他以藐視的口气补充說，"他們将不只放弃那扩張帝国的和为我們获取新市場的正当机会，并且我还要怀疑他們是否甚至肯作必需的努力来保存我們祖先傳給我們的偉大遺产①。"

英国重要政治家們的有力的但是肤浅的帝国主义思想，被一位主要的英国总督的更文雅的和更尖銳的言辭所加强了。"你沒有力量，就不能获得繁荣"；米尔內勛爵于1906年在曼彻斯特保守党俱乐部所作的演說中提到，"在所有的民族中，你們是最依靠遍及全世界的企业和商业，而不是单靠这几个島上的出产，来維持你們

① 約瑟夫·張伯倫："外交和殖民地問題演講集"（Joseph Chamberlain: "Foreign and Colonial Speeches"），1897，第101—102，131—133頁。

的生活的。这个国家一定要保持一个大国的地位，否則就要变成一个貧穷的国家；至于那些正在追求社会改良的人們，这种追求是最正确的，但是由于他們对国家的力量易于疏忽，所以他們的房屋是建筑在沙土上的。'这些你們应当做的，那些你們也不应当不做'。但是，偉大是相对的。自然的条件限制着英倫三島在現代世界許多龐大帝国之間单独保持它曾在許多較小国家的时代所拥有的同样重要地位——即在俄国和美国成长以前，在統一的德意志因陆海軍力量发展的直接結果在繁荣和商业方面跨了那些大步以前的地位①"（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金融家的足迹

跟在大不列顛制造商和銷售商后面的是金融家。当資本积累到很大数目的时候，当国內的利息率开始降低的时候，他們就发現了許多未开化的民族，和一些具有古老的与和平的文明、而这种文明又不允許它們有自卫能力的民族；剝削这些民族比剝削他們自己的同胞要容易得多。"最大的危險"，柯罗麦勛爵告訴我們說，"也許是在一个东方的統治者第一次接触到欧洲信貸制度时所做的。这个統治者发現到他好象能够极容易地获得巨額的金錢。他的个人愿望能够如此容易地得到滿足。他被那些欧洲冒險家从来沒有疏忽过的、在极誘惑的情形下献給他的、开发該国的巧妙但又荒謬的計划所炫昏了。他太缺乏远見，以致不能認識到他为自己造

① 米尔內勛爵："民族与帝国：談話与講演集"（Lord Milner: "The Nation and the Empire: Being a Collection of Speeches and Addresses"），1913，第140頁。

成的未来困难的本質。不顧利害地使用的信貸所貢献給他的利益，引起了他独得全部利益的野心；这种誘惑太强了，使他不能抵抗。于是他就跳进了展开在面前的深淵，損害了他的国家，使得不只是他的同时代人，并且未来的后代，都遭受痛苦①”。因此，資本的輸出，对于牟利的資本家来說，比利用它来在国内发展工业設备，或者建設迫切需要的公共服务事业，具有甚至还要更大的吸引力。假使商业是跟着国旗走的，那末，国旗也同样地跟着貸出資金的人走，以便保护他，使他不致令那些放款給他的人失望和发怒。再者，常常也有其他資本主义强国的商人們和金融家們同样地希望剝削未开化的人。“在与这些在金錢方面还沒有走入正軌的人民做生意的当中，普通是有很可观的利潤的，”一位美国批評家在“商业企业的理論”这本書里解釋說，“特别是在这种生意有了充分武力作后盾的时候。但是，同样普遍的是，这些人民不愿意与文明人类发生永久性的貿易关系。所以，为了貿易和文化的关系，必須将一些文明人的行为規則强加在这些人民的头上，借使貿易容易做并且能够做得賺錢。为了这个目的，軍备是少不了的②。”“但是，在与新的同行們作商业上額外报酬的分配中，任何商业团体都有被外来的文明势力所欺騙的危險。在这种彼此都想尽可能占到别人一点便宜的爭执中，除了武力以外，沒有可以求助的东西。因此，一种备战的陣容就不得不摆出来；而軍备和武装示威的行动，就在有关世界市場的貿易方面，成为普通的商业工具的一部分了③。”“商业的状态”，一位主要的德国工业家告訴我們說，“在某种意义上来說始終是战爭的状态——一种和平的战爭状态，假使可以用这个名詞的話；只要和平能够持久下去，它可以为和平的目的服务，但是，无論有沒有战爭存在，它一直是抱着备战的目标的④。”

帝国資本主义的无耻

就这样，我們看到所有資本主义国家的軍火制造商，經常利用他們所津貼的报紙，在資本主义牟利者和平侵略的后面，紧紧地施加压力。不过，杀人武器的制造商和銷售商人倒有一个新的特征。在他們的字汇里，是沒有人道主义这个时髦字眼的；他們甚至連愛国主义的外衣也不披上。軍艦和魚雷、步枪和平射炮、榴霰彈和高

① 柯罗麦伯爵："近代埃及"（"Modern Egypt", by the Earl of Cromer），第1卷，1908，第58—59頁。

② 費布倫："商业企业的理論"，1904。資本主义对于帝国主义政策的影响的一个最惊人的例子，是强迫販运鴉片到中国去的这个故事。关于1839年到1842年的"鴉片战爭"，亚諾尔德博士写信給一位朋友說，"普通的侵略战爭的罪惡，在我看来，比起为支持走私，特别是支持一种敗坏道德的毒品的走私而进行的战爭的罪惡，要少得很多，并且这种毒品是中国政府所禁止的，但我們为了牟利起見用武力来强迫輸入"。中国政府的政策，曾在1847年滿清皇帝的一道上諭里有了闡明。他說："我不能""禁止这种供吸食的毒品的輸入；貪污鉆营的人們，为了賸錢和荒淫，使我不能实現我的愿望；但任何暴力，决不能使我从人民的惡习和苦痛中征取税收"（"議会报告"，1847，第297頁。这道諭旨，在"清实录"、"东华录"、"东华續录"和"夷务始末"等文献里都查不出。是否傳譯失眞，或者竟出自捏造，抑或上列文献未予載录，无从断定。这里是照原書所引英譯原文譯成中文的。——譯者注）。但热心于中国貿易的資本主义商人、輪船老板和銀行家获得了胜利，于是"在英国当作毒品出卖的葯物，特别为滿足中国人民的嗜好制备起来，以每小时販运一吨的数量运入他們的国家，每天販运12小时，繼續到差不多60年之久；同时，还有一种罪上加罪的事实是，从中获取直接收入的那个大属国，却一致地强調地譴責这种对它有利的特殊罪惡行为"（罗恩屈利："帝国葯物的貿易"，〔Joshua Rowntree: "The Imperial Drug Trade"〕1905，第268頁）。1911年的中国革命才最后結束了这种办法，英国和印度政府都同意停止輸出鴉片。不幸得很，后来中国淪于无政府状态的时候，資本家們就再度开始这种有利可图的貿易。

③ 費布倫："商业企业的理論"，1904，第295—296頁。

④ "鉄环：德国工业品出口的将来"（"Iron Circle: The Future of German Industrial Exports"），第46—47頁。

級炸葯的制造商、对于他們买主的性质和国籍，是完全不关心的。同一的联合公司，可以在不同的国家里設立工厂，并且敌对国家的工业巨头也可以吸收到它的董事会里。他們一視同仁地和本国的政府、同盟国的政府或未来的敌人"做生意"。最合他們的口味的不是一个"国际联盟"，甚至也不是一种"均势"，而是一种动蕩的局面，在这一个国家或那一个国家制造着紧張的局势，惜使全世界的軍备开支达到最高峰。但誰能責备他們呢？亚当·斯密不是教导过我們嗎，他說，"当每一个人自由和安全地发奋努力的时候，他改善自己情况的自然努力是如此强有力的一个原則，以致能够单独地和不需帮助地……把社会导入富足和繁荣的境地。"亚当·斯密所沒有預見到的是，这同一的"为我"原則，一經中立市場的国际爭夺反常地加以扩大和歪曲之后，便会同样有力地把社会拖进最具有毀灭性的战爭中，并且，同样地，正如我們現在可以补充說的，拖进所有战后解决国际問題的办法中最具有灾难性的办法里面去，正是由于这一点，凡尔賽条約的制定，才根据商业資本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則："利潤属于战胜者。"

战爭是怎样发生的

这中間的是非問題是，为保护牟利企业而駐在世界各地的龐大警备武力，影响所及，不可能单限于对半开化的債务人的恫吓，强制商务契約的执行和工厂保护及商业警备。假使所謂"和平方式的侵入"的結果是，一艘外国軍艦之进入另一个国家的海港的話，那末，就必須建筑一座炮台以便能够击沉那艘軍艦，否則这艘軍艦可能不只是作为通商的工具，并且会作为統治野心及征服的工具。这样一座炮台又会引起另外一艘更具有威力的軍艦的制造；而这

另一艘軍艦又会引起具有更长射程的大炮的炮台的修建。同样的紧張局势也会由一队远征軍而引起。它的目标也許是为了在一个商业不大发达的国家，执行某种外債利息的收取任务，或者是为了打通某一沙漠地带的交通路綫或其他的任务。可是不可避免的結果是，出現了另一个远征軍，借以监視第一个远征軍，使其不致越出軌外；例如，当凱奇涅在获得了对埃及的借款的利息并"粉碎了馬迪②"之后，他就发現到他自己突然間受到了馬香少校所率領的法国远征軍的监視；立刻产生的結果是，英法关系危險地紧張起来了，并且法国由于当时吃了眼前亏，很显明地就将它在非洲的軍力加强起来了。

假使資本主义能够控制住它无可避免地造成的外交和軍事局势，那末，柯布登关于在对外貿易的基础上建立起普遍和平的梦想，或許不是完全无稽的。可是，在民族的热情、国际間的嫉妒和恐怖以及使用国家武装力量作为商业的警察这种企图所引起的好战精神面前，資本主义是无能为力的。它甚至不能够全始全終地和平地进行这些企图：一种有效的完整的警察的建立，实际上就意味着征服和并吞，而这又意味着战爭。这种战爭，虽然在当时为某些貿易带来了巨大的利潤，可是对于資本本身却带来了惊人的毀灭，并且使整个对外的貿易、以及蒙受影响的大部分国内貿易所賴以支持的金融机构，失去調节。因此，1914 年到 1918 年的世界大战，虽然是資本主义追求辽远市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偶然事件，可是資本家們，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到来的时候，便和出自良心而反对战爭的人們一样誠恳地从战爭里倒退下来，并且又被完全非商业

① 回教救世主的称号，特别指在埃及苏丹設立的一个独立政府的回教首領。

性质的、愛国的幻想和热情驅使进去；他們知道資金的毀灭、商业的脫节、劳动力由生产方面大規模地轉移到杀戮和破坏的方面，都会把他們安置得很好的計划一齐推翻。就这样，說是倫敦市場发动了战爭而同时又說倫敦市場反对战爭，都是同样具有眞实性的。总結一句話，在外交和战爭方面，牟利的霸权对于做坏事是全能的，而对做好事則无能为力。它能够束縛人，但它不能阻止利劍出鞘。

英国的一份

我們現在可以总結一下資本主义独裁，同几个未曾間断的战爭之間的关系，这种战爭自 1851 年倫敦博覽会开始的世界和平到 1914 年至 1918 年的惊人浩劫期間几乎一直沒有間断过。正是英国的資本家，抱着被初期政治經济学家所加强了的信仰，第一个使金錢利益的追求成为——我們可以公正地說——一种民族的宗教。正是英国的政論家，为大制造商通过初期的工厂制度扼杀本民族幼童和殘害本民族青年的行为，找出了一种理論上的根据。正是英国国教的一个牧师多馬士·罗伯特·馬尔薩斯，宣称：由对外貿易的盛衰带来的失业及剝夺工資所造成的死亡，不仅是使人口与生活資料相适应的一种"自然規律"，而且是"上帝的法律"。实际上，正是英国的商业主义在人类的道德心为德国的世界强国理論做好了准备。俾士麦和特賴希克是李嘉图和納沙·西尼尔的精神上的繼承者。在十九世紀的末期，我們看到，由于有意将一国的外交政策轉变来为資本主义企业家的利潤服务的結果，已使这种追求利潤的理論扩展到治国的方略上去了；必須注意，这种利潤不是从国际間生产上和交易上的一种共同进步得来的，而特别地是

从其他国家商人的金錢亏損中得来的①。这种个别資本家的动机与国家的动机打成一片的現象，曾在1871年以后德意志帝国施行的政策中公开地宣布。"一个大国不同于一个小国的主要而又正当的根据"，俾士麦宣称，"是它的政治的唯我主义，而不是它的理想；

① 一位有資格的法国权威曾确定地把"帝国主义"的急剧扩張归根于欧洲工业主义的"巨大发展"。他說："蒸气在工业上的应用，把一种无比的力量放在資本家的手中了；这种力量大大地增加了他的权力，但同时，由于各个国家看到它們的生产力和它們的財富增加了，它們发現到它們的需要也增加了，以致变成昂然自大。它們立即覺悟到它們过去安居于其中的疆界太狹小了；于是它們就为它們的工业，要求无限多的原料和无限大的市場。因此，原料的获得和市場的夺取，便成为各国各个政府生命攸关的事情。經济的竞爭代替了单純的政治斗爭的地位；并且在爭夺殖民地的野心后面，一直埋藏着为生存而斗爭的迫切需要。一天又一天地变得很明显，任何国家的实力，要完全照它的金融的、工业的和商业的資源来衡量。商人变成了統治全世界的帝王。在古代，基督教国家是以救世的征服者的伪装，出現在野蛮民族面前的，它們穿着盔甲，一手拿着利劍，另一手拿着圣經，昂然前进。在今天，文明的开路先鋒是商人。他向前挺进。他走在傳教士和軍队的前面。我們这个功利主义的时代，只在它的商人的数量上、勇气上和財富上找得光荣。神权論的最驕傲的使徒——德意志威廉第二皇帝，在一次难忘的时际，曾毫不畏縮地作出下列的发言；这种发言，就是他所乐于回忆的'难忘的祖先'也不得不感到特别的奇怪。'讓我的在那边的所有的商人們了解'，他說，'德国的米迦勒已經把他的带有德国之鷹的国徽的盾牌，巩固地安置在那个土地上了，借以保护他們的安全。'所有这些領土的爭夺，所有这些外交的爭执，归根到底，只是敌对的商人們鈎心斗角的斗爭。几年前几乎把南非的火焰燃燒起来的，是一个貿易公司，政府特許的南非公司。最近，散布英法分歧的种子的，又是一个貿易公司，奈格尔公司。他們說，掀起古巴战爭的，也是一个貿易的联合組織。最后，在著者执笔的时候，一小撮頑强战士与英帝国整个武裝力量正在进行搏斗的最不正义的战爭，是由于——假使倫敦的法利賽人（即伪君子——譯者注）准許我們这样說的話——一批金融家和商人們的无餍之求所造成的。塞西尔·罗德斯曾以讥誚的口吻坦白地承認过这一点。'这个战爭'，他說，'是一个正义的战爭，因为它的目的是保护英国的国旗，而英国的国旗又代表着今天世界上最偉大的商业原动力'。随便在什么地方，商人都走在前面；政府是他的忠实仆人；而士兵則为了填滿他的錢柜而去送死。"达賽："非洲的征服"（Jean Darcy: "La Conquête de l'Afrique"），1900，第3—5頁。

为与它的利益无关的任何事件而战争，是一个大国所不值得去做的①。”道德学家也許可以怀疑，德国的生存竞争的說法，比起它的英国先驅者的說法，虽然更富有戏剧化的危險性，可是在卑鄙的程度上，是否还要少一点。我們想，“我的国家，对也好，不对也好”，比起“我自己的金錢利益，对也好，不对也好”，在指导情感、思想和行动上，是比較响亮些。那些喜欢对这种比拟提出辯論的人們，也許可以从狗和猫的心理的比較找出理由来支持这种看法。新的心理学专家告訴我們，狗是从一种习慣于成群猎取猎物的动物傳下来的后代，并且具有一种高度发展的合群本能；猫則是和单为自己而猎取猎物的老虎有姻緣关系的，因此，它沒有象狗在作为主人的伴侶时所习于表現的那种忘我的服务精神。亚当·斯密的追随者，象虎和猫一样，沒有給服务精神和自我牺牲的精神留下一点余地，他們只考虑到个人的金錢利益，或者至多个人的和他的家庭的金錢利益。德国民族热情的爱国主义，不管是怎样被歪曲为对祖国的一种狗一样的虔敬，无論如何，还具有为他所隶属的社会的权力和財富作个人志愿的自我牺牲的品質。但是，英国和德国这种在道德上的区别，还不能描写出全部的面貌。德国人民之感覚到他們的侵略政策里面体現着公道和国家的利己主义，是有某些理由的。当德国制造商、貿易商和金融家来到世界市場的时候，他們发現了，或者以为他們发現了，世界貿易的至少四分之一，是跟着英帝国的旗帜走的②，同时美国和帝俄又霸住了剩下的土地和人口的一半以上。那末，深信着約瑟夫·張伯倫和米尔內所說的：同未开发国家所进行的有利潤的商业，要依靠着本国的威望、“势力范圍”和財政保护措施这种說法的德国政府和德国人民，会感覚到他們已被圍住了，并且已被剝夺了他們从剝削其他民族的劳力和資源

中所应該获得的一份利潤，又有什么希奇呢？于是，德国的宫廷、参謀本部、公务人員、大部分的大学教授和重要的工业巨头及金融巨头，都被一个愿望所左右，这个愿望就是：牺牲其他国家的出口貿易，来扩大德国的出口貿易。假使和平的手段不能迅速地和完全地奏效，为什么不应当求助于普鲁士軍事組織天才所建立的武力呢？英国不是一次又一次派遣它的海軍来完成环繞地球的英帝国嗎？我們認为，就是在这种方式之下，崇拜个人牟利才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世界大战。

阶級斗爭

資本主义是造成国际战爭的根本原因这一控訴，虽屬十分重要，但却另外还有一項控訴值得提出。国与国之間的战爭，即使是象 1914 年到 1918 年的这样大的規模，还不过是一个插曲。更經常和更普遍的，因此对于社会的影响也許还要更大的是阶級斗爭。这种斗爭是資本主义工业組織，連同牟利的动机，在每个工业先进

① 罗伯逊："俾士麦"(C. Grant Robertson: "Bismarck")，1918，第 66 頁。俾士麦可能是十九世紀公言唯我主义是国家政策指导原則的第一个政治家。

② 在其他国家里，这种反抗英帝国的情緒的普遍性，已在世界大战前二年由一个主要的英国的帝国主义者所承認，他曾在 1920 年到 1923 年的联合內閣和統一派內閣連續担任过閣員。"同时，在欧洲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到了 1870 年，德意志和意大利国內統一的长期斗爭，获得了成功，并且欧洲內部的平衡，已經建立起来，而且到現在已有一代的历史了。接着，就是欧洲工业的大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扩張領土和扩充海軍的愿望。可是，在扩張領土或建立殖民帝国的努力中，每一个强国都发現到，它面对着英国政府，而这个英国政府，或者是政治上的实际占有者，或者是嫉妒地看守着它遍布世界的商业既得权利，并且尖銳地警覺到那采取保护关税政策的竞爭敌人关閉每个市場的措施所意味着的威胁。"（亚麦鋭："联合和力量"〔L. A. Amery M. P.: "Union and Strength"〕）1918，第 91 頁。

的国家里所逐漸造成的。我們現在看到，1834 年欧文派的工联主义，1837 年到 1848 年的宪章运动，1848 年的巴黎和里昂、德勒斯登和維也納的工人起义，1871 年在战敗的法国发生的巴黎公社的猛烈爆发，以及中途失敗的 1905 年俄国革命：这些都是体力劳动者革命运动的先鋒。这种运动現在已經发展到每一个国家，并且，在先进工业主义的国家里，差不多包括了整个的工資劳动者阶級。因为，由于資本主义制度在各国已經占据着統治地位，一代又一代的工資劳动者都烙上了永久穷困的厄运的深刻印記，只是在他們作为一个阶級而注定遭受到的失业所造成的循环困苦的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他們对于穷困所带来的个人自由的被剝夺，必然地認識得比社会里任何其他部分的人所認識到的，还要更加尖銳。在和那些由于新財富的产生而获得优厚利潤，因此增加了几乎无限制的自由的人們比較起来，这种剝夺使他們更加恼怒。遭受到資本主义不断增加的工业灾害和工业疾病的人們，是体力劳动者和他們的孩子們。遭受到在英国維多利亚初期矿井和工厂无限制地追求利潤及乡村不正常地城市化的恶果，即物質的和精神的堕落、疾病、未老先衰的痛苦的，是体力劳动者的阶級。在美国和英国，作为現代机器工业特征的长期的周期性的失业，从一个开明的資本家看来，好象是"心脏的有秩序的跳动，借使血液流通的日常現象——每一次跳动循环一周①"；这种情形，对于成功的脑力劳动的企业家，也許更能发揮努力和創造力：可是对几百万的体力劳动者来說，它們只是意味着在吃不飽的状态下，过着被迫的游閑生活，并且即使有得吃的話，这种食物也是由颓神丧志的施舍方法得来的。直到十九世紀的后期，大部分的体力劳动者，才学到組織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来反抗他們的領袖曾从不間断地提出抗議的

那种管理工业制度。到了二十世紀的时候，阶級斗爭的情緒——在每个地方这"两国"之間利益方面一种不能妥协的分裂——就在所有資本主义已占統治地位的国家中在工資劳动者的几乎每一部分中迅速傳播开来了。

我們还要注意，这种工資劳动者反抗資本家的永久的斗爭，在純粹破坏的能力上和在改組社会能力的缺乏上，还要看各个国家內資本主义独裁曾否被民主政治所削弱而有所不同。在殘暴的和腐敗的专制統治下的帝俄，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是完全沒有参加政府的权利的，于是，当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布尔什維克"或"多数派"的領袖們，一旦因 1917 年的革命負起政府責任的时候，就被迫放弃所有的民主伪装，而建立了"无产阶級专政"；这种专制确是一

---

① 一个职业偏見的奇特例子是，象已故的查理·布思这样一个开明的和有公益心的人，居然可以有意地把失业对于人民生活和劳动方面循环的和长期連續的恶劣影响，作出下列的結論：

"从近处来看，这些經济衰退的循环是有其显明危害的、甚至殘酷的一面的；可是，从較远的观点来看，'除了属于悲伤的范圍以外'，它們好象是不这样恶性的。也許可以用一点想象的努力，把它們当作是心脏的有秩序的跳动借使血液流通的日常現象——每一次跳动循环一周。即使在我們人类經驗所能掌握的生活范圍內，究竟这种变化是否造成痛苦，还要靠着經济生活所依据的时間的久暫来决定。那些活一天算一天，活一周算一周，甚至那些活一年算一年的人們，也許会在商业緊縮的时候感到窘迫——其中有些人也一定如此。但是有些被害人，在繁荣的年代，由于能够并且愿意为不可避免地要来的衰退年代做好准备，一点也不会感到窘迫；因此，假使好的和坏的时間来得不太突然或者不太长的話，則社会方面，不只是由于緊張时期品德的提高，并且由于对企业的直接影响，而获得了利益。至于在品德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工資劳动者的影响，那就和繼續漫长炎夏疲弱状态之后而来的严冬所給人們的影响相似。"（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查理·布斯："倫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Charles Booth: "Life and Labo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1903，第 2 輯，"工业"，第 5 卷，第 73—74 頁）。

种独裁，但在它的下面，象以前一样，无产阶級也是被命令着，并且象在沙皇制度下一样，政府的监狱也是滿着，它的步枪也是忙着，虽然它的目的是誠心誠意地为着公共的福利。在秩序很好的和文明高度发展的专制統治下的德国，普遍的选举权和議会制度的幌子曾經緩和了这种专制，于是，迅速兴起的社会党，接受了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級专政的口号，但沒有决定它的意义究竟是馬克思所認为的那种胜利的革命者严厉施行的一种戒严状态，还是以体力劳动者必然占多数的全民代表的政府。这种辞句的含混，以及对所采取的步驟的考虑得不明确，遂造成了工人队伍里意見的分歧，并且在1918年后的最初几年，削弱了若不是由于这种分歧就会很强大的有組織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在英国、瑞典、丹麦和比利时以及在盎格魯·撒克逊的澳洲，政治的民主，已經巩固地建立起来了，于是，我們在二十世紀的初期，便看到一种确定的工人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在議会中出現了；它要求着，并且，在某种微弱的程度上，开始着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建設，不过作为一种民主的政党，它坦白地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政治民主的合乎宪法的方法上面。即使是在这些国家里，許多工人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在它們所遭受到的民主幼稚病方面，还背上了撫育它們成长的环境的烙印。

我們必須鄭重地警告我們的資本家和政府，假使他們接受了善良的忠告的話，他們将再不敢說，"在我們之后便是洪水"这种神話，或者認为这种怒火已在俄国燒尽，而以为不会再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件，讓我們可以鬼混过去。在某些方面，工人阶級比資本家还要商业化得更加深透，因为資本家在足够富足的时候，还会遵守古代希腊的教訓，"先富足而后知礼义。"已故的安得烈·卡內基

在殘酷地剝削了四兹堡从而发了大財以后，便大規模地实施德行，甚至实施公民的德行。可是，工人阶級是永远不会到达这种轉捩点的：他們在所有的时候，都是为收入作拼命的掙扎，不可能实施卡內基式的德行，或者获得这种德行所带来的道德上的快感。就这样，資本家在利潤率上而不是在社会服务上念念不忘的想念，反映到工人身上的，只是在工資和工时上面的想念；他将自己卖与出价最高的人；并且，根据商业的原則做这种买卖，認为他应当拿出尽可能少的劳力，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內，換取尽可能多的代价。这种买卖，在本質上是一种娼妓式的买卖；它不可能强加在一代又一代的工人身上而不最后引起他們認識到：除了在生产資料方面爭取作主人外，再也沒有其他的解放办法，并且这种斗爭也只有"打倒"他們現在的主人，才能获得胜利：簡单地說，就是阶級斗爭的方法。就这样，我們看到在外交方面尾随着資本主义的險恶命运，又在內政方面无情地追随着資本主义了；并且强迫它使它的奴隶們也受到陰謀、斗巧、欺詐、把持和斗爭等本能的影响，而使革命变为与战爭一样不可避免的东西。这就为在追求利潤的动机还沒有使社会的合理的及和平的解决办法变为不可能之前，猛力地将这种动机加以放弃和加以詆毀，增加了更多的理由。

普遍的破坏行动

我們可以想一想商业化的意义是什么。資本家为了保持物价，毫不犹豫地毀掉大批有用的物資，或者把工厂关閉，听任他的雇工們挨餓。那是明明白白的破坏；而破坏是現在威胁着文明的生存的一种力量。資本主义的报紙，把令人憎恶的名詞专用在工人阶級对資本家的破坏所采取的平行的报复行动，是毫无根据的。在

攫取更多利潤的資本家与攫取更高工資或阻止工資削減的工人之間的追逐战中，一个将矿井关閉以致他的矿工生活无着的煤矿主人，和一个想法使这个关閉的矿井不因缺乏抽水劳动而灌进水来的矿工，并不能表明其中在道德上有何区别。托拉斯削碼竞售以击毀弱小的竞爭者，直到它能够鯨吞整个行业、操縱公众所付的价格为止的种种阴謀，对于工人也是一种現实的教育：它使他們联合起来，叫那些接受工会所訂标准以下的工資的，或訂出足以使雇主得到比市价更多利益的工作标准的破坏罢工的工賊，走投无路。我們漫画报紙上糊涂的滑稽作者，曾把砌磚工人一天砌两块磚的故事当作題材；他們却忘記了，按照資本主义的原則，一个砌磚工人削減他所砌的磚数，与他的雇主削減工資，同样是巧妙的生意經。在資本主义社会里，浪費的限度，怠工的限度，破坏的限度，簡单地說，尽量作坏事的限度，并不是道德的限度：这些都是經济的限度；这种限度是由一种事实所規定的，即，最后的消費者如果不从所付的代价获得某些价值，他就不再去买了，因而雇主和工人双方都要淪于穷困。但是，雇主和工人双方道德的墮落，并不因环境不准許他們把不道德的行为降低到荒唐的程度这个事实而所有减少。它所养成的破坏的习慣，正在双方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

生动的例子可以在1914年到1918年的世界大战中找到，那时毫无意义的破坏都被当作是当然地伴随着胜利的侵略而来的；但这却并不是新鮮的事情。专門燒毀經济上的敌人的房屋的特别破坏方式，在十四世紀及十六世紀的农民革命中已經实行过了，并且以最危險的富于暗示的成功的方式，在法国革命和愛尔兰自由国的建立时期重新使用过。有人告訴我們說，卢德分子暴动这个名称，"是根据勒斯特厦的一个愚笨的人，尼特·卢德而来的，这个

人曾因一时的冲动破坏了两部織袜机。"可是1811年的工人，1914年的德国参謀本部，1920年爱尔兰的領袖，迈克尔·柯林斯，却不以为尼特·卢德是一个愚笨的人，而以为他是一个值得效法的战略家。我們必須面对这个确定的实际情形，假使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沒有經过人民的統治者明智的准备、計划和指导，那末人民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会求助于破坏行动，借以迫使任何一个政府担負起重新建設的任务；而其中的危險是，这种破坏可能走到了如此的极端，以致重建的任务成为不可能的事。

我們也可以想一想战爭为破坏者提供的无可置辯的理由。人們对他們說，商业是不景气的；公共企业是缺乏效率的，貪污腐敗的，不可能并且实际上也不賺錢的；他們必須尽量束紧褲带和挨餓，以俟商业的好轉。他們的答复是令人惊倒的。他們指出，当政府面临着两种抉擇——一种抉擇是，从国家的資源里，除撥出极大的經費用毀灭和杀人的武器来装备他們以外，还可以使他們吃得和穿得比他們在这4年之前有生以来的任何时候的吃穿更加好些，并且，还可以余下足够的財政信用以便貸出巨額借款給它的同盟国家；另一种抉擇是，讓德国的刺刀割断它的咽喉——，它立刻发現，这一切都是极容易和綽有余裕的可能的事。他們便自然地和很有道理地作出結論：假使使用同样鋼鉄般的动力的話，那末，不言而喻，就有更多的理由認为政府能够給他們吃，給他們穿，給他們住和給他們装备，以从事和平的和富有成果的生产。对于这种說法，議会里合法的工党領袖們除了說，由于这些破坏者沒有象德国参謀本部那样的杀人的組織能力，因而这种企图必然要遭到失敗以外，絕对无言可答。于是，这种破坏者又被推回去，重作他的零星的无組織的破坏活动：破坏机器，炸毀火車，燒毀宅邸。精神

的抗議和善良的忿怒是无用的；假使这种做法是鼓励双方的做法，并且沒良心的貿易是現时的风尙的話，那末，資本主义就不要希望寿終正寢；它将死于非命，并且人类的文明也将由于精疲力竭而和它一同死去。

或者可以說，資本主义制度曾經經历过不少更恶劣的时期。但是，它之所以能够这样，正象凱恩斯先生在他的醒人的句子里所說的，是由于它在道德方面欺騙人民的結果。"我只企求指出，"这位劍桥大学的經济学家說，"在不平等基础上的积累原則是世界大战以前我們当时所了解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的一个极重要部分；我們并且要强調，这种原則的依据，是一些不可能再創造出来的不稳定的心理状态。只有这样少数的人享受安乐生活而同时要人民群众积累了这样巨大的財富，是很不自然的。战爭已經揭穿，大家消費是可能的，多数禁欲是无益的。就这样，謊言被揭穿了；劳动阶級也許不再愿意放弃这么多，至于資产阶級的人們，他們既对未来不再那么有把握，也許在他們存在的一天会更加充分地享受他們的消費自由，从而加速他們被沒收的时刻①。"

現在是認識馬克思的极大重要性的时候了。对于他，还有許多无知識的胡言乱語在流傳着，可是他的极大的重要性，不是在于他在經济学上和政治学上掀起了一个革命，而是在于他拆穿了資本主义在道德方面的虛伪。在今天，馬克思理論上的錯誤是象廖西的錯誤一样地彰明显著的；但是，沒有一个讀过"資本論"里关于历史的各章的人，会再墜入到一种幻想的陷阱，認为資本家在道德方面是值得尊敬的。馬克思尽管在抽象的經济理論上有他一切的

① 凱恩斯："和約的經济結果"，1920，第19頁。

夸大的錯誤——甚至对社会主义也是不利的錯誤——却輝煌成功地把資本主义的旗帜突然地反过面来，使它們的丑恶的一面面向着观众，并在現代文明的戏剧里，把資产阶級扮演成反派的角色。在我們同苏联政府的交往中，最使我們的外交人員感到糊涂和感到受了誣蔑的是，共产党人認为道德的威望是在他們那一边的断言，和无法在他們带着諷刺的迁就态度上——这是他們最接近于国际礼貌的态度——造成任何尊敬我們的印象这个事实。就英国的外交部来說，这好象只是一种冒失。沒有任何錯誤比这种看法还要危險地导人走入歧途。在工人阶級面前，資本家（大陆上現在一般称他为布尔乔亚，即資产阶級）确实是被判定了道德上卑鄙的罪的；并且无論是合法的社会主义者，或是专事破坏的枪手，都对他沒有任何尊敬之心，或認为他是社会的台柱的任何信仰。

就这样，阶級斗爭已經被認为是一种神圣的斗爭了，而这，正如本書所指明的，并不是沒有强有力根据的。象我們的資本主义政治家和他們是新聞記者通常所做的一样，認定这些无产阶級的战士們应該知道他們是刑事犯，并且是沒有天良的社会强盜的这种說法，只能引导我們对在全世界正在行动中的革命队伍的力量和持久性，作最危險的过低的估价。它直接导向着一种不細心思考的和驕傲自大的結論，以为补救的办法，不外是增加警察实力和严格执行刑事法律。这些措施，只能燃起和加剧民众的道德力量：它們不能控制这种力量。如果民众不相信警察在道德方面是正当組織的話，那末，他們最后就会把警察局燒掉，并且沒有人会提供証据来控訴他們。

經济信条的大决战

我們最不愿意做的就是充当作惊人之談的人；因为，如果忿怒是一个坏的顧問的話，惊慌則是一个更坏的軍师。不过有一种事实，我們不能視若无睹，这就是，比十年前任何有識見的人所認为不可能的事情还要更坏的东西，由于我們沒有将我們过时的制度加以修改使其适应当前的要求和情况，反而听它把人类的耐心弄得紧張到了爆破的程度，現在已經出現了，并且每天仍在出現着。在許多其他国家的情形，比起在英国的情形——到目前为止——还要坏得多。中欧的大块地区，都已回复到資本主义以前的阶段：人口稀少的农业国家，点綴着迅速地使社会瓦解、穷困、疾病和紊乱的工业中心，并且在工业无产阶級和农民間一种破坏性的对立状态也成长起来了；而这些农民現在虽不能控制这种不幸的混乱状态（这是困难的症結），但却掌握着食物的供应，因此掌握着城市无产阶級的命脉。这好象是在俄国的和奥国的情况；并且可能以更具有威胁性的方式出現于德国的情况。我們已經看到，甚至在資本主义生产力最高的时候，它的活动中心的貧民窟尚且是疾病的、損害农村生活的和失业穷人的集中点。假使甚至它們的生产力被毁掉了，則結果一定是和30年战爭后的德国情况一样，飢餓的人群强搶忿怒的农民从而被农民屠杀。这种种的恐怖現在并沒有消灭；相反的，我們以"殘杀犹太人"（原文系 Pogrom，指資本主义国家反动的或沙文主义的大殘杀暴行。——譯者注）的精神把它們扩大了，不过，由于这是一种經济的現象，基督教徒的亚美尼亚人也和犹太人一样悲慘地受到打击。

为了阻止这种极端的社会灾难，意大利的資产阶級便将自己

武装起来，以便用公开的暴力来鎮压无产阶級。在过去許多年中，美国的資本家們一直对着工人們的联合組織进行广泛的斗爭。在最近出版的許多字典里，法西斯蒂和平克吞（Pinkertons，阿兰·平克吞〔Allan Pinkerton〕于1850年在芝加哥創立的偵探組織雇用的偵探，一般用以指私人偵探。——譯者注）这一类的字，都被定义为資本主义雇佣兵。这正是在資本家的征募軍官发現到这个世界充滿了青年枪手的时候；这些青年們，别的行业都沒有学会，就学会了打手的行业；他們是投擲炸彈和射击枪彈的能手，向来把人命看得很賤，把財产的价值看得不算一回事。

无产阶級和革命的知識分子，为了反抗私人資本主义的私人軍队，也考虑着和进行着对資本主义制度的大批的破坏活动，一切情况完全象在爱尔兰联合起来反抗英国統治的共和党人所做的一样，搗毀他們乡村紳士和工业老板的財产，使这些人去强迫英国政府讓爱尔兰变为一个自由国，并且由于这些共和党人反对那种解决办法，他們現在仍在繼續进行破坏活动，企图强制做到爱尔兰完全脫离对大英联邦共和国的隶属关系。这种破坏活动，也許在这个事件上获得成功，在那一个事件上遭到失敗；但无論是那种事件，它都具有如此的毀坏性，以致对所有有关的方面都可能发生毀灭的反击。这种例子，正威胁地追近我們自己的門口了。在克萊迪、泰因、提斯、塔弗和其他的失业中心，爱尔兰的榜样正在热烈地被人們談論着。假使造船工人和采煤工人已經作好破坏活动的准备，那末，建筑房屋和工厂的工人以及制造机器的工人，也不見得不把破坏他們本身的工作当作自己的任务而有所犹豫了。

我們不可以拿馬克思主义者和崇拜資本主义的教条主义者所說的話来安慰自己，他們認为一切战爭都是經济战爭，并且經济战

爭不久就可以熄灭。这种話只有在一种特殊状况下，才具有眞实性，就是，当人們已有足够过平时习慣的生活的待遇时，很少有人——不足与警察对抗的人数——肯为經济的利益而作斗爭。但是，正如我們已經指明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宗教，而关于資产的信仰是一种教条。它們中間的冲突，是由道义上的憎恨和对財富的貪心所搧动的；并且双方面的报紙，都在道义的憎恨上大做其文章，而在自私的动机上尽可能少講。正象經济的理由——这确是大战的眞正原因——很难搧动英国人民和德国人民間的互相殘杀，而因此必須采用另一种說法使每一方面都認为对方是恶魔不是人类这种情形一样，假使不能說服双方斗爭的人，使其深信他們是从事于一种反抗人类的仇敌的正义斗爭，則我們就沒有理由害怕将会发生任何一种大規模的阶級斗爭。这种說服工作，已經在資产阶級的报紙上全面展开了：这是我們都已感覚到了的。我們的統治阶級还沒有感覚到的是，同样的說服工作，带着許多可怕的証据，正在另一方面展开；并且，这种阶級斗爭，假使一旦認眞地突起鋒来，将是一种宗教的战爭，而且它的規模，以及它所具有的自我牺牲的精神、殘酷性和持久性，就是十七世紀的各种宗教战爭同它比較起来，也好象仅仅是一些暴动而已。这些斗爭的开端，可能是試图对那些抱有特殊的經济見解的人作国际性的排斥。美国已經在排斥那些忠于布尔什維主义的人或簡单地宣称自己是这种主义的信徒的人。俄国也在排斥号称百分之百的美国人。这是一种排斥，是破坏活动的一种最富于压迫性的形式。假使这种排斥現象一国一国地傳布下去，它就可以形成一种冲突的开端，在这种冲突里，民族主义，旅行和居住的自由，言論自由，民族平等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战爭口号，都可以作为大动刀兵的借口，造成共产主义的和

資产阶級的教条之間的大决战——其实，这些教条对于工业秩序方面健康的建設毫不相干，正如自由意志学說和关于必然性的学說对于宗教精神的成长毫不相干一样。

道德的問題

就这样，我們得到了一个結論：作为一个国家的工业組織和社会組織主要形式的資本主义統治的失敗，現在是必須認識和承認的了。全世界的經驗所斥責的不是这个或那个奢靡的行为，或者这个或那个缺点。它所証明的是，金錢利益的牟取是对社会有害甚至对人类活动有危險刺激性的一种东西。亚当·斯密教导全世界人民去投靠的金錢利益的动机本身，就不能够作为安全地鼓舞人类行动的动力。为私人利益而施行的資本主义独裁，經过了整整一个世紀的考驗之后，已經不能在遍及全世界的民主主义的审判面前，歌頌自己了。而今天的基督教教会也不得不对民主主义表示贊同。1922年約克大主教，在对英国教会大会的演講里，曾对这种"工业方面的、政治方面及国际方面的信仰，行动和政策的龐大体系……即我們大致称为西方的文明"作出这样的基督教的判断："它在上一世紀里达到了最高峰。它是为財富和权力的生产而很美妙地設計的。它抱着輝煌的企业精神驅使科学的发明为它服务。它創造了并且滿足了成千种关于安乐和便利的新需要。它促成了龐大工业人口的出現。它的'强者生存'的信仰激发了愛国主义。但是，它的支配着个人、阶級和国家的动机，是非基督精神的自私、竞爭、敌对勢力的斗爭。現在，这些动机已經越过它們自己的限度了。它們正在突破它們自己織造的网罗。的确，这中間的眞理，已在世界大战的爆发上和今天欧洲的苦难里，大書特書地

写了出来。不过，假使它对于人类是一个福音，而不是一种挫折生机的毒素的話，那末，它的动机就必須予以轉化①。”

我們認为——正象霍亨索倫王朝及他們的軍事顧問的上次的大規模侵略一样——假使上次世界大战的結果是另一样的話，它可能是人类最后一次的浩劫。資本主义的失敗，对于人类是一件好事。操縱着人民群众生死之权的不負責任的权力的胜利，即使它只是限于“經济”的权力，也会是一种道德上的灾难。对于牟利动机的必要性，尽管人們有那样的看法，也沒有一个人敢肯定它是一种高尙的动机或是一种崇高的志气。它肯定地不能指导艺术和美术的生产；它是正义的一种嘲笑；它是友誼的敌人；它不是爱的父母。甚至最热中的牟利者，也出于本能地反对把这种全能的动机介紹到他自己家庭关系方面去，准許在家庭关系里存在的，恰恰是相反的一套原則。这种“上帝頒布的休战”（原文“Truce of God”，中世紀教会在某些时期宣布的休战。——譯者注）状态，一般只适用于亲戚間的、私人朋友間的和在某些小的程度上同行間的或社会阶級間的金錢关系。的确，每个职业界的人，都为自己行业的摒弃牟利者的信条而感到驕傲。陆軍、海軍、医师、牧师、教师、法官、救火队、警察和事实上所有社会上的薪水阶級，从来沒有把利潤的牟取，当作自己业务行为的指导方針。再者，由于一种特殊的不合邏輯的現象，牟取个人利潤的动机，至少在英国，从来沒有被認为是适用于管理国家事务的人們的原則；那些旨在从公职中牟取自己利潤的閣員，殖民地总督，駐外大使，議会議員，市参議員或治安法官，一直是象西門·麦格思（原文 Simon Magus 是一个魔术师，

① 在英国教会大会的訓詞。載“泰晤士报”，1922 年 10 月 11 日。

因他想收买授与圣灵的权力，被彼德(Peter)斥責，这故事見圣經"使徒行傳"第8章第九节至第24节。——譯者注)一样，不只是沒有获得公众的拥护，并且遭到公众的蔑視。毫无疑問，相反的趣味也可以养成的。我們还記得一个市儈青年所說的話，他曾經暫时代理过一个热誠的但完全无薪給的郡行政官的秘書，而我們的許多社会組織在很多地方是依靠郡行政官的。他說：他不喜欢"公务工作的这种不健康的气氛，以及它所带来的对于别人的需要的无休止的考虑。"他渴望回到他父亲店里去做結算每周利潤这种比較会使他滿意的职业。社会主义者，虽然从来不輕視一个完全支持自己和家庭生活的人(事实上，他为每个人要求这种权利)，但对于以貪求私利为主要动机这件事情，却感到深切的痛恨；他要求"发財的愿望"不应当再作为我們国家政治的基础，不应当再作为行动的指导方針来教导青年，不应当再当作有助于共和政治的事情来喝彩和予以尊敬。他相信，在文明先进的国家里，人类已經有条件把心腸改換一下，以同志式的感情和公共服务的动机来代替私人金錢利益的和追求財富的动机。他并不因此要求对人类的天性作任何根本的改变。一个眞正合作的共和制度的建立对于道德提高方面所要求的，不是要求那些有工业組織才能的人們去做圣人或禁欲主义者，而只是要求他們在工作中有为公共謀利益的精神，在生活上作适可而止的要求，好象我們的科学工作者、大中学校的教师、各类各級公务員大軍、各級的市政官員、消費合作运动的行政人員和工会方面的职員等很普通的人一样。并且，这种以公共服务的动机来代替自己发財的动机的轉变，将通过把"靠占有权为生"的人看作与潦倒的浪子同样可耻的一种道德革命，来使其深入我們的良心；而且，还要把那些特别有天才的、坚持向社会榨取"他

的才能的全部代价"的人，看成为一种卑鄙之徒——与一个非有最高的报酬就拒絕施行手术的外科医师同样地卑鄙。甚至在那些不顧社会福利的人們中間，也会覺悟到，認为游惰和頹廢的生活既不健康，又不愉快；認为代替工作的娛乐，大半是商人敛錢的手段；并且認为資产（假使另一种抉擇不是穷困和堕落的話）带来的煩惱将使人們难以忍受。无論将来怎样，現在已有充分的証据証明，即使沒有一个人能够指望从坚持地討别人的便宜而发財，世界上必要的任务是将会去做的，必要的发明将会有的，必要的改良将会提出的，必要的責任将会去尽的。由于科学的进步和职业道德的成长，以"稽核效率的法庭"和"职业名誉的法庭"这两个孿生法庭来代替"利潤的法庭"的理想，現在已有实行的可能了——的确，如果要我們的文明免于浩劫的話，这种代替实在具有十分的重要性。

但是，即使这一点的証据还不够全面，社会主义者还是要为以同志式的情感来代替斗爭、以职业的道德来代替竞爭的商业、以根据科学方法而稽核的人口統計来代替金錢利潤的測驗的任务而作不懈的努力，因为，对他来說，同志式的情感和知識的追求所产生的思想情况，及以同志式的情感为主要的动机的和以科学的方法为公認的方法的社会——无論物质方面是否更加好些——比起人与人的斗爭和这种斗爭所造成的、国内的和国际的社会仇恨所造成的社会，要好得不知多少。

我們对于資本主义社会文明衰亡的診断，就在这里告一結束。我們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里，虽是30年以上的积极成員，可是我們以前从来沒有对資本主义制度提出过控訴。我們的时間和精力，都集中在地方的行政方面，社会組織实况的研究方面，和

代替現有牟利制度的种种措施的設計和宣傳方面，希望根据科学的眞理，在尽量避免政治的摩擦和尽量顧到"已有的愿望"的原則下，把工业改組为一种民主管理的公共服务事业。我們选擇这种途徑的理由是，我們无意于沒有积极主張的消极反对、和沒有准备建設的单純破坏。我們在沒有找得实現某一种理想的途徑以前，从不敢随便地宣傳这种理想。可是在竭尽了我們斟察这个途徑的努力，而且目标已經在望的时候，我們也許可以毫无犹豫地或毫无恶意地正告資本主义，在我們这个时代所有花言巧語的掘动者死去和被遺忘的时候，历史将会給它什么样的判断。凡是不怕厭煩而愿意追索我們所深信的将要逐漸取資本主义統治而代之的那种工业和社会制度的兴起和成长的人，可以在我們其他的著作里作这样的探討，无論是关于地方政府的发展，工联主义的組織及功用，消費合作的运动，工厂立法日益增长的发展，和全国最低标准工資政策的实施，或有系統地消灭穷困（与单純的救济有别）。我們認为，我們有权提議說，那些誣告社会主义者逃避細节和不能为他們的抉擇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等草率的控訴，对于我們，与对于英国工党和費边社的出版物一样，是不适用的。

但是，我們过去之所以对于資本主义不作任何道德上的裁判，只是由于一种信念；我們以为那些控制国家政府和立法的人們，对于我們大家遭受到的社会病症的严重性以及——同样重要的——占英国人口五分之四的工資劳动者对于这些病症的看法，都有所警覺。在世界大战以前，好象已有相当广泛的意見承認，社会的秩序必須朝着物質收入上和个人自由上更大平等的方向、朝着賺取工資的生产者及全体消費者在参加控制生产財富的工具方面稳步增加的方向，逐漸予以改善。关于这种政治的和工业的民主主义

的逐漸发展，已在1914年以前的一代获得了大家贊許的表示：不只是表現在工資劳动者选举权的获得上，上議院絕对否决权的取消上，以及自由結社的权利成功地获得立法的承認上，并且还表現在地方政府的有效的民主化上；地方公营事业的逐漸推广上；工厂和矿場立法的系統化和几乎普遍的推广上；千百万工人的法定的最低工資标准和法定的最高工时标准的树立上；和最后——或許最重要的——通过养老金和教育、卫生和娛乐等公共事业，从国民收入中逐漸划出日益增大的一部分資金来补助儿童們，病弱的人們，和老年人們的需要上。我們过去以为——也許是錯以为——这一个人数有限的統治阶級，对于那些横被剝夺了享受和控制权利的人們的风起云涌的要求所表示的英国典型的贊許，会心愿地或緩慢地从政治的范圍繼續推广到工业的范圍；并且以为这种趋势的进展虽然緩慢，但至少是不会开倒車的。但是，很明显，世界大战为財富带来的巨大毀坏，和战后和平条約的性質所造成的失业給全世界工資劳动者所形成的孤立无援的地位，鼓励了美美的資本家和地主，其中有些竟被从战爭中获得的巨大利潤刺激得利令智昏，使他們一直根据似是而非的生意經的理由，企图将广大的人民群众赶回到过去半世紀以来已經取得的陣地后面。不只是工資遭到了瘋狂的削减，工时有了增加，即使在繼續获得超額利潤的企业里，也是这样；并且連国民收入中划作卫生和教育这样重要业务用途的比例也被减少，目的是为了减少所得税。在每一个工业区域里，許多家庭層集在很不卫生的和往往是不适于居住的出租住宅中的拥挤情形，比起沙甫斯柏立勛爵的时候，还要有伤风化。1918年到1919年間內閣閣員对于鉄路和矿場国有化的明确諾言，已經被无耻地撕毀了。成績卓著的工資审議委員会的工作，不但

沒有根据全国最低工資标准的政策加以扩大，并且連这个最低工資的堡垒，也在暗暗地横被削弱之中，或者它們的权力横被阴損。甚至在酝酿着对人民自由的一种恶毒进攻；我們一方面受着公开为抗拒再次"对劳工讓步"而恢复具有效率的第二院的否决权这种倡議的威胁，另一方面又被实际上等于取消工会以多数来决定它們工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合法权利这种叫囂所恫吓。在全国各地，在工厂里，在船塢里和在矿場里，人們都傳說着和相信着，这两种措施的目的，是要暗中击毀政治的和工业的民主主义——于是就驅使着工資劳动者以空前壯大的規模从事"直接的行动"。这种反革命，日久之后，对于制造它的人們的危險性，比起它所徒然梦想扭轉这种浩浩蕩蕩的道德潮流的努力的效果，还要大得多；我們深信，这种反革命之所以可能，一部分是由于英国資本主义企业主，对于反抗他繼續独裁的情势，沒有了解到它的力量，而另一部分則由于无产者的盲目的憤怒，这种憤怒驅使他去用毀灭他的經济敌人和奴役他的机器以图补救，因此双方都沒有認識到在两者之間还有一条更好的道路。为了使双方的人士(这可能是白費气力的)認識到他們的問題和促进他們相互間更好的了解——希望老天一定会使它所要毀灭的人頑固到底的这种事情，不致一直是不可避免的現象——我們特貢献这本小書。

中英名辞对照表

三　画

工人结社法 Combination laws
工厂立法 Factory legislation
工厂法 Factory law
工业主义，工业制度 Industrialism
工业方面的强迫征募 Industrial conscription
工业的民主 Industrial democracy
工业的寡头統治 Industrial oligarchy
工业革命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贼（罢工破坏者）Blackleg
工党 Labor party
工资的自然率 Natural rate of wages
工资劳动者 Wage earner
工资审議委員会 Wage boards
工资奴隶 Wage slavery
工团主义者 Syndicalist
工联主义者 Trade Unionism
土地所有权 Land tenure
义务劳动法 Obligation to work law
大英和平 "Pax Britainica"
口袋里的城市选区 Pocket-borough

四　画

分配股息 Allotment
分配 Distribution
分期付款 Instalments
分路并进 Routed
无产阶級 Proletariat
无产阶級专政 Dictatorship of Proletariat
不列顛联邦共和国 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不劳而获者（食利息者）Rentier
不景气（萧条）Depression
公用地 Common field
手工业行会 Craft gild
文明生活的資料 Means of civilized life
天然物資 Natural resources
巴黎公社 Paris Commune

五　画

生产 Production
生产过剩 Over production
生产工具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布尔乔亚 Bourgeoisie
巧妙的罢工、磨洋工(俗称) Ca'canny
卡特尔 Cartel
平均分配的国家制度 Distribution State
对于人种退化的影响 Dysgentic influence on the race
民主的幼稚病 Democratic infantil,

ism
世襲的阶級 Hereditary class
必然論 "Nocessity"
节欲的报酬 Reward of abstinence
出租住宅 Tenement house
失业 Unemployment

六 画

合并 Amalgamation
安立甘教会 Anglican church
亚美尼亚的紅色顏料 Armenian red
阶級独裁 Class dictatorship
阶級斗爭 Class war
共产主义 Communism
动力 Incentive
自由企业 Free enterprise
自由意志 "Free will"
自耕农 Yeoman cultivator, Peasant cultivator
自由党 Liberal party
自己当家作主的手工业师傅 Master craftsman
自然法 Natural law
全国医学会 General Medical Council
全国最低生活标准 National minimum
刑法 Criminal law
行会組織 Gild organization
过渡发展 Hypertrophy
有閑阶級 Leisure class
有产阶級 Propertied class, Proprietary class
牟利者 Profiteer
牟利活动 Profiteering
牟利的資本家 Profit-making capitalist
产品的剩余 Residue of product
托拉斯 Trust

七 画

补貼制度 Allowance system
私人所有权制 Institution of private ownership
私有制 Private ownership
私有財产 Private property
体力劳动 Manual labor
医务法 Medical Act
社会新阶层 Nouvelle couche sociale
把資本額估計过高 Over-capitalization
利潤 Profit
抛出 Unloading

八 画

社会主义 Socialism
社会主义运动 Socialism Movement
直接行动 Direct action
股息 Dividends
股份公司 Joint stock enterprise
股份 Shares
法律主义 Legalism
法律救济 Legal redress
法西斯蒂 Fascisti
所得税 Income tax
物質文明 Material civilization
金錢利益 Pecuniary gain
金錢私利 Pecuniary self-interest
和平的侵入 Peaceful penetration
武士（日本的） Samurai

卖空 Short-selling

九 画

宪章运动 Chartist movement
保守党 Conservative party
保护关税政策 Protection
封建制度 Feudal system
客室 Oeil de baeuf
科学管理 Scientific management
急轉轉卖 Switching

十 画

特許的国家公司 Chartered national Company
特权阶級 Privileged class
財富的消費 Consumption of wealth
神权 Divine right
浪費 Inefficient consumption
衰退年代 Lean year
配給制 Rationing
破坏行动 Sabotage

十一画

商业企业 Business enterprise
通貨膨脹 Inflation
寄生游惰生活 Parasitic idleness
規定的最低生活标准 Prescribed minimum standard of life
貧穷救济法 Poor law
貧穷救济税 Poor rate
貧民窟 Slum
剩余劳动 Surplus labor
剩余价値 Surplus value

十二画

等級制度 Caste system
联合 Consolidation
費边社 Fabian Society
期貨（远期） Futures
期貨（近期） Option
期票 Promissory note
屠杀犹太人的暴动 Pogrom
劳工及社会主义运动 Labor and Socialist Movement
劳动权利法案 Right to work bill
劳动救济院 Work house
最低工資标准法 Minimum wage law
普魯士藍 Prussian blue
提去奶油的牛奶 Separated milk
証券 Securities
超級資本家 Super-capitalist
減工 Under-employment

十三画

資产阶級 Bourgeoisie
資本主义 Capitalism
資本主义文明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資本主义教条 Capitalist doctrinarses
資本主义的工业組織 Capitalist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
資本論 Das Kapital
資本主义社会組織 Capitalist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資本主义制度 Capitalist system
資本主义 牟利者的独裁 Dictatorship of capitalist profit-maker
資本主义企业的自由 Freedom of capitalist enterprise

2 028 1594 4

鉄質土 Ferruginous earth

十四画

酸性硫酸汞 Bisulphuret of Mercury or cinabar
癲人院 le Bicertre
鉻酸鉛 Chromate of lead
鉻酸鉀 Chromate of potash
領地 Manor
豪富阶級 Plutocracy

十五画

調配者 Co-ordinator
調度資产 Marshaling the assets
德国参謀本部 German General Staff

十六画

霍亨索倫王朝 Hohenzollern
遺产 Inheritance
操縱市場 Rigging

十七画

韓軒議会実录 Hansard
薪水阶級 Salariat

十九画

藩主（日本的）Daimio
壟断 Monopoly
壟断集团 Ring